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崧 刘伟 朱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新形势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思考 范恒山 (005)

警惕货币政策“钝化”落入流动性陷阱 黄志凌 (015)

· 宏观经济 ·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资本结构和投资领域研究 程凤朝 (026)

· 国际经济 ·

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 王志乐 (044)

对“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高凌云 (066)

基于“一带一路”的金融创新及发展建议 申景奇 (077)

发展伊斯兰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白宇飞 杜晓雨 (088)

· 产业发展 ·

创新供销合作社打造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坚力量

胡正堦 孙炳耀 窦勇 艾永梅 (098)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智库信息 ·

全球化背景下新兴业务领域的法律环境建设

——“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论坛综述

韩良（112）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0）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5）



CONTENTS

Reflections on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Situation	<i>Fan Hengshan</i> (005)
Being Alert of by the Falling into the Liquidity Trap “Passiv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i>Huang Zhiling</i> (015)
Study on China’s Capital 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Areas in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i>Cheng Fengchao</i> (026)
Global Companies: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Multinationals	<i>Wang Zhile</i> (044)
The Main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i>Gao Lingyun</i> (066)
Financial Innovation Based on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the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s	<i>Shen Jingqi</i> (077)
Developing Islamic Finance and Support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i>Bai Yufei , Du Xiaoyu</i> (088)
Innovating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to Build the Backbone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i>Hu Zhengyuan , Sun Bingyao , Dou Yong , AiYongmei</i> (098)
Leg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New Business on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Han Liang</i> (112)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20)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新形势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思考

范恒山

摘要：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客观分析当前城乡统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稳妥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乡统筹 发展规划 新常态

作者简介：范恒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深入推进阶段。在此形势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客观分析当前城乡统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稳妥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发展的基本历程

（一）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关系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乡关系主要体现为“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在当时

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国家依靠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支持，迅速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差距较为严重，上海、广州等城市呈现现代化气息，但大部分农村地区停滞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之中，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面对这一现实，1949年3月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丢掉农村仅顾城市”的政策方针。这一时期，国家对农村发展非常重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面貌发生较大的变化，基本做到城乡稳定、合作交流，这一时期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1956年以后，在当时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为迅速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不利局面，中央确立了“赶超型”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城乡政策向“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政策。国家工业基础薄弱，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因此强制性地压低劳动力、原材料、农产品价格支持工业生产，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时，为了保证工业获得较高的利润，国家提高工业产品价格，形成了长期以来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政策。二是农村经济自由度不高。在当时环境下，为了集中有限资源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国家限制或者关闭农村集贸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民从事家庭副业生产，限制甚至打击商品自由流通。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劳动力，加之工业对劳动力需求不大、国有企业劳动力“宗族式”自我循环，国家限制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转移，农民自由流动和自主择业的空间较小。三是城乡二元社会管理制度。为了维持城市人口低工资、低消费，优先保证工业从业者的各种利益，除了实施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政策之外，国家还出台了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粮食配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一系列安排，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社会管理模式。

（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发展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推动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城市和农村均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不断吸纳农村要素资源，城乡差距在发展中有扩大趋势。十六大以后，中央重视城乡统筹问题，城乡关系逐步转向统筹融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发展先后经历以下几个过程。受益于“普惠型”改革政策，农村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发起“包

产到户”改革到1984年全国基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释放并开始向城市和二产业转移，农民收入水平较快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要素资源长期低价向城市流动，城乡差距在发展中有扩大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城市对农村要素资源的吸纳效应越来越强。劳动力要素方面，全国每年2亿~3亿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沿海地区流动，农民工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农民工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金融要素方面，国家金融信贷资源主要支持城市发展，农村储蓄取之于农但未用之于农，城市对农村金融的不断“抽血”，是农村发展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土地要素方面，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要经过征收，农业用地征收价格与国家建设用地出让价格差距较大，土地“剪刀差”价格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等。居民收入方面，1985年国家取消农村教育补贴，农村每年征收的教育提留达300亿~500亿元，农民负担较重。国有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收入因为工资改革而很快提高，奖金、各类补贴高于基本工资。1985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8倍，而到2000年，差距扩大到了2.8倍。面对较为突出的城乡矛盾，中央提出城乡统筹要求，城乡关系发展进入新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城乡矛盾到了比较突出的时期，“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概括了当时的形势。面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方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并将“城乡统筹”放在首位；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基本趋势”的重要论断，确立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政策方针。2004年开始，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对城乡统筹发展进行明确部署。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要求。随着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新一届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心，提出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发布，城乡统筹由政策性调整转变为制度性建设。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走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城乡关系向“二元结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关系经历了“改善、停滞、再改善”等过程；在新的形势下，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强，随着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加快推进，我国城乡关系将进入快速改善、一体发展的新阶段。

二、当前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机遇

(一) 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任务仍然艰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在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仍远远落后于城市。对于这些情况，有关各方已经有较为充分的认识，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解决。当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仍然存在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政策和制度创新较为滞后。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制度有关，较为突出的是土地管理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方面，农民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是土地增值最大的受益者，但在征收农村土地过程中，农民并没有完全公平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长久不变，但当前可供操作的具体政策尚未出台，在农村开展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等活动面临后顾之忧，这是现阶段制约城市资本、人才、技术向农村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户籍管理制度方面，当前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正在推进，但是附着在户籍上的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化政策如何处理，近 2.5 亿农民工待遇问题如何妥善解决，需要深入研究。有关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制度的改革创新，我们既要坚持正确原则和方向，又要能适应形势，积极稳妥推进。

二是市场机制作用不够充分。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就越是浓厚，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够。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时，如果忽视市场规律，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指令性、强制性和垄断性，对城乡统筹发展是一种伤害。比如，在推进农村特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大包大揽，往往产品滞销，造成效益低下，伤害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在特色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引导“农村能人”“种养大户”形成示范效应，做好土地流转、信贷融资、技术培训、交易和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服务，让农民自主、自觉参与市场。近年来，有关方面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加大，但对市场的带动效应还有提升的空间，未来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重点任务时，要市场主体参与创造良好条件。

三是金融对农村发展支持较弱。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最薄弱的是农业现代化，而金融支持不够是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农户贷款（包括生产、生活贷款）余额仅占全部贷款余额的 6% 左右。根据现有国家法律法规和某些金融机构的要求，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按规定不能抵押，农机、畜禽等抵押物银行不愿意接受，农户贷款额度一般较

小，单笔贷款成本高，在追求利润和规避风险的双重任务约束下，金融机构大多不愿意发展农村金融业务。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要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弥补政府投资的缺口，推动传统农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现代农业转变。

四是县域经济统筹城乡能力不强。县域经济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组织者、实施者，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与中心城市、与东部地区相比，发展差距很大，2014年全国2000多个县（市）行政区中，仍然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县对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能力较弱。同时，根据当前财政体制，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平衡，“财权向上、事权向下”，导致很多地方在基础建设投资、社会保障体系投入严重不足。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必须明确县域经济体的主体作用，增强县城和中心镇对产业、人口的集聚能力和对“三农”发展的带动能力。

（二）统筹城乡发展具备的有利条件

同时要看到，新形势下，推进城乡统筹具备一系列有利条件：一是经济增长为城乡统筹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年均增速近10%，2014年GDP总量已达63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达14万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170倍和120倍，人民生活达到总体小康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不断发展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农村发展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往束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消除，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将进一步增强。三是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巨大，是国家经济增长最具潜力的空间，也是国家抵御经济风险的回旋余地，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四是“四化”同步推进加快城乡统筹进程。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未来城乡关系的主要趋势。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城乡之间产业联动发展、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统筹将不断全面纵深推进，城乡关系将更加统一和谐。

三、新形势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思路

(一) 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目标

统筹城乡发展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也是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中央对统筹城乡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而要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就要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个目标可以细化为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城乡产业合理分工，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实现农村居民就近就业、就地城镇化。按照平等交换的原则，实现城乡之间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自由流动，使城乡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进一步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二是推进城乡社会均衡发展。统筹城乡人口发展，实现城乡人口的均衡增长，缩小城乡之间人口素质的差距。统筹城乡科教文化发展，逐步实现城乡之间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均衡发展。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建立城乡衔接、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城乡环境保护，按照基本相同的标准和协调一致的步骤实现城乡资源环境保护。

(二) 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原则

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当前与今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应该坚持这样一些基本原则：一是因地制宜，科学有序推动发展。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二是改革先行，完善政策制度设计。加快土地管理、户籍管理、涉农金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加快消除阻碍农村经济自由发展的政策机制，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体制机制，给农村发展较大的自由空间。三是以人为本，以农村居民需求为导向。城乡统筹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百姓，富裕农民，使广大农民能够享有现代化发展成果。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要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流动、人的创造潜力发挥等前提，以农村居民的合理需求为基本导向。政府引导，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政府重点做好政策设计、规划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等工作，通过良好的政策让市场看到发展前景，通过规划引导市场找到投资方向，通过城乡产业融合及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聚集资源要素的发展平台，为市场参与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基础服务。四是

节约集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坚持集聚发展，提高效率、效益。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对于愿意放弃现有宅基地到农村聚居点或小城镇住居的农民，可以无偿或者低价提供建设用地，逐步引导和改变农民分散居住的局面。五是生态环保，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严格控制农村污染源，对于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工业、养殖业，要坚决禁止。对于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开发建设行为，要坚决打击。要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力度，清理环境历史欠账，构建农村生态安全屏障。

（三）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选择

城乡统筹发展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充分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有计划、分阶段、有重点地沿着科学合理的路径稳步推进。在路径选择上，要把握这样一些方向：一是经济发展是城乡统筹的基础条件。要在产业政策、财税优惠、基础设施投入、科技支持、人才流动、金融服务等方面，构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充分发挥农村资源要素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等优势，优化城乡产业发展结构，统筹推动城乡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城乡统筹的政策保障。二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关键在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要围绕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户籍管理、财政体制、农村金融等方面，积极改革创新，构建城乡统一、倾向支持农业农村的政策机制。三是工农、城乡融合互动是城乡发展的主要动力。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既要重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同时也要重视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发挥城市、农村和农业、工业之间积极互动作用，调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双向流动的的积极性。四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核心任务。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对农业的补贴，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以价格机制推动农民收入增长。通过发展适合农村的产业、支持创新创业等，给农民提供更多收入增长的渠道。保障农村居民充分享受土地要素资源增值和流动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五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是现实需求。要加强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努力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运输体系建设，降低农村物流成本，方便各类资源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通，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建立健全工农、城乡平等利益交换机制

切实改变城市依靠优势地位不断吸纳农村低廉的要素资源的状况，充分发挥政策调

控作用，推动资源要素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自由平等交换。土地要素方面，把握好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关系，积极探索在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民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调整土地征收收益分配机制，要把大部分土地征收收益、转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和农民，保障农村居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金融要素方面，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规模和覆盖面，落实中央关于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要求，完善定向扶持政策，推动资金回流农村。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为农服务的小微型金融机构，鼓励大中型银行开展涉农贷款批发业务、小微型银行开展零售业务。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扩大保险覆盖面。劳动力要素方面，进一步清理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政策，促进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让农民外出务工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劳动安全，工伤大病有保险、有地方住、子女能上学。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就业、居住、缴税、缴纳社保等作为落户条件，让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市民。

（二）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体制

切实强化规划引导，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用地规划方面，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控制下，探索编制村的土地利用规划，科学划定城乡建设用地、住宅用地、生态用地，提高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布局方面，完善县域村镇建设规划和镇、乡、村庄规划，促进城镇合理布局。小城镇和农村社区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重视小城镇和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聚集人口，不断提高小城镇和农村社区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建设规划方面，要解决当前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功能布局不够合理的问题，要做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强化城乡基础设施的衔接互补，实现基础设施城乡共建、城乡联网、城乡共享，统筹推进城乡水务、交通、能源、社会事业、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

（三）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支持农村、农业的发展。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明确各级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事权，并以此赋予其履行职责必要的收入来源。适当扩大地方政府财权，提高农村基层的财政自主权、自给率。加强对乡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乡镇财政是城

乡统筹发展的基础，但当前乡镇财政普遍存在“钱少事多”的现象。在完善财政体制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财力分配要适当向乡镇倾斜，解决农村公共财力不足的问题。建立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加大对农村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的预算支出。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切实改变以往重城市、轻农村的投入分配机制，财政预算要加大对农村水务、电力、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强以工代赈支持力度，扩大以工代赈支持范围，鼓励和支持村级组织通过自主筹集资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四）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消除城乡差距的重要标志，也是城乡统筹的核心内容与关键环节，要发挥政府的统筹能力，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建立适应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要求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立保障有力的公共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城乡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养老等制度，形成覆盖全面、综合配套、便捷高效、城乡统一的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突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资源的调整和优化，加快普及高中教育，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鼓励和支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和水平。建立统筹城乡的文化事业发展机制，促使城市文化功能向农村延伸，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合卫生医疗资源，建立城乡居民方便共享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对接并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一元化。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五）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发展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加快发展、融合发展。农业方面，要在农村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经营、规模经营等方面做文章，用工业化理念和先进技术、物质装备、现代经营组织形式发展农业，充分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带动作用，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协调发展。工业方面，目前有相当部分农村居民处于隐性失业，根据调查，农村闲散劳动力月工资意向水平为沿海地区的1/3左右。在进一步提升农村物流水平的基础上，可以采取积极的财税政策，引导劳动力需求大、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产业向农村转移，既能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又能部分解决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行的现实问题。服务业方面，在积极推进中小城镇、农村聚

居点建设的条件下，农村服务业需求将有较大增长，加快推动农村商业、餐饮、咨询、文化体育等服务业发展，既能容纳一部分人就业，又能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此外，要大力发展农村各类新型业态，积极发展信息化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工厂化农业和农村电子商务等。

（六）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效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调动各方力量，要健全有关政策机制，全面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完善调动各方主体积极性、能动性的工作机制。消除有关政策障碍，推动城市人才、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主动向农村流动。设计好有关激励机制、奖励机制和退出机制，鼓励企业、个人积极参与城乡统筹发展，同时要重视调动农村居民参与城乡建设的主体积极性。建立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推进机制。继续增加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形成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在资金项目安排、涉农补贴等方面，对市场主体逐步实行无差别政策。探索建立城乡发展利益共享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对市场投资的带动作用，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对于经营性、适合市场运作的城乡统筹发展项目，交由市场主体建设和运营。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推进机制。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基础，要通过优选人才、优化手段、创新机制，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可依托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资源，发挥工业企业的支撑带动作用，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经营制度的创新，引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集体农庄、家庭农场模式发展，提升现代农业组织化、规模化水平。

责任编辑：沈家文

警惕货币政策“钝化”落入流动性陷阱

黄志凌

摘要：量化宽松是针对经济出现“流动性陷阱”时的一种解决方法，近年来多个国家试图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解决经济的衰退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我国宽松货币政策同样出现“钝化”，根本原因在于预算约束环境的改变，建议通过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来降低利率成本，引导经济平稳运行。

关键词：宽松货币政策 流动性陷阱 预算约束 存款准备金率

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量化宽松”一词普遍为大众所知，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时美联储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以应对常规货币政策失灵，它是经济出现“流动性陷阱”时的一种解决方式。在关注中国货币政策“钝化”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流动性陷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一、流动性陷阱的理论背景与现实困惑

通常说，流动性陷阱亦即社会资本陷阱、货币陷阱、通货陷阱、金钱陷阱。按照货币—经济增长原理，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水平，继而影响宏观经济。假定货币需求不变，随货币供应量增加，资金价格即利率下降，进而刺激出口、投资和消费等总支出，带动

整个经济增长；但如果投资者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预期不佳，即使央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相反会选择持有货币。也就是说，当国民总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时，无论怎样增加货币供应也不能刺激经济增长，这种状况被称之为“流动性陷阱”。

在经济层面，流动性陷阱表现为经济的衰退甚至是萧条，需求不足、失业率高企、企业库存增加、通货紧缩，名义利率降至零或者负利率也不能启动经济复苏，出现“货币无力症”。在金融层面，流动性陷阱表现在资金融通不畅。一方面，居民总体的消费意愿下降、储蓄上升，居民和企业出现现金窖藏，银行信贷萎缩、流动性外溢以致于对存款收费；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弱化，货币保管功能凸显，客户与银行的关系类似于租用银行保险箱，银行成了被迫吸纳资金的“流动性洼地”。另一方面，尽管利率极低，央行又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但信贷需求仍然严重萎缩。与此同时，股票市场低迷不振，资金流向收益稳定的低风险证券市场，利率曲线出现扁平化。

流动性陷阱不仅否定与证伪了货币政策万能的幻想，还说明宽松货币政策本来就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其可以救命但不能够解决经济结构失衡。日本可谓二战后在流动性陷阱中挣扎时间最长的发达经济体。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由盛转衰，资产大幅萎缩，资产价值只有高峰值的 10% 左右。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进一步恶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企业投资需求萎缩，物价指数一路下滑，1998 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经济负增长。2001 年开始，日本当局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通过超常规大剂量的货币供应，拉动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然而，非常规货币政策最终没能让日本经济脱离陷阱，而是陷入长期萧条。2012 年日本推出了安倍经济学，核心就是更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效果同样式微，日本经济波动加强，内生增长动能依旧不足。美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出现通缩，美联储在常规货币政策失灵时先后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从市场上收购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为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达到振兴经济的目标。之所以说量化宽松是不同于常规货币政策的超常规工具，是因为其不同于央行在一般情况下通过买入短期国债降低短期市场利率的做法，而是通过购买中长期证券，给市场释放经济长期向好的积极信号，以活跃市场，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显然美国的量化宽松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美元在加息预期下强劲反弹。然而，美国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牢固，通缩压力尚未全部化解。针对通缩，欧洲央行开始的应对策略是采取传统的扩张货币政策——大幅度降低利率，2014 年 6 月欧洲央行将商业银行在欧洲央行的存放利率降低到 -0.1%，在刺激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2015 年 1 月 22 日，欧洲央行效仿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计划，从商业银

行和私人银行机构收购证券，并宣布将证券规模扩大到 1.1 万亿欧元，从 2015 年 3 月 9 日起开始每月购买 600 亿欧元的证券，一直到 2016 年 9 月底。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金外流和欧元的大幅度的贬值。受欧元区通缩的影响，瑞士以及北欧国家出现罕见的降息大赛。独立于欧元区外的英国也难逃厄运，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2015 年 2 月份首次降到零，进入通缩期，英国政府为摆脱日本式的通缩陷阱，也在考虑执行负利率。

很显然，日本、美国和欧洲央行都采取了相似的量化宽松措施，降息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负利率一旦形成，会进一步自我强化，经济体往往会在流动性陷阱中越陷越深。落入“陷阱”中的人群行为方式和预期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致使货币传导渠道出现“三大梗阻”。一是货币市场的传导梗阻。尽管央行能控制基础货币的水龙头，但却不能强制银行放贷，银行只能将超额的流动性以储备形式继续持有。二是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梗阻。尽管央行能控制短期名义利率，甚至影响各种利率和相对资产价格，但却无法强制企业和私人部门借款，货币刺激难以转化成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三是外部干扰的传导梗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受到资本流动的干扰，从而降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为可怕的是，如果不断增加货币供给的刺激性货币政策，只是产生流动性过剩与无处不在的过剩经济现实，或许使流动性陷阱扩大化为过剩经济陷阱。

具体到中国，虽然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但受政策环境、金融机制的差异，货币政策的操作环境和货币政策实施途径与其他国家相比有着突出的特殊性。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尚未完成，金融市场上的利率由央行统一制定。因此，利率有很强的外生性，不能正常反映社会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这和流动性陷阱的理论假设有明显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最为独特之处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投资行为与投资需求可以有效对冲流动性陷阱的形成风险。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是区域经济资源的最大“所有者”、分配者，也是区域市场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在投资过程中，并不像西方经济学在流动性陷阱中所描述的，投资决策取决于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的比较，他们更关心当地经济增长的总体利益。因此，在过去历次经济下行时期，由于存在大量公共设施或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烈投资冲动，只要货币当局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放宽信贷条件，就可带动一系列投资和消费需求。

然而时至今日，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钝化”迹象，货币供应流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梗阻现象，“药力下降”“药效期”越来越短，微观经济主体甚至无视强烈的宏观政策信号这是不得不警惕的。不管怎样，非国有的民间资本已经是我们市

场经济的主体，居民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货币政策“钝化”是否会演变成流动性陷阱，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二、货币政策“钝化”日益明显，约束机制变化是重要原因

“钝化”本是化学领域经常使用的概念，意指使金属表面转化为不易被氧化的状态。引申到经济领域，是指对外界事物不敏感、不灵敏，对作用对象功能弱化，甚至被阻隔，难以起作用的一种状况。

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且下行压力较大的态势，我国货币政策在保持总体稳健中不断宽松。央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SLO、SLF、MLF、PSL）以及全面或定向降准降息等多种手段，调节资金面，以支持经济增长。从资金总量看，无论是货币供应量 M2（广义货币供应量）与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还是 M2 增速与 GDP 增速和物价水平之和的差额，都表明当前货币供应和市场资金量较为充裕。如果再考虑作为现实货币支付的替代品——票据，流动性则更加充裕；2014 年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已达 9.9 万亿元。从资金价格看，2012 年以来货币政策进入降息通道，仅 2014 年下半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央行就四次降息，基准利率已降至十年来历史低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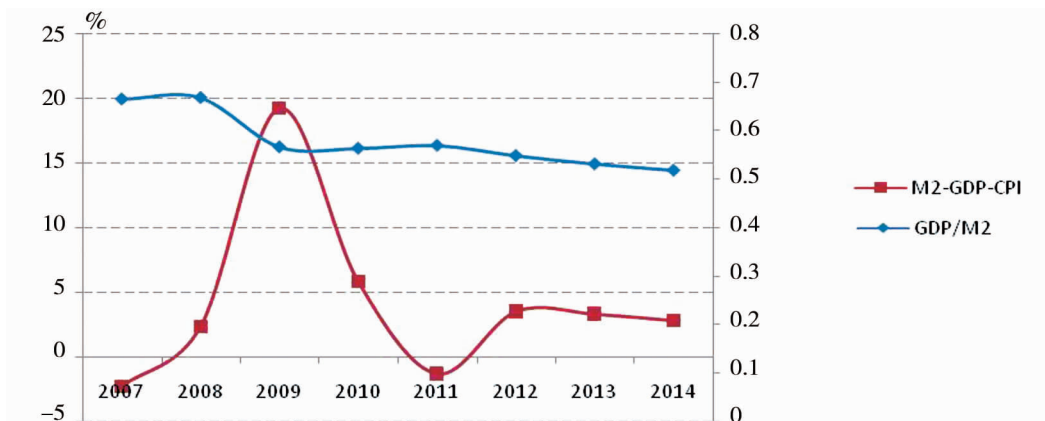


图 1 2007 年—2014 年货币供应与 GDP 增长的关系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

从逻辑上考量，货币供应充裕，基准利率大幅下调，将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货币政策已出现较为明显“钝化”迹象，对经济作用“药力下降”，“药效期”也越来越短。

其一，微观经济主体投资意愿并没有随着政策刺激上升，相反投资需求还出现不断减弱的状况。不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下滑，就连对宏观政策信号一向非常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长也出现大幅下降。从 2012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

9.2个百分点，占总投资60%以上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13.4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政策刺激的反应趋弱，“药效期”明显收短。投资收缩成为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根本原因。由于企业扩大再生产意愿不强，投资弱化，也导致与实体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M1（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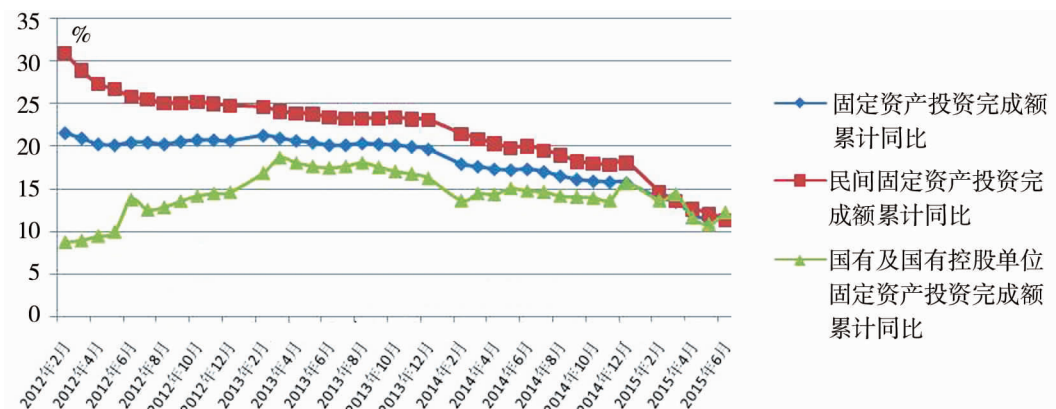


图2 2012年2月—2015年6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二，货币供应较快增长，通货水平较低甚至出现收缩。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远超同期经济增速，而通货水平虽尚不能说是“通货紧缩”但也呈现明显收缩态势。2015年5月份以来，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然在食品特别是猪肉价格带动下呈现上行之势，但仍处于2%以下较低水平，剔除翘尾和季节性因素，涨幅更低。2012年3月份以来PPI（生产者物价指数）连续41个月负增长，近期跌幅还呈扩大之势，创下了有统计以来最长的PPI负增长周期。从全面价格情况看，2015年上半年GDP平减指数为-0.43%，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通缩风险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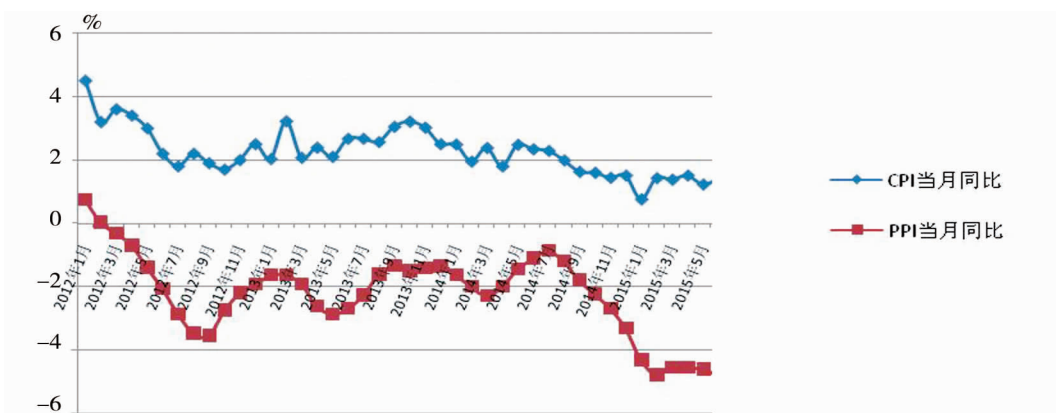


图3 2012年1月—2015年5月价格水平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三，货币政策对 GDP 增长的边际效应显著下降。具体表现为 GDP/M2 比值由 2007 年、2008 年的 66.4%、66.7% 下降到 2013 年、2014 年的 53.1%、51.8%。货币供给量 M2 与 GDP 增速之间的相关性出现弱化，经济对于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的敏感性下降。

其四，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金融对接实体经济仍有待到位。与微观经济主体处于观望状态、资金难以渗透其中相比，金融体系内沉淀了大量资金。近年来，金融机构同业资金来源和应用快速增长，截至 2014 年末，全部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放和同业拆借余额 7.7 万亿，较上年大幅增长 81.1%；存放同业和拆放同业 3.7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39.7%。2015 年 6 月末，相比于 11.8% 的 M2 增速，M1 增速仅为 4.3%，处于历史低位，反映出非金融企业流动性相对不足；而截至 2015 年 6 月末准货币（M2 - M1，包括单位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比年初新增 9.7 万亿元，其中，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比年初新增 4.2 万亿元，余额超过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40% 以上，在准货币新增中占比 43%；单位定期存款、储蓄存款新增仅分别为 2.5 万亿元和 3.1 万亿元。这些现象反映出新增资金相当一部分流向非银行业金融部门。

其五，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短端利率降幅难以有效传导至长端，利率联动性趋弱。央行多次降息降准，货币市场利率明显回落，银行间市场利率已降至近六年来低点。6 月末隔夜、三个月、一年期 SHIBOR（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较年初分别下降 2.27、1.9 和 1.34 个百分点。中长期国债收益率降幅较小。6 月末，银行间市场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七年期、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较年初分别下降 1.52、0.47、0.3、0.07 和 0.02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对长期利率水平的调节效力比较有限，而在利率期限结构中对实体经济作用最大的正是长期利率水平。

我国预算约束环境的改变是货币政策“钝化”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由于经济生活存在普遍的预算软约束，货币政策没有也不会出现“钝化”现象。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丰富，而社会基础设施薄弱，产能扩张需求迫切，资金约束成为产能扩张的主要瓶颈；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预算约束环境极其软化，甚至存在相当程度的无节制预算软约束现象。这使得市场对货币信贷需求极为敏感，但对利率变动基本上不敏感，无论是什么样性质和效益的企业，均把资金引进放在第一位，这从对外资引进的各种优惠政策可见一斑，而生产产能也能被市场完全吸纳。在这种状况下，货币转化为资本通道畅通，央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作用。如 1988 年—1990 年我国经济大起大落、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冲击，央行通过“急刹车、控油门”“松手闸、踩油门”等货币信贷调控手段，很好地引导了经济运行，货币政策效果即时而

显著。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仅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商业银行等主体的预算约束也在不断趋于强化。企业不再一味追求资金获取，而是更加注重效益导向，投资决策之前越来越谨慎权衡资金成本与预期资本回报率，而不是过去的资金可获得性。在经济持续下行的环境下，即便货币环境宽松，如果企业对业务前景预期悲观，也不会借贷投资，而是转为缩产能、去杠杆。因此，货币供应量对投资驱动的效应不断降低，就不难理解了。另一个被忽视的现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出现了一股“跑路潮”，使得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预算软约束突然让位于信用软约束。安邦咨询研究表明，中国投资级公司债的收益率比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高出1.92个百分点，而韩国投资级公司债的收益率仅高出1.05个百分点；瑞银（UBS）分析报告显示，印度高评级公司债收益率比美国国债收益率高1.86个百分点，马来西亚公司债的收益率高1.37个百分点。外界认为，中国公司债的收益率高于亚洲其他国家公司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信用风险更高。而随着银行业改制上市完成，治理结构明显改善，贷款风险定价的意愿与能力显著增强；当遭遇部分投资人“跑路”并不断蔓延时，银行即便资金充裕也很可能“惜贷”，转而将资金大量配置到市场交易领域甚至同业往来。在预算约束环境改变以及信用软约束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对市场利率即资金价格的变动越来越敏感。如果依然主要着眼于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商业银行放贷能力，而不是从引导市场利率入手，货币政策对经济作用出现“钝化”难以避免。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张，大量金融交易需求涌现，社会资金在实体经济与大类金融资产间轮动，增加了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复杂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通过市场利率引导、调节实体经济资金面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了。

三、实际利率水平与基准利率的差距较大， 调降存款准备金率意在降低市场利率

当前，预算约束不断强化，货币能有多少转化为资本，不单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少，更取决于企业、银行等各类经济参与者的预期回报率，货币成为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我国潜在投资需求巨大，特别是一千多万中小企业对投融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提高预期回报率是释放潜在投资需求、实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

预期回报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市场供求状况，订单的多少；二是投资成本的高低，主要是外源融资成本的大小。从市场供求看，当前企业订单减少，制约投资增长，

进而降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能力；2015 年以来，新订单指数呈现下行走势，7 月份降至 49.9%，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仅为 47.9%，在手订单指数降至 45% 以下。此外，产能过剩亦制约投资增长：工信部披露，2013 年末五大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 73%，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且产能过剩范围已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产业扩展到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如 201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超过 500 万辆，远超过实际产销 100 万辆的水平。从投资成本看，尽管近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发展较快，但融资格局仍以银行业等间接融资为主导，虽然基准利率大幅下调，但银行受利率市场化下的资金成本上升等因素，银行为保持合理的利润增长和净息差水平，发放信贷利率并没有等幅度下行，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实际利率水平与基准利率的差距很大，企业财务负担较重，成为制约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更为关键因素。2012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不同期限的贷款基准利率至少下调 1.3 个百分点以上，其中，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 6.56% 降至 4.85%，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由 7.05% 调至 5.40%；而 2015 年上半年人民币各项贷款、一般贷款（不含票据）的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6.04% 和 6.46%，分别比 2012 年下降 0.75 和 0.65 个百分点。2015 年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负增长 0.7%，利息支出同比增长 2.5%。如果考虑信贷相关的其它费用支出，企业融资成本则更高。在这种境况下，央行即使再注入更多流动性，货币也难以完全有效渗透到实体经济中，部分停留在金融体系内成为必然。而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入推进，如果仍只是主要从基准利率调整着手，而不是从其他方面同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效果仍将会打折扣，达不到预期目的，对经济刺激作用进一步钝化，况且当前我国基准利率下调空间已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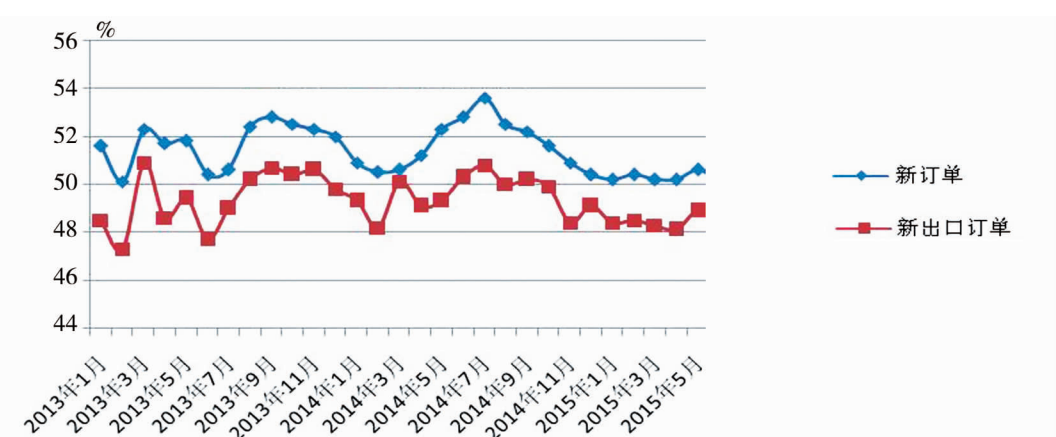


图 4 2013 年 1 月—2015 年 5 月新订单 PMI 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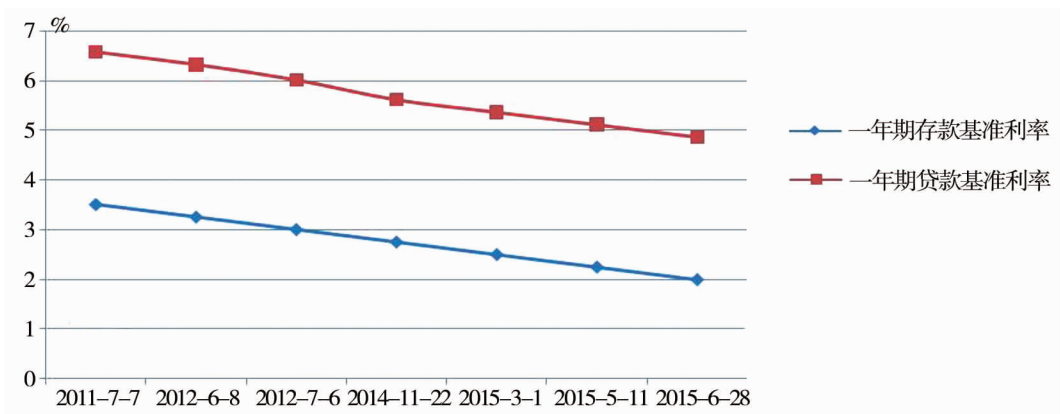


图5 近年来基准利率变动状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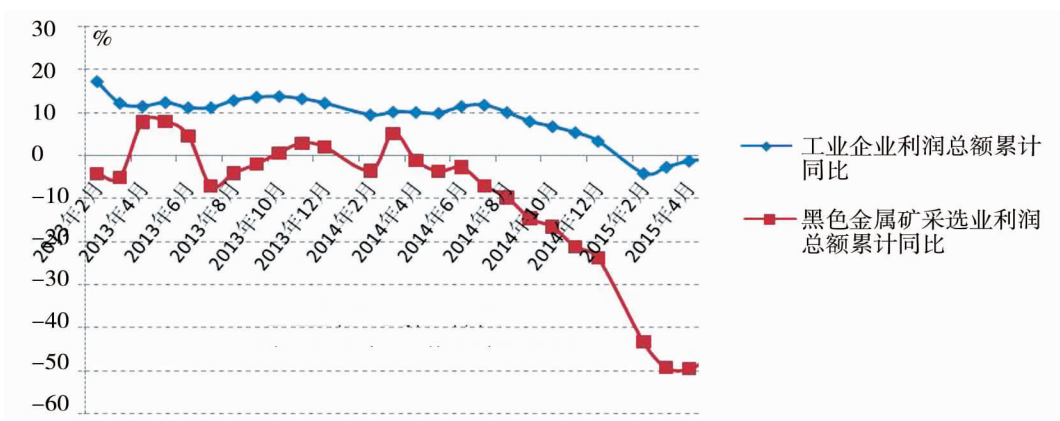


图6 2013年2月—2015年4月企业盈利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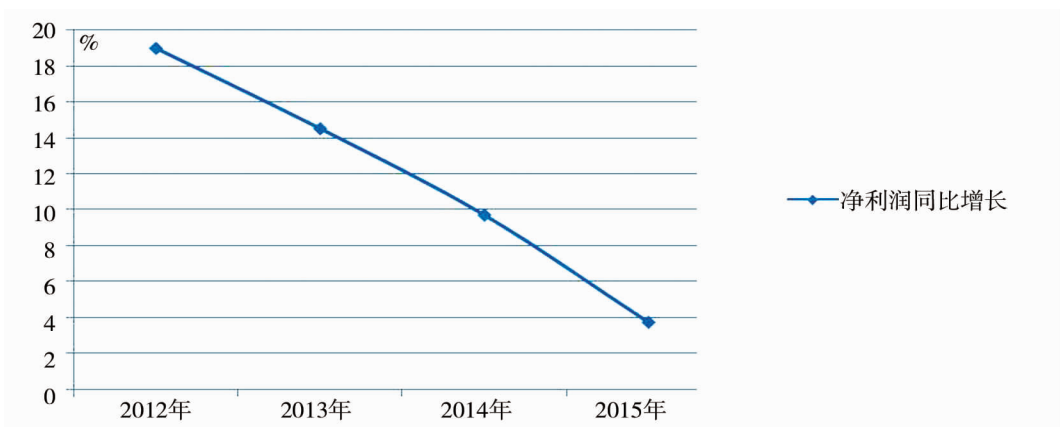


图7 2012年—2015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长状况

数据来源：银监会。

在我国当前的融资格局下，要想解决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货币难以转化为资本的问题，就需要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而现实有效的重要途径是从当前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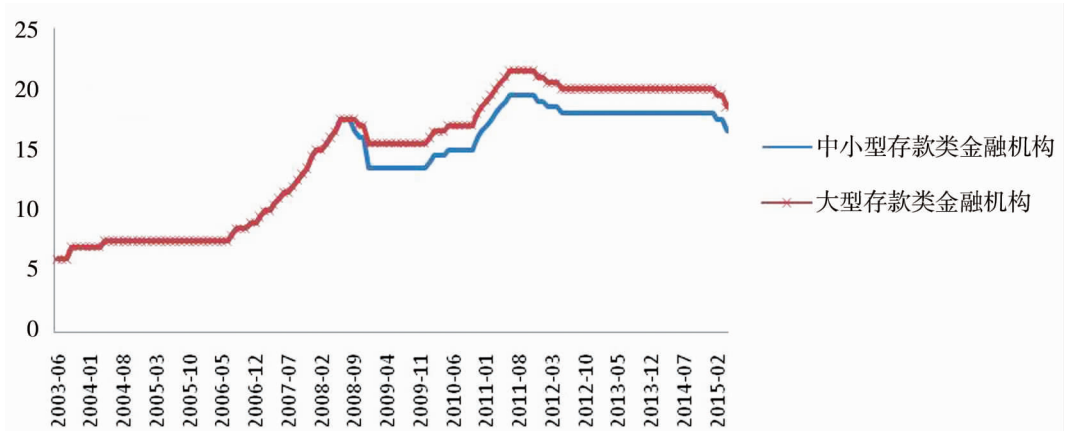


图 8 2003 年 6 月—2015 年 2 月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虽然自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大型、中小型商业银行分别需要将吸收存款的 18.5% 和 16.5% 以上缴存央行，而相应收益率自 2008 年底以来就只有 1.62%，低于商业银行六个月以上存款利率水平，也低于央行再贷款利率（3% 以上）和再贴现利率表（2.25%）。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商业银行存在很大一块被迫配置低收益的资产，客观上影响了商业银行的正常利差获取能力，不仅约束了金融机构放贷能力，也制约了金融机构放贷成本进一步下降。

2013 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增长出现明显放缓，我国货币供应方式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基础货币由外汇占款被动式投放，转变为央行通过常备/中期借贷便利（SLF/M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抵押补充贷款（PSL）等货币政策创新工具配合公开市场操作主动投放，给商业银行流动性支持的同时，较高投放利率水平也约束了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下行。如 SLO 投放利率一般在 3%~4% 之间，MLF 利率在 3.35% 及以上，PSL 利率在 2.85% 及以上，均显著高于存款准备金利率。按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18.5% 计算，如果商业银行需要通过央行中期借贷便利填补存款准备金带来的资金缺口，资金成本约提高 32 个 bps $[18.5\% \times (3.35\% - 1.62\%)]$ ，明显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的利差获取能力。不仅如此，SLO、SLF、MLF 等工具期限较短，无法作为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稳定的资金来源，限制了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能力。为避免期限过度错配，商业银行

只能将这一部分资金用于同业市场。实际上，2013年以来，金融机构一个月同业存款利率，不论是存入报价，还是存出报价，均高于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在坐收利差的情况下，借贷便利多数流向了同业市场。此外，在预算约束加强下，由于借贷便利利率存续期内不会随市场利率变动而变动，遇利率下行期，如果借贷便利的利率高于银行预期的市场利率水平，银行将少借甚至不借，引致工具效果削弱。

考虑我国基准利率下调空间已不大，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作用有限，有必要也有空间通过降低当前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来推动市场利率水平下行。从国际经验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与存款保险制度之间存在替换关系，而非双管齐下。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存款准备金率都处于较低水平，有的甚至为零。在我国已经决定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条件下，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完全必要的。“降准”不仅直接提升银行放贷能力，而且通过释放商业银行存储央行的低收益资产，客观上恢复商业银行本应有的获利能力，使得商业银行在保持合理利差水平的条件下降低其对外融资的利率，进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社会投资。当前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历史高位，“降准”既有利于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同时又为未来货币政策调整做前瞻性安排。如果存款准备金率继续保持高位，当经济重新进入上行周期和通胀压力显现时，那么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很有限，不利于经济运行的平稳。当然，短期内大幅度调降存款准备金率会放大货币乘数，导致货币供应量激增，影响金融稳定。为此，我们建议在调降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适当收回借贷便利和再贷款，既可以对冲货币供应量，又可以降低商业银行的放款成本，达到引导市场利率下行的目的。

责任编辑：沈家文、任朝旺

· 宏观经济 ·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资本结构 和投资领域研究

程凤朝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即经济增长速度变档、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切换。如何在新常态背景下，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调整资本结构、寻找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行业和产业进行投资显得非常重要。本文首先分析和总结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然后，分析欧美发达国家在过去发展阶段是否出现过和中国当前相类似的新常态状况，为中国处理新常态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最后，提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需要调整资本结构和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降低国有资本，提高民营资本比重，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和引领工业转型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具体到微观企业投资时，不仅关注企业的财务指标，更要关注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即 ESG 指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关键词：新常态 资本结构 投资领域

作者简介：程凤朝，中国工商银行股权董事。

2014 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形势正处于“三期叠加”的重要历史时期，“要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国内学者试图从理论和宏观政策层面论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现象。(1)“新常态”的概念辨析和界定。安宇宏(2014)、郑京平(2014)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指出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增长下行压力和结构失衡,实现经济常态化发展。魏宏(2014)指出,经济新常态,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换挡,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增长动力在发生转换。(2)“新常态”的核心问题与解决思路。赵华林(2014)认为经济新常态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运用市场和法治手段改善资本的生存环境。余斌(2014)认为,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宏观调控的整体思路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张云(2014)探讨了新常态下银行的转型方向及路径选择。

新常态就是指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时期不同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西方国家历史上是否经历过“经济新常态”?本文试图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调整资本结构、如何把握投资方向以及如何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给出相应的研究建议。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的新表现,他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3月5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习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新常态其特点体现在:从增长速度看,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结构调整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增长动力看,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打个比方说:如果中国经济是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新常态就是要换挡了,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路子,推动中国经济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具体说来,新常态的特征如下。

1. 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只有三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年—1981年,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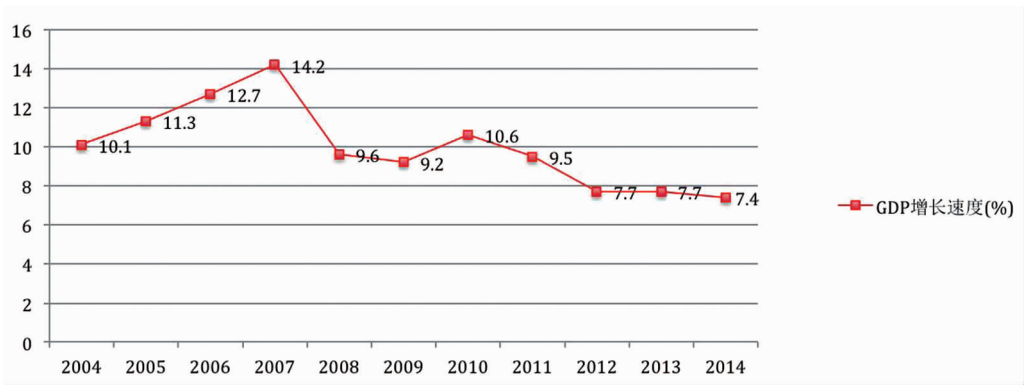


图 1 2004 年—2014 年国内 GDP 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二次是 1989 年—1990 年，第三次是 1998 年—1999 年，这三次回落主要是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扰，之后又迅速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中国 GDP 增长率分别为 7.7%、7.7%、7.4%，这也是历史上第四次出现连续多年 GDP 增长率低于 8.0% 的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 年上半年中国 GDP 增长率为 7.0%，预计全年 GDP 增长率为 7.0% 左右，并将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这次 GDP 增速放缓不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下行区间，而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

2. 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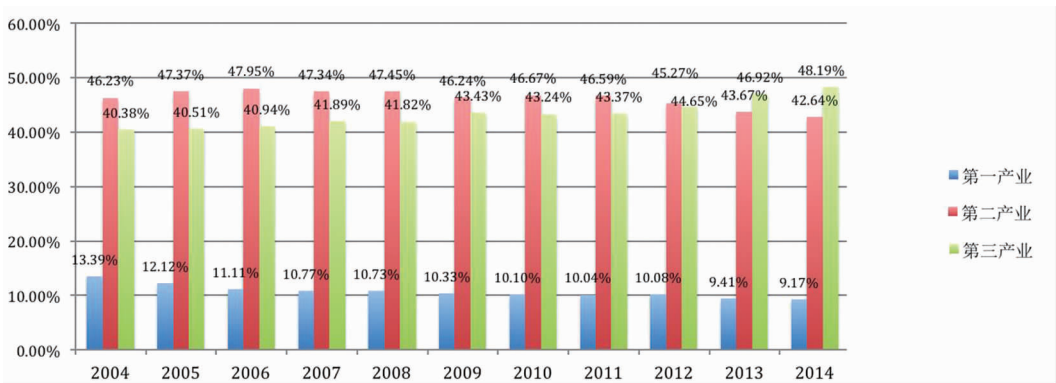


图 2 2004 年—2014 年各产业 GDP 占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展现的是中国近十年各产业 GDP 占比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换：从 2013 年开始，中国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其中，第三产业占比为 46.92%，第二产业比重为 43.67%；201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30.67万亿元，增长 8.1%，占比为 48.19%，高于第二产业的 42.64% 和第一产业的 9.17%，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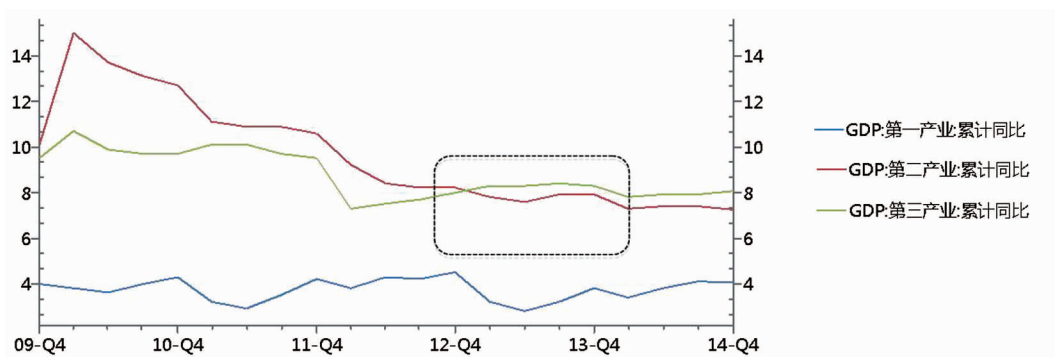


图 3 2009 年—2014 年产业增速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从图 3 可以看出中国三个产业增速在 2009 年—2014 年间的变化情况。2010 年以来，第一产业增速累计同比保持平稳，总体维持在 4%；第二产业增速不断下滑，由 2009 年的 15%逐步下降为 7.4%，而第三产业自 2012 年以来增速不断提高，2013 年以来增速始终保持高于第二产业，累计同比维持于 8%以上。这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转型升级已到了关键阶段，中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

同时，从科技进步、能耗和劳动生产率角度进行考察，也正在发生变化。2014 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2.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多四个百分点（见表 1）。

表 1 2012 年—2014 年增加值增速 (单位：%)

时间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12.3	11.7	12.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3	9.7	10.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年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4.8%，降幅比上年扩大 1.1 个百分点（见表 2）。

表 2 2011 年—2014 年能耗下降表 (单位：%)

时 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能耗比上年下降	2.01	3.60	3.70	4.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72313 元/人（以 2010 年不变价计算），比上年提高 7.0%

(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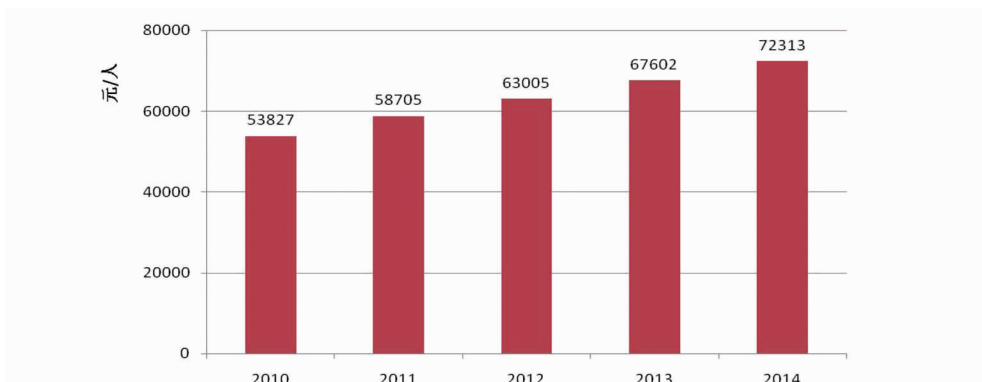


图 4 2010 年—2014 年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以上足以说明，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态势明显，劳动力素质提高、科技进步等因素共同作用其中。

3. 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再从动力转换角度看：

第一，从三个产业对 GDP 增长的拉动来看，2009 年—2014 年第一产业维持在 0.5% 左右，无大变化，第二产业拉动力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逐步转变为 GDP 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2014 年 GDP 增长率为 7.4%，其中第三产业对 GDP 增长的拉动为 3.8%，贡献率为 51.35%，超过第二产业 3.1% 的拉动力和 41.89% 的贡献率（如图 5）。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5 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 6.8%、43.7%、49.5%，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出 5.8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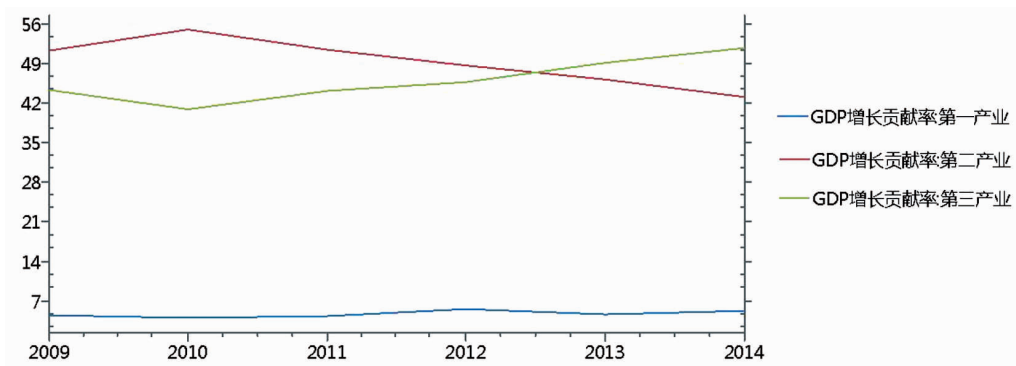


图 5 2009 年—2014 年三个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第二，受国内资源环境以及外部压力影响，近五年，投资和出口对 GDP 的拉动作用

渐显乏力，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逐渐增强。其中，2014年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达到51.2%，比投资高5.1个百分点，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比重只有2.7%，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如图6）。另外，居民消费结构持续改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2014年，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0.6和0.3个百分点。旅游消费增长较快，全年国内游客人次比上年增长10.7%，国内居民出境人次增长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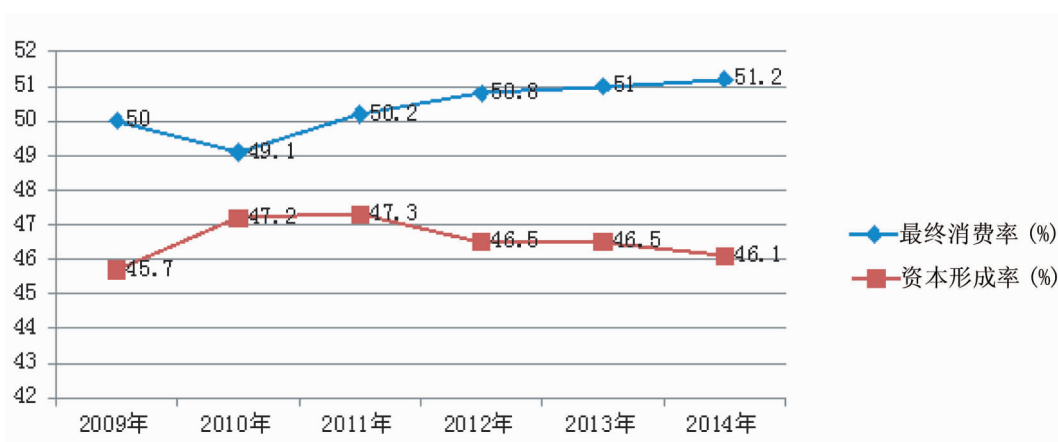


图6 2009年—2014年（支出法）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已经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作为投资者，一定要适应需求新特征（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供给新特征（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生产资源新特征（尤其是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情况），遵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原则，审慎做出投资决策，一定要看到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中央政府既在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在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二、发达国家历史“经济新常态”辨析

2014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中国恰巧处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一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笔者下面对发达国家（地区）处在与中国目前类似阶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考察，重点分析美国、日本、德国三个国家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后GDP增长率变化情况。通过以下几张图表，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在处于与中国类似发展阶段时也经历了经济增速下降的“新常态”

态”阶段。

1. 中等收入发展阶段，GDP 增速均呈现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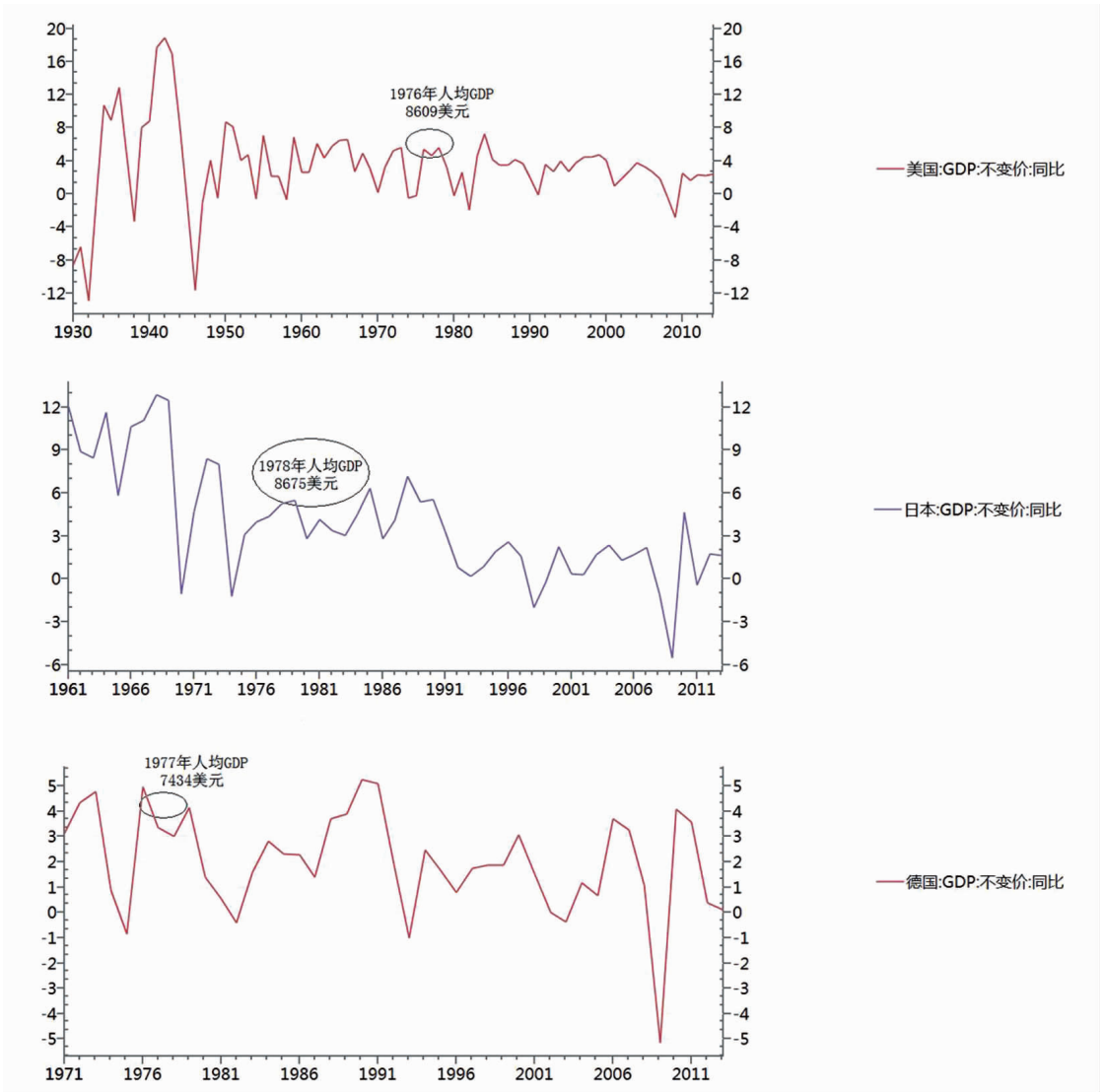


图 7 美日德在人均 GDP 达到中等收入以后 GDP 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从图 7 可以看到，在 1976 年，美国人均 GDP 为 8609 美元，增速为 4.2%，较之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日本于 1978 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发展期，人均 GDP 为 8675 美元，GDP 增长速度为 5.1%；德国于 1977 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发展期，人均 GDP 为 7434 美元，GDP 增长速度 4.2%。美、日、德三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了放缓现象，说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处于与中国类似发展阶段时也经历了经济增速下降的“新常态”。

2. 西方国家在经济结构和驱动力上的表现

从与西方国家（美日德）经济结构对比来看：

表 3 2012 年中美日德四国 GDP 构成（收入法）（单位：亿美元）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GDP	82295.00	161632.00	59545.00	35332.00
第一产业占比（%）	10.00	1.00	1.00	1.00
第二产业—工业占比（%）	45.00	21.00	26.00	31.00
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	32.00	13.00	18.00	23.00
第三产业占比（%）	45.00	78.00	73.00	68.0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从表 3 可以知道，2012 年中国 GDP 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 10%，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占比在 1%~2%；我国第三产业占比 45%，美国第三产业占比高达 78%，其他发达国家也在 70%左右。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结构明显不及发达国家合理，主要是第一产业占比过高，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高，而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

表 4 2012 年中美日德四国 GDP 构成（支出法）（单位：亿美元）

指标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GDP	82294.51	61631.50	59544.73	35332.41
最终消费总额	41505.12	136328.70	48294.03	26478.00
最终消费总额占 GDP 比重（%）	50.43	84.35	81.11	74.94
投资总额	40044.33	30985.90	12427.70	6776.19
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	48.66	19.17	20.87	19.18
净出口	2318.00	-5683.10	-1177.01	2078.21
净出口占 GDP 比重（%）	2.82	-3.52	-1.98	5.88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1) 对比美日德发达国家，中国 GDP 的驱动因素存在较大差异，2012 年消费贡献 GDP 占比为 50.80%，而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比在 70%以上，美国则高达 84.35%；

(2) 2012 年我国投资总额占比 46.50%，而发达国家最高不超过 30%，美国则仅占 19.17%；

(3) 2012 年我国净出口占比约为 2.70%，而发达国家大都为负数，存在一定差异。

以上不难看出，虽然消费因素对 GDP 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但总体效果还没有达到预期，还不能成为促使经济发展最主要驱动因素。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资本结构和投资领域研究

综上所述，当经济发展进入人均国民收入 8000 美元左右，不可能再保持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在数十年内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全社会更加关心发展质量、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这是国际经济发展长期实践的结果。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趋势下，从宏观角度讲，社会资本结构该如何调整，社会资金该如何配置？从微观角度讲，投资过程应更多关注那些指标？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调整资本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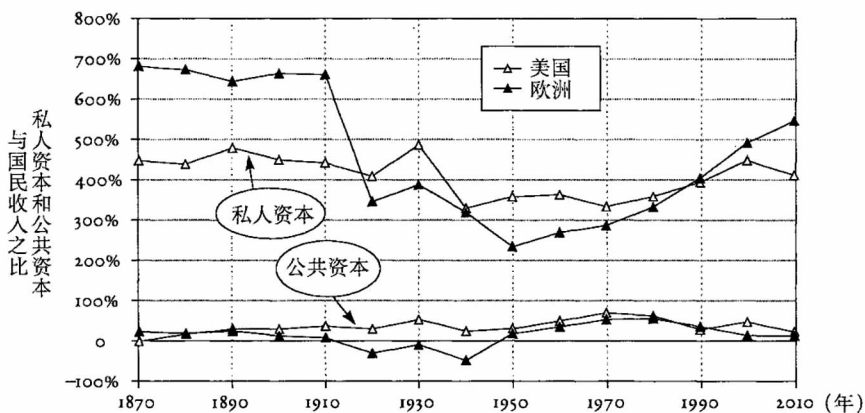


图 8 1870 年—2010 年欧洲与美国的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①

图 8 显示，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要以私人为主，从与国民收入对比来看，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早期，当时欧洲的资本存量为 6~7 年的国民收入，而美国则是 4~5 年的国民收入，如今欧洲的资本/收入已经接近 600%，美国略高于 400%。这既是多年来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结果，也是不断进行私有化改造的结果。以英法为例，1979 年—1987 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大力推行私有化，先后将全国性大型国有公司甚至国家垄断性企业实现了私有化，经过这次改革后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 11.1% 下降到 6.5%^②。法国也积极推行私有化计划，从 1986 年起，用五年时间对 65 家银行和企业实行了私有化，总资产达 2750 亿法郎，私有化的对象都是经营良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新兴

①【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工业集团，还包括电视台^①。

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社会资本结构则是以国家公共资本为主。

中国社会总资本究竟是多少，查不到完整数据，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各方面资料汇总，2010年社会资本大约是一倍的国民收入，其中公共资本是国民收入的75%左右，私营资本占30%左右，公共资本大约是私营资本的2~3倍（如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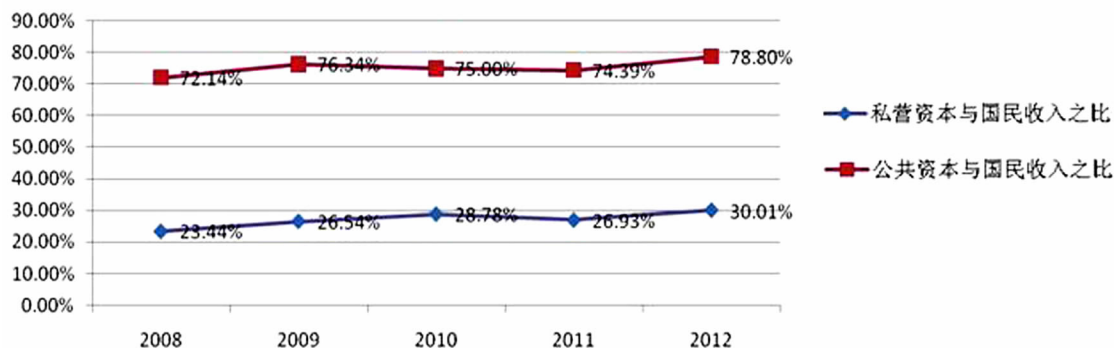


图9 中国2008年—2012年私营资本和公共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测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公共资本占主导地位是公有制的核心内涵，国家握有雄厚的资本才能集中精力办大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在。但是，公有制不动摇、公共资本占主导地位不动摇，不等于不调整结构和比例，适当出让一部分公共资本，适度退出国民经济非重点领域，适度降低公共资本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资本比重同样不会影响国家的调控力度，相反会激发各方面活力，提高资本的效率和效益。这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决定所在。

那么，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调整社会资本结构？笔者认为，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早在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就分析了市场经济的缺陷，主张通过政府纠正市场的缺陷来使社会财富得到尽可能有效的使用。后来凯恩斯、萨缪尔森相继系统地论述了混合经济，时至今日，混合经济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特征。事实上，我们对发展混合所有制也早有认识，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有重要论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赋予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

^①黄文杰：《法国私有化再研究》，《世界经济》1991年第9期。

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必要性的最高论述，本文无需再过多赘述。在此主要是呼吁国有独资、股份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加快“混改”步伐，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再以种种借口，拖延或者坚持一股独大。以 16 家上市银行为例，截至 2014 年底，总股本 15099.79 亿股，其中国有股份为 9692.57 亿股，占 64.19%，其中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总股本为 12170.30 亿股，国有股份 8552.47 亿股，占 70.27%。在外界看来，四大银行是最赚钱的银行，2014 年合计净利 8612.41 亿元，其中分红比例为 32.66%。但从历史和现实看，四大银行的经营始终处于高压之下，历史上看，两次剥离不良资产 32358.00 亿元，在四大行改制时，国家注资 790 亿美元，是巨额损失最终承担者。现实上看，虽然这几年四大银行产生了巨额利润，但从股改上市以来，利润增幅持续降低，2015 年上半年更是急剧下降，四大行中除中国银行以外，净利润增幅均不足 1.0%，不良资产逐年反弹，2013 年以来反弹加速。

表 5 2010 年—2015 上半年国有四大行净利润增幅 (单位:%)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6 月 30 日
工商银行	28.35	25.55	14.51	10.17	5.07	0.70
农业银行	46.01	28.50	19.00	14.52	8.00	0.50
中国银行	28.52	18.81	11.84	12.35	8.22	1.69
建设银行	26.39	25.48	14.26	11.12	6.10	0.97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表 6 2010 年—2015 上半年国有四大行不良贷款率 (单位:%)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6 月 30 日
工商银行	1.08	0.94	0.85	0.94	1.13	1.40
农业银行	2.03	1.55	1.33	1.22	1.54	1.83
中国银行	1.10	1.00	0.95	0.96	1.18	1.41
建设银行	1.14	1.09	0.99	0.99	1.19	1.42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由于资产规模快速扩张，2014 年底，工农中建四行总资产分别达 213966.33 亿、159741.52 亿、152513.82 亿和 167441.30 亿，年复合增长率平均为 22.18%，由此给四行带来补充资本的巨大压力，2014 年，四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4.53%、12.82%、13.87%、14.84%和 12.19%、9.46%、11.35%、12.12%，而监管部门对全球

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标准是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1.5 %、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9.5 %，四行据监管要求都一步之遥，疲于筹措资本。因此，建议将一部分股权出售给机构投资者、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这样做对分散、转移经营风险、减轻补充资本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绝对利多弊少，尤其是引进机构投资者对完善公司治理、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意义重大。

（二）大力调整社会资金投向，促进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在新常态下，除了首先要注重调整资本结构外，其次就是要下大力调整包括资本负债在内的社会资金投向，从齐头并进各行各业都投入，转向有保有压、有所为有所不为，目的在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使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得到改善。

1. 从原材料消耗向高附加值转变，走新型工业化路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加快发展，主要原材料产品产量很多品种全球领先。

表 7 2005 年—2014 年中国原煤、粗钢等工业产品产量

指 标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原 煤	38.7	36.8	36.5	35.2	32.4	29.7	27.9	25.3	23.7	23.5
原 油	2.1	2.1	2.1	2.0	2.0	1.9	1.9	1.9	1.8	1.8
水 泥	24.8	24.2	22.1	21.0	18.8	16.4	14.2	13.6	12.4	10.7
粗 钢	8.2	7.8	7.2	6.9	6.4	5.7	5.0	4.9	4.2	3.5
钢 材	11.3	10.7	9.6	8.9	8.0	6.9	6.0	5.7	4.7	3.8
有色金属	4380.1	4054.9	3697.0	3435.4	3121.0	2648.5	2520.3	2379.2	1916.3	1635.0
精炼铜	764.4	649.0	575.7	524.0	458.7	413.5	378.9	344.3	300.2	260.7
电解铝	2435.8	2205.9	2020.8	1767.9	1577.1	1288.6	1317.6	1234.0	926.6	778.7
氧化铝	4777.3	4437.2	3769.9	3417.2	2893.0	2379.3	2278.2	1946.7	1325.7	859.2
纯 碱	2514.2	2435.0	2395.9	2294.0	2034.8	1944.8	1854.6	1765.0	1560.0	1421.1

注：原煤、原油、水泥、粗钢和钢材产量单位为亿吨；后面五种产品产量单位为万吨；有色金属产量是指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表 7 中列举的这些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大国实力，也为中国这些年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快速开发提供了基础。但这种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是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过度的资源消耗，极易受到资源稀缺性的限制，经济效益低，增长不可持续。二是先污染后治理，治理成本高。英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同样经历了环境恶化、

生态失衡等问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治理代价，有前车之鉴，我们不应走他们的路子。三是城乡差距扩大，出现诸多“城市病”。在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非农化、城市化的历程。最突出地是拉大了城乡差距，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震荡。为此，党的十六大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势提出未来发展方向是新型工业化，其内涵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将新型工业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意义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经济信息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信息化是 21 世纪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容和特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向各个领域渗透，诞生许多新兴产业，也使传统产业发生革命性变革，国际分工、协作、交流日益扩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信息化、全球化改变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内涵和实现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新的时代背景决定中国不能离开信息化去搞工业化，也不能以粗放型增长方式去发展，必须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国情是制约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国情必须选择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信息化也只是有了初步的发展。产业结构还不合理、层次也比较低，生产力和科技、教育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三农”问题突出，城市化依然滞后，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大，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问题严峻，社会保障压力增大。人均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保护环境和资源的任务十分艰巨。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克服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缺陷，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程进行反思的结果，是人类为了克服一系列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广泛的生态破坏，以及它们之间关系失衡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互相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唯一正确的发展战略。那种“先污染后治理”、过度消耗资源、片面追求高速度而造成经济增长剧烈波动、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严重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那么，新型工业化又有哪些特点和涉及哪些领域呢？笔者研究认为，新型工业化道

路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条件和目标要求，弥补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不足，形成新的特点。

第一，由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同时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即走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大特点。只有走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抓住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特有的带动功能，既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又跟上信息化的步伐，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以集约型增长为主的工业化。中国过去走的是以粗放型增长为主的工业化道路，自然资源消耗多，资金使用效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工业化的成效并不理想。相反，新型工业化道路以集约型增长为主，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提高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质量和效益。

第三，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工业化。提高经济效益是首要的经济规律，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相互关系，注重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

第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世界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的不断恶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不同的根本特点。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环保产业，推行清洁生产，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和资源，走“边发展边保护”的新路子。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发展阶段，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工业发展也面临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和挑战，全社会投资应该也必须响应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重点投资于以下领域。

第一，工业绿色化：节能环保装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的新任务为高效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据相关机构估算，“十二五”期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将达到3.1万亿，这必将推动环保装备产业的发展。预计“十二五”期间，脱硫脱硝、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资将达6000亿元，工业行业余热余压发电、“三废”综合利用以及烟尘、粉尘控制领域均存在巨大投资需求。

第二，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装备。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传统重工业服务为导向的装备制造所推动的，在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增速逐步放缓、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产业结构逐步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传统装备制造业将面临转型升级的难题。随着信息技

术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智能制造装备发展水平也日益提升，以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成套生产线为代表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当前，中国经济的重点放在产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壮大，摆脱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为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目标：到 2020 年，将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培育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导产业。建立完善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系，产业销售超过 30000 亿，实现装备的智能化及制造过程的自动化，使产业生产效率、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第三，工业服务化：产业延伸服务转型。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战略是一条非常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以低人力成本为中心的竞争方式，企业要投入资源进行研发的创新、营销的创新和发展方式的创新。工业企业向服务业的转变是一条必由的创新之路。

2. 从第一、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倾斜，全面振兴现代服务业

第三产业，又称第三次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行业，即服务业。而我们所说的现代服务业也就大体相当于现代第三产业。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现代服务业是为了适应现代人和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服务业，具体有以下几个领域：基础服务（包括通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生产和市场服务（包括金融、物流、批发、电子商务、农业支撑服务以及中介和咨询等专业服务）；个人消费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保健、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旅游、房地产、商品零售等）；公共服务（包括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以及公益性信息服务等）。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发展现代服务业主要有以下重要作用。

首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主渠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平均吸收就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很低。大力发展教育、文化等服务业，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素质结构，使中国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其次，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都非常严重。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轻对环境的损害，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最后，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鼓励大众创新和万众创业的力量源泉。目前，中国正处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时期，需要源源不断的创新力和滔滔不竭的创造力。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更具有灵活性和创

新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激发大众的创新潜能，也为更多的人走上创业之路提供有利条件。

需要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先发展第一、第二产业，只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到一定程度才能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据现有资料分析，美日德三国分别从1945年之前、1960年、1970年第三产业开始超越第二产业。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处于由中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上升时期时，是服务业加速发展并开始超越第二产业的时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此类阶段。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已经超过工业，服务业就业人数已经超过农业，说明中国第三产业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同时政府也更加重视，给与政策扶持，把现代服务业提高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企业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热情也非常高涨。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服务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不仅局限于传统的衣食住行，更多地是基于新技术的服务业。

当然，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内部结构的改善升级。一是要突出金融业、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以银行所在的金融业为例，美国目前有约7000多家银行，且分级非常清晰，各自承担各自的服务领域。中国的银行业无论从规模数量还是从整体分工结构上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与调整。二是提升以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从世界500强企业来看，中国在榜单内的是石化金融等企业，而美国是苹果、IBM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促进工业转型，由传统工业向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型工业转变，以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互联网和现代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是基础。三是激发旅游、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等需求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潜能。目前，发达国家健康产业占GDP产值比例均超过15%，例如美国为17%，而瑞士的规模甚至已超过其传统的钟表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中国目前占比约为5%，与之差距甚大^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健康服务业作为新兴的现代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需求，也是中国未来需要加快发展的重要服务业之一。

当然，要加快发展这些服务业，还需要社会投资，尤其是银行信贷支持。2013年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比重为163.00%，美国为240.50%。根据发达国家银

^① 阎逸、夏谊：《发达国家健康产业发展经验及启示》，《今日浙江》2015年第7期。

吕岩：《健康产业：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机遇和挑战》，《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1期。

汤子欧：《美国健康产业的发展及启示》，《中国保险报》2012年10月18日。

行贷款发放总量来看，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贷款总量仍处于合理区域，并未超发。而从信贷投资结构来看，以 16 家上市银行为例，截至 2014 年底，法人信贷总量 376209 亿，其中制造业占 26.23%、房地产占 11.37%、基础设施占 27.91%，远远超过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见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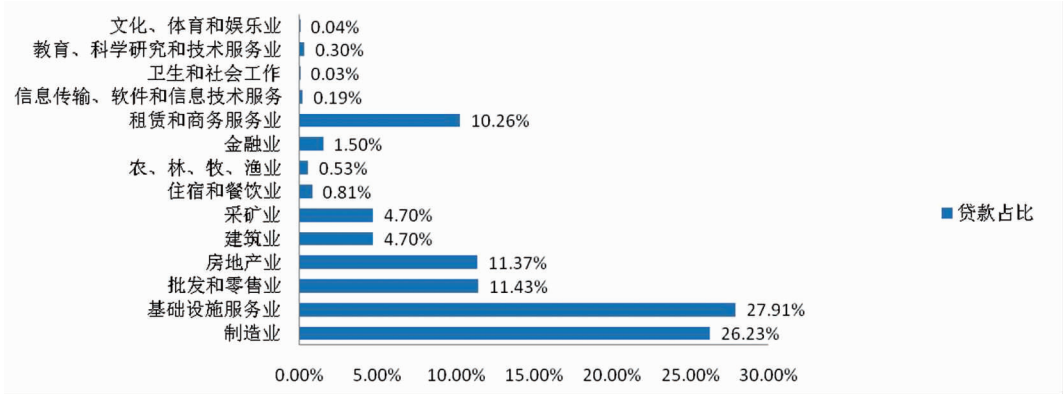


图 10 2014 年中国 16 家上市银行法人贷款各行业分布情况

图 10 表明，银行信贷结构明显不适应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需求，所以要加紧投资结构的调整，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投资规模和资金支持力度。按照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充分把握“互联网+”行动的实施计划，持续提高对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以及对个人消费服务和公共服务等具有潜力的现代服务业的信贷投入，创新加强对移动互联网、科学研究等新兴支持性现代服务业的资金支持。

（三）更加关注企业综合素质

从选择具体的投资项目来看，过去考察一个投资项目，主要关注财务、市场、业绩等指标，这些的确很重要，是衡量一个企业发展程度的重点指标。但是如果企业的收入、产品、利润是通过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不负责任的方式得来的，那么其产生的负面价值将远远超过正面影响。

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治理中心助理主任凯莉·许内肯斯研究揭示，有关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公司提案获得股东支持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一比例从 2005 年的 10% 提高到 2011 年的 21%。获得股东较高支持率的提案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游说、公司及董事会多元化等方面。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在评价一个企业时还应该十分关注 ESG，即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指标。这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

环境方面问题及能源消耗、水的供应和排放、废品废物的处理以及污染的控制程度，

不仅是衡量企业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所以在企业环境方面的考量还需要有关部门的强制规定。首先要有高标准并不断更新，其次就是抓落实，对不达标或超标的，决不能一罚了之，而是要关门破产，斩断融资渠道，银行不贷款，股权不投资，对盲目支持者同样予以处罚。

人力资本，如员工的敬业程度、创新程度和供应链管理以及劳动权利的保障程度，以及社会责任的承担、社会回馈等方面的作为。这些都是投资融资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一个惟利是图、缺少社会责任的公司，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都应拒绝。

公司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又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投资者在考虑一个项目时，应该着重关注的企业发展指标。一个治理状态良好的企业，应按照“权责清晰、分工明确、有效制衡、科学决策”的治理内涵，建设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处理好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客户和员工）的关系，在规范的治理轨道上前行。

ESG 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将 ESG 与投资过程中的金融因素相结合，通过对人类和地球危害的最小化，能够减少未来投资风险，带来有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成果。

参考文献：

1. 安宇宏：《新型城镇化》，《宏观经济管理》2014 年第 2 期。
2. 刘世锦、余斌、吴振宇：《促进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决策探索》2014 年第 18 期。
3. 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改革》2014 年第 11 期。
4. 张云：《主动适应和服务经济新常态》，《中国金融》2014 年第 21 期。
5. 赵华林：《树立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环保新思维》，《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21 日。
6. 郑京平：《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应对建议》，《中国发展观察》2014 年第 4 期。
7. 巴曙松等：《21 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8. 张国强、郑江淮：《中国服务业发展态势及其国际竞争力：“金砖四国”比较视野》，《改革》2010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任朝旺

· 国际经济 ·

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

王志乐

摘要：最近 20 多年，跨国公司逐渐向全球公司转型。全球公司是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它们拥有了全球战略、建立了全球管治结构和承担了全球责任，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跨国指数超过 50%。全球公司经营重心在海外，形成了全球经营的思维模式和经营模式。全球公司在华投资不仅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动机，也成为中国现代企业成长、现代产业壮大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催化剂，而且还与中国经济发展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从而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同盟军。与此同时，全球公司也给中国企业乃至整个经济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促进中国企业 and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了解和研究跨国公司这一发展新趋势，向全球公司学习，与全球公司合作，同全球公司竞争，在学习、合作和竞争中成长并壮大一批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全球公司 对外开放

作者简介：王志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

最近 20 年来，全球范围内企业界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下，企业界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向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s）的转型。简要地说，跨国公司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建立分支机构，由母公司统筹决策和控制，从事跨国界生产经营活动

的经济实体。全球公司则是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它们拥有全球战略、建立全球管治结构和承担全球责任。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其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比例的平均数）超过50%。由于主要收入、主要资产均来自海外，全球公司经营重心在海外，其发展战略、管治结构和理念文化更注重全球，形成了全球经营的思维模式和经营模式。

全球公司已经全面进入中国。全球公司在华投资不仅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动机，也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出现和成长、现代产业形成和壮大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催化剂，而且还与中国经济发展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从而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的同盟军。与此同时，全球公司也给中国企业乃至整个经济带来了严峻挑战。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了解和研究跨国公司发展这一新趋势，向全球公司学习、与全球公司合作、同全球公司竞争，在学习、合作和竞争中成长并壮大一批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

一、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

跨国公司真正向全球公司转型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研究跨国公司转型为全球公司这一过程时，必须了解全球公司产生的背景。

（一）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的时代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出现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新变化。这些根本性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跨国公司经营和竞争的环境、条件及规则。

首先，冷战结束导致全球市场形成。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开始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1989年11月—1991年12月，东欧与苏联发生剧变。自此，持续40余年的冷战结束，给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两个对立的阵营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主流；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取代过去的军备竞赛。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扫除。自此，超越政治地理界限的全球统一市场开始形成，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发展。

其次，1995年前后，因特网开始被商业化广泛应用，移动电话也开始普及，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革命使得全球联系空前加强，全球市场才得以真正形成和运行。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革命，使得跨国公司的战略和管理在全球范围能够真正实施。这些重大科技成就的全面产业化，引起了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手段的重大变革，使世界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步进入信息化和智能化阶段。经济全球化

并非始于今日，经济全球化就其根源应始于资本来到世间所形成的一股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 经济全球化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它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展和深化。1995 年开始运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算起，在短短的不到十年时间里，全球政治、科技和经济领域均集中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时间集中，意味着这些变化同步进行。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极大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形成。经济全球化潮流改变了企业经营环境、竞争方式和竞争规则。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和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潮流，跨国公司原有的发展战略、管治结构以及理念文化均面临严峻挑战。

（二）全球战略：从跨国经营走向全球经营

1992 年以来，也就是全球市场出现以来，许多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战略调整，按照企业经营系统的功能重新配置资源，以适应全球市场的出现。全球市场形成，使得企业可以在全球选择最有成长性的市场作为经营重点。过去，发达国家市场是企业征战的中心地区。现在，新兴市场往往成为新产品急剧增长的市场。全球市场形成，使得企业可以超越原有的国家地理界限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由于劳动力、原材料、能源、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各地性价比不同，企业有了在全球选择要素和打造全球价值链的可能。它们把全球性价比最好的资源吸纳和整合到自己的价值链中，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无论是主动发起还是被动应对其他公司来自全球市场的挑战，跨国公司都不得不根据全球市场制定全球战略，从而保持现有竞争优势和开发新的竞争优势。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过去在多个国家的跨国经营战略调整为全球发展战略。全球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它们或者在全球最适宜的地点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开发中心、财务结算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来完善全球价值链；或者把价值链若干环节外包，充分利用其他企业、其他国家的资源；或者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和并购其他企业，吸纳整合全球最优资源，打造全球价值链和完善全球产业系统。

（三）全球管治：全球管理网络和治理结构

随着企业发展战略的转型，跨国公司的管治结构也相应进行了调整。跨国公司管治结构的全球调整包括股权全球化、公司治理结构全球化和治理结构适应全球化进行调整三个层面的变化。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3~276 页。

1. 股权全球化——外资股权比例急剧上升

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以金融资产全球自由流动推动全球化为特征，金融资产自由流动必然导致企业股权全球化。最近十几年，跨国公司纷纷在全球多个股市上市融资。德国巴斯夫（BASF）公司股票在法兰克福、伦敦和苏黎世三地交易所上市。BASF 公司外资股份 1997 年占全部股份的 27%，2001 年增加到 35%，2005 年达到 52%。过去，日本跨国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在日本股东手中。1998 年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积极加大全球化力度。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股权全球化，增加外资股权。

表 1 1999 年—2013 年若干日本企业外资股权变化情况 (单位:%)

	索尼	松下	东芝	富士通	NEC	本田	新日铁
1999 年	43.6	20.3	11	14.5	13.6	17.8	10.3
2013 年	52.6	28.4	26.2	34.9	27.3	36.2	25.0

资料来源：日本四季社，《日本公司手册》。

股权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公司吸纳和整合资金的范围从一个国家为主转向从全球吸纳资金，也意味着跨国公司从为一个国家的股东负责的公司逐步演变为为全球股东负责的公司。股东结构的变化显然是跨国公司管理、治理结构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2. 公司治理结构全球化

正是由于股权的全球化，带动了跨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1992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董事会的构成也出现了全球化趋势。美国学者 Gillies 和 Dickinson 选取了 80 家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在 1993 年这 80 家公司中有 36.3% 的跨国公司至少有一名非本土的董事会成员。另一位学者克利福德研究发现，到 2005 年这些公司中有 75% 的跨国公司至少有一名非本土的董事会成员。平均来看，跨国公司董事会非本土成员所占全部成员的比例达到 25%。

3. 公司管理结构的调整——全球网络

过去跨国公司是以母国为中心辐射若干国家子公司的中心辐射式管理模式。在这一阶段，公司总部拥有绝对的决策控制权，而现在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全球各个市场当地化经营的需要，过去单纯的纵向管理结构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全球各个地点经营条件的迅速变化。跨国公司需要在全世界市场的若干重点地区和国家设立地区总部，统一管理协调公司各个业务部门在当地的经营活动。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纵向的业务分部以及横向的地区总部，使得这些公司形成了新的管理架构，这是一种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网络管理模式有利于全球公司对全球范围经营环境的变

化作出更迅速的反应，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

通过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以及管理结构的调整，一批跨国公司管理和治理结构全球化程度大大增加。全球化管理、治理结构既有利于跨国公司在全全球范围吸纳资源，也有利于跨国公司在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从而大大增加其在全全球的竞争力。

（四）全球责任：以责任为核心的公司文化

跨国公司走向全球，面临如何吸纳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整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市场，与不同文化背景政府打交道的问题。为适应全球竞争与合作，跨国公司调整了企业经营理念和文化。

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跨国公司在全全球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就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潮流影响到全世界，全球市场形成，全球公司崛起。人们在发挥跨国公司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希望遏制跨国公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1999 年 1 月 31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中批评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2000 年 7 月 26 日，《全球契约》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发起进入实施，提倡包括人权、劳工、环境等三个方面的九项原则。2004 年 6 月，又增加了反对商业腐败的第十项原则。《全球契约》是一项自愿性的倡议，鼓励企业或组织广泛参与，是人们解决全球化带来种种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即发挥全球化中强者——跨国公司的作用，使跨国公司成为解决社会环境等问题的积极力量。15 年以来，已经有 8000 余家世界著名企业加入。《全球契约》成为跨国公司强化公司责任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跨国公司强化责任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从过去强调经济责任到强调包括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等在内的全面责任。

2008 年 12 月，西门子公司因通过行贿获取商业合同而向美国和德国司法机构付出 16 亿美元的罚金（以和解形式出现）。这一事件轰动全球商界。据调查，以西门子公司被处罚为标志，2009 年以来，许多跨国公司都建立或强化了合规管理体系。不少公司设立了专门的合规专员，负责培训、制定规则，监查公司运行流程中的违规现象，处理违规事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强化在海外子公司的合规反腐。这一趋势表明，跨国公司不仅需要承担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全面责任，而且要承担在海外规范经营的责任，包括合规反腐，即全球责任。这是全球化时代企业责任的又一次提升。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主要是硬件竞争上升到软件竞争，从过去主要是技术、产品竞争上升到公司责任理念以及公司道德水准竞争。先进的公司责任理念成为企业制胜不可或缺的软竞争力。

(五) 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

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不仅扩大了经营地域，而且从战略、结构到理念文化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全球化潮流中，跨国公司通过战略、管治架构和理念文化的调整，完成了从跨国公司到全球公司的转型。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大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最近 20 年，全球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1994 年，全球最大的 100 家跨国公司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 41%，到 2012 年上升到 60%；海外资产总额则从 1994 年的 15879 亿美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76983 亿美元，近 20 年中增加了约四倍。同期，最大 100 家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占其总销售的比例从 46% 增加到 65%，海外雇员比例则从 43% 增加到 59%。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2 年全球 100 大跨国公司中，跨国指数超过 50% 的有 88 家，超过 70% 的有 42 家。而 1994 年，跨国指数超过 50% 只有 43 家，超过 70% 的只有 16 家。

表 2 1994 年—2012 年全球 100 大跨国公司全球化程度的变化

		1994 年	1999 年	2005 年	2012 年
资产 (亿美元)	国外	15879	21240	47320	76983
	总资产	38631	50920	86830	128415
	国外/总 (%)	41.1	41.7	54.5	60
销售 (亿美元)	国外	18265	21230	37420	56620
	总销售	40023	43180	66230	87269
	国外/总 (%)	45.6	49.2	56.5	64.9
雇员 (万人)	国外	534	605	803	985
	总雇员	1225	1328	1511	1688
	国外/总 (%)	43.6	45.6	53.1	58.4

注：1994 年资产栏数据实为 1995 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历年《世界投资报告》整理。

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新型的跨国公司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其跨国指数超过 50%。当一个公司超过一半的资产在海外，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超过一半的雇员在海外就业时，这家公司的思维方式和经营模式就与一般跨国公司发生了巨大的差异，海外经营成为这家公司的重心。其战略、管理结构和理念文化必然发生重心转移。对于这些公司而言，海外经营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母国经营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公司的资源越来越多地向海外转移。这种情况在瑞士、荷兰、北欧一些小国的跨国公司中特别明显。

来源于小国的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比较高，是因为这个公司所在国家市场规模不大，

企业做大必然向海外扩张。美国市场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美国公司在本土市场经营有着极大的空间。因此，在我们研究的起点，即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公司跨国指数往往并不高。但是在 1992 年后 20 年间，美国的惠普、IBM、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福特等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也都出现了大幅度提升。这一事实表明，许多美国公司也超越巨大的本土市场把经营的重心转移到了全球市场。这一事实特别值得中国企业关注。中国同样也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本土企业在本土市场同样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和中国企业进一步成长壮大，中国企业也必然会像美国企业一样在开发巨大的本土市场同时开拓全球市场更为巨大的空间。

（六）全球公司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

全球公司一经出现，就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企业经营模式，也改变了企业竞争方式和竞争规则。在全球公司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产业成为全球产业。全球公司极大地开发了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了过去难以想象和企及的巨大财富。与此同时，全球公司也给人类的环境、社会带来巨大挑战。

1. 带动全球产业的发展

随着全球公司的兴起与发展，全球各个重要产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产业存在于各个民族国家之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一个国家内得到配置，产业发展所需要素主要从本国获取。现在，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全新的模式。产业发展所需资本、技术、人才、原料、市场等资源在全球范围获取。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在内的产业链在全球布局；在若干国家和地区围绕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形成企业集群；产业链和企业集群形成超越国家地理界限的全球产业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往往有若干全球公司作为龙头企业整合全产业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成为全球公司最主要的竞争力。

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发展产业。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汽车产业全球化突飞猛进。由于全球市场形成、技术突破（节能减排、平台技术等）、成本压力等因素，催生了汽车全球产业。在汽车产业中，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高度全球化；研发设计、制造组装和营销服务产业链各环节超越单一国家范围实现全球布局，各主要市场形成产业集群。通用、大众、丰田等企业主导了汽车产业发展，而这些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公司。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全球化指数在 1993 年不过 26.4%，2012 年已经达到 60.5%；丰田公司的全球化指数则从 1993 年的 32.3% 提高到 2012 年的 66%；大众公司本来全球化指数就比较高，1993 年已经达到 54.4%，到 2012 年进一步提升到 78.3%。正是

这些汽车全球公司引领了最近 20 年汽车产业的全球化，使得汽车产业成为全球型产业。

表 3 1993 年—2012 年六家著名汽车公司全球化指数的变化 (单位:%)

	通用	福特	丰田	本田	大众	宝马
1993 年	26.4	34.4	32.3	35.3	54.4	43.3
2012 年	60.5	47.5	66.0	92.4	78.3	55.1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历年《世界投资报告》整理。

如同汽车产业的变化一样，电信、制药、电器和能源等产业 20 年来也迅速走向全球产业。在行业内全球公司带动下，各个产业的龙头企业在全球寻找性价比最高的生产要素加以整合，并且超越民族国家地理界线在全球最适合的地点配置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它们在全球最重要市场建立营销基地，在研发基础最好的地点设立研发和设计中心，在劳动力性价比最高的地点设立制造组装基地。众多的中小企业则与作为产业龙头的全球公司建立关联，成为全球龙头企业的供应商，为它们提供零部件或各种服务，或者成为全球龙头企业的销售商，为它们提供销售服务。由于吸纳整合了全球最优资源，所以这种跨越国家地理界线的产业组织模式，为全球产业及全球产业生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基础。

2. 促进全球生产力大发展

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产业的形成，使得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被空前开发出来。发达国家先进的研发设计成果，被应用到全球各个地区；中国和东南亚数以亿计的性价比颇具优势的劳动力，为全球市场组装和制造各种产品；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被开发出来，并源源不断地从中东和澳洲等地运往全球各个制造中心；纽约、伦敦、香港等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则为全球商业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如同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无数新财富一样，随着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新财富。

如表 4 所示，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14 年，全球 500 强公司销售收入几乎增加了两倍，净利润增加了四倍。2000 年以来，500 强公司利润先从 6672 亿美元减少到 3060 亿美元，然后迅速增加到 2013 年创纪录的近两万亿美元。20 多年来，500 强公司经营状况大幅度改善，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能源、资源类企业由于产品价格上涨而改善赢利状况，但是，最近十几年跨国公司全球化程度提高，吸纳整合全球资源能力和盈利能力加强显然是主要原因。全球 500 强公司中并非全部是全球公司，但是其中大多数已经或正在成为全球公司，它们往往成为所在产业的整合者。500 强公司经营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其影响。

表 4 1995 年—2014 年财富杂志全球 500 强公司历年经营数据

年度	营业收入额 (百万美元)	利润 (百万美元)	资产额 (百万美元)	股东权益 (百万美元)	员工 (人)
1995	11378387	323338	32136550	3347788.8	35119851
1996	11434819	404408	33271047	3624219.8	35517692
1997	11453516	452032	34187773	3724138.3	36770153
1998	11463407	440271	38989284	4233812.4	39685624
1999	12695951	554011	44002771	5010578.0	43955988
2000	14064960	667209	45807624	5527401.9	47225289
2001	14009959	306092	48664506	5643920.8	47810635
2002	13729041	133473	52607346	5535837.0	46492660
2003	14873027	731159	60814536	6782352.4	45908637
2004	16798086	929526	67745870	7693850.5	47956133
2005	18929360	1214929	72769483	8281710.9	50538508
2006	20900340	1529241	85403841	9527281.9	52469541
2007	23618474	1592920	105039371	11093825.5	54163484
2008	25175500	822000	100040000		
2009	23085071	960459	104730120		57856938
2010	26020563	1526798	112477739		60685964
2011	29488520	1630069	117478380		63660941
2012	30304930	1540835	121513620		64877969
2013	31058432	1956203	123476881		65223979
2014	31212128	1667373	123288984		65466270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杂志历年全球 500 强公司统计整理。

全球公司超越原有国家地理界限，在全球吸纳资源、整合资源。原有各国的管理体制以及国际规则，难以适应全球公司这种基于全球市场的经营模式。20 多年来，全球公司的全球经营模式冲击着原有的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和国际规则，促使这些体制和规则不断改进。全球公司事实上推进了全球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进步。

二、全球公司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影响

30 多年来，特别是最近 20 年，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它们给中国经济各个层面，包括宏观、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经济各个层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一）全球公司在中国的积极作用

调查研究表明，全球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中有三方面的积极作用。

1. 发动机——全球公司与中国经济发展

跨国/全球公司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上。3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20多年，中国引进了大量外资。按照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把外资企业视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是外资企业的主体或主导力量。因此，在研究全球公司的作用时，我们把外资企业的数据作为参照。

2006年中国加入WTO第一个五年时，中国入世承诺到位，外资经济得到大发展。当时，在华外资企业达到32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3%。外资企业吸纳就业人员2800万。2007年，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6351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63%；外资企业工业产值125037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1%；中国涉外税收总额9973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2002年—2010年，外商在华投资达到6835亿美元，占改革开放33年吸收外资总量65%，2010年当年吸收外资1057亿美元。以跨国/全球公司为主要代表的外资企业，当年创造的工业产值、税收、进出口额分别达到全国的28%、22%、55%左右，直接吸纳就业约4500万人。通过引进跨国/全球公司的投资，中国引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跨国/全球公司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

2. 催化剂——全球公司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

评价跨国/全球公司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不应仅仅停留在宏观统计数据上。30多年来，中国处在从传统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开放引资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利用外资主要目标是引进经济增长要素，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即发挥跨国/全球公司的经济发动机作用。中国引资不仅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前者的作用很容易被人们认识和理解，后者的作用却容易被人们忽视。

第一，全球公司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后，中国企业看到的首先是技术产品的差距。通过引进新产品、新装备和新技术，中国企业进行了一场技术革命。在引进技术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企业，例如联想、四通、TCL、海尔、长虹等公司。它们进入家用电器或者IT等当时新兴的产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跨国公司在企业责任理念方面的提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企业。从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与企业互动，在企业中积极推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现在，不仅一大批国有企业，而

且一大批民营企业都已经把社会和环境责任作为自己经营的原则。

第二，全球公司促进中国现代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全球产业兴起和发展时，中国扩大开放并且加入 WTO。跨国公司全面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产业发展轨迹，把中国产业发展纳入全球产业发展之中。我们曾经对包装、物流、家用电器、食品、饮料、通讯、IT、保险等行业的情况进行了解。这些行业普遍反映，通过吸收外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各个经济产业/行业的发展。有的行业，例如家用电器、包装、物流等，完全是改革开放后外资进入中国而带动发展起来的，没有外资进入，就没有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公司在建立全球产业链时，一般会把投资所在国的资源纳入其全球网络。一批全球公司在一个国家的共同投资，会在投资所在国延伸出一系列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从根本上提升投资所在国的产业竞争力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回顾跨国/全球公司在华 35 年的发展，它们通过最初转让技术，催生了中国一批现代产业；通过在华直接投资，与国企和民企相互促进，做大了中国现代产业；通过并购，将推动中国产业重组和转型，从而做强产业。

第三，全球公司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充分且公平的市场竞争，对企业微观主体既有激励作用又有约束作用。过去，我们习惯于用政策手段引导企业的投资经营行为，效果欠佳。现实中，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比行政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更有效。全球公司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全方位的竞争压力，如在价格、质量、技术以及服务等方面的竞争，从而促进中国企业不断提高竞争意识。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部经营活动都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其经营活动必然对国内各种市场的发育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全球公司都在进一步强化合规经营，遏制商业贿赂。目前，全球公司不仅建立了全面的合规管理程序，而且不断加强培训、制定规则，预防和监督公司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规现象，积极处理违规事件。通过借鉴全球公司合规经营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遏制商业贿赂，净化商业环境，同时促进中国企业进行合规经营。

3. 同盟军——全球公司与和平发展新道路

历史上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本国资源都不足以支撑其发展，无一例外都需要吸纳国际资源。19 世纪英国、德国的崛起，20 世纪美国、日本的崛起都是如此。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崛起，除了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潮流之势，往往还都要借助暴力或者不公平贸易掠夺别国资源。现在，市场竞争规则已经改变，战争与暴力的掠夺以及不公平交易的攫取已经成为历史。中国的崛起需要从全球获取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也需要获取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还需要得到广大的全球市场。然而，与历史上崛起的西方大国不同，中国既不能通过战争等暴力手段，也不能通过不公平交易等经济手段获取这些资源。中

国只能通过和平的道路与公平的交易吸纳、整合国际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公司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同盟军。

第一，全球公司有助于中国营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随着全球化潮流发展，全球公司在海外资产、营业收入和雇员的比例不断提高，海外经营和海外利益成为全球公司的重点。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全球公司在母国以外市场的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占总资产和总收入比例越来越大，海外经营成为公司经营的重心。这一趋势导致全球公司更加关注在全球配置资源。因此，它们比一般公司更加关注全球的和平环境，更加注重在投资所在国从事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为了公司长期发展的需要，它们积极推进各国之间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各国和平相处，推动中国与各国经济互利合作，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应当看到，全球公司全球经营、全球战略有助于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司是中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积极因素。

第二，全球公司有助于中国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全球资源。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渠道主要有三种，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包括对外投资在内的对外经济合作，即俗称“三外”的外贸、外资和外经。跨国/全球公司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渠道。跨国/全球公司不仅通过全球贸易网络推进中国全球贸易的发展，而且通过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数量、提高外贸质量；跨国/全球公司是投资中国的主体，是中国吸纳高质量外资的主要来源；源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则是“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在海外直接获取资源的主体。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借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中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吸纳和整合了大量的全球资源，建立了融入全球的新经济体制。与历史上大国崛起相比，13 亿人口的中国成功地开辟以市场竞争获取资源的和平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 35 年来，特别是全球市场出现的 20 年来，跨国/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发挥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作用，发挥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转换以及现代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催化剂作用，还发挥了助推中国和平崛起的同盟军的作用。显然，全球公司与历史上的跨国公司不同，它们不再是历史上依赖武力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正如 IBM 原总裁帕米萨诺所说：“跨国公司通常被认为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首要动力，但如今它正悄然地呈现新的形式。不管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新形式无疑都会带来新的希望之光。”

（二）全球公司带来的挑战

充分肯定全球公司在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们给中国经

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管理者缺乏市场经济管理经验，本土企业也缺乏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经验。全球公司强势进入中国，以其强大的全球竞争力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给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者也带来巨大的压力。

1. 全球公司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偏离

全球公司之所以在中国发挥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制度转型的催化剂及和平崛起的同盟军作用，主要是因为其在华经营战略与中国发展战略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相联系，两者间有利益交汇点，甚至有很大的利益交汇区。与此同时，全球公司的战略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中国企业发展战略也必然会有利益偏离点和冲突点。

不少全球公司重视中国市场，并且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协调其在华投资的目标。然而，全球公司毕竟是一个企业，在华投资的目标要服从其全球战略的目标，而且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其在华投资的动力。出于这个考虑，当然要找投资条件好、投资效益高的地区和项目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公司必然与中国引进外资的产业导向和地区导向发生某种偏离。一些跨国/全球公司项目主要是组装和加工厂，往往缺乏技术开发能力。如果不加以改进，中国与跨国/全球公司合资的项目，有可能成为它们的全球经营网络中一个简单的加工厂。跨国/全球公司通过合资，增强了中方合作者的实力及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也压抑了同行业一批中国企业的发展。这批中国企业受到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面临萎缩甚至关停并转的前景。

2. 全球公司的违规行为带来负面影响

如同在全球范围内因商业腐败对全球商业环境带来破坏性影响一样，近年来，全球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腐败对中国市场环境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根据美国证交会网站资料，2005 年以来，已经有 25 家跨国公司因在华涉案商业腐败而被美国司法部门依据反海外腐败法加以处罚。美国司法当局处罚的 25 个案例中包括众多知名全球公司，如西门子、戴姆勒克莱斯勒、IBM、辉瑞和朗讯等等。被处罚款额多则十几亿美元，少则上百万美元。这些企业为在华扩大经营，以“入乡随俗”为借口，适应中国的潜规则行贿。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健全，各种形式的商业腐败对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全球公司的商业腐败在中国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3. 全球公司对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不少人关注全球公司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全球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掌握大量企业乃至国家的信息数据将影响国家安全。这样的担心确实值得关注。当企业在海外上市时，往往由一些全球金融或财务公司充当中介，它们直接掌握了这些企

业大量经营数据。这些信息和数据使用不当很可能造成客户企业甚至客户国家机构信息泄露，形成巨大的安全隐患。2000年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它们的大量信息和数据为全球投资咨询类企业或金融企业掌握。其中，有一些中国国有银行的数据也为这些全球公司掌握。如果对这些国际企业或全球公司没有规范的约束，中国企业甚至政府将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何在与全球公司合作中既获取利益又防控信息安全风险，是一个新课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加强安全风险的防控，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积极合作与谨慎防范

全球公司形成并全面进入中国，对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和产业发展的中观经济层面以及企业发展的微观经济层面，都带来深远影响。它们为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既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成功的经验：开放合作，和平崛起

闭关锁国使中国错过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则使中国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潮流带来的机遇。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美元贬值开始全球自由兑换，标志着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兴起。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从十年文化革命的动乱中走出来。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和刚刚兴起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领导人果断地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带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使中国得以吸纳和利用了第三次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资源。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全球市场开始出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潮流迅速扩展，过去的跨国经营企业开始了全球化经营。当全球公司把国际市场扩展到全球市场时，改革开放的中国成为它们全球网络中重要的节点。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1992年初，邓小平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①邓小平在强调抓住新机遇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扩大吸收外资规模。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得到更加迅速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又一次抓住机会，于2001年不失时机地加入WTO，开始了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司进入中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经营网络。全球公司进入中国的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

^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开始建立自己的全球经营网络。

36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完全吻合。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之时，中国于 1979 年开始改革开放；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球市场出现和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之时，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之时，中国入世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转折点，中国都处在世界的前沿。

回顾历史，200 多年来，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前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都没有像这次这样顺应潮流、融入潮流，还走在时代的前列。放眼全球，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如同中国这样把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结合得如此紧密、如此合拍。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紧密结合、同步发展，我们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会。中国成为吸纳全球资源最多、最及时的发展中大国，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实现了以和平、公平的市场交换方式获取全球资源，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增添了崭新一章。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人缺乏历史思维，对于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与投资东道国相互关系发生如此深刻的历史变化知之甚少。在他们看来，全球公司依然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它们的到来必然挤垮“民族工业”，导致当地经济主权丧失。应当说，这些看法在过去是正确的。但是，世界已经从战争与革命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新时代，我们的认识也应当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应当“眼睛向前”，看到历史发展趋势，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与时俱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综上所述，面对跨国/全球公司在华投资引发的种种不同意见，我们应当转换思路，“眼睛向外”，以全球视野看世界，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从而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我们也应当“眼睛向前”，以历史眼光总结和回顾国内外的历史，看到中国错过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教训和抓住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潮流的经验，从而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会；我们也应当“眼睛向内”，寻找内因，从自己身上看与跨国/全球公司合作中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我们还应该“遵循规律”，对市场经济规律抱有敬畏之心，从而去经济的意识形态化，按照企业和产业规律发展企业和振兴产业。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跨国/全球公司纷纷进入中国之时，变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为主动学习、积极合作、勇于竞争，才能够迅速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战略积极：与全球公司合作新阶段

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全球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中国和平崛起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仍然是跨国公司投资的一个热点。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需要吸纳整合全球最优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中国拥有庞大而迅速成长的市场容量、庞大而性价比提高的劳动力以及不断健全的全球产业配套能力，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吸纳整合的重要资源。因此，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仍然具有吸纳全球公司投资的巨大潜力。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之时，应当积极引导，变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为主动学习、积极合作、勇于竞争。因此，今后在对外开放的战略上应进一步积极与全球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合作，发挥它们在中国经济新发展时期的重要作用，应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时期的需要调整对全球公司投资的要求。若引导得好，全球公司在未来的中国可以发挥如下积极作用。

一是发动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发动机。不少全球公司已经积累了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应当像当年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引进技术和管理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那样，通过与全球公司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催化剂：促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中国产业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促进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转型升级，促进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市场。一些全球公司已经开始在中国市场展开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可以在中国和全球市场学习它们的经验，通过并购成长，通过并购在产业做大基础上做强。一些全球公司已经与中国企业合作走向第三国市场，通过与全球公司合作促进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发展。三是同盟军：协助中国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通过市场交换这一和平路径协助中国获取所需要的全球资源。通过与全球公司合作，寻找和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显然，在 30 多年改革开放基础上，应更加积极地与全球公司合作与竞争，更加充分地发挥它们在中国经济发展新时期的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战略。如何积极引进全球公司投资，发挥它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企业成长的正面影响，如何趋利避害，尽可能减少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负面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积极引导的前提是“积极引进”，还要大量地吸引全球公司来华投资；其方法是“因势利导”，而不是违背经济规律对全球公司进行“管制”；其目标是“双赢”，中国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全球公司也有利可图。在积极引导涉及的前提、方法和目标三个方面中，应特别注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以及全球公司全球战略发展规律来设计相关政策，才能有效地引导。

实际上，公平、充分的市场竞争，对于约束全球公司在华不良行为和鼓励全球公司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相协调是最有效的因素。面对众多世界著名全球公司的竞争，面对中国当地企业的竞争，任何一家全球公司为了在中国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认真地投入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人才。竞争将促使全球公司在中国投资制造业项目以后，进一步投资研究开发项目；竞争将促使全球公司在中国竞争第一线建立管理营运中心。从这个意义讲，引导和规范全球公司行为的最好办法是建立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其对全球公司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远远超过一般的政策作用。

因此，我们应当“知己知彼”，了解全球公司，研究它们在全球和中国的发展规律，根据它们的行为规律因势利导。全球公司在华销售、生产、研究开发和营运管理等各项业务发展以及相应机构的建立，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应当研究全球公司在华发展的规律，根据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设计不同的政策组合，对其在华经营活动加以引导。惟如此，才能有效地把全球公司的企业战略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起来。不了解全球公司在华业务发展规律，难以制定正确的政策。

（三）战术谨慎：防范全球公司的负面影响

在充分发挥全球公司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其在中国投资经营有可能带来的消极和负面作用。全球公司的全球战略与中国经济宏观发展战略并不完全吻合，有的情况下会偏离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一些全球公司在中国的某些违规行为影响了中国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甚至加剧了商业腐败；特别是一些金融和信息服务业企业掌握了中国企业和政府的大量信息数据，有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以及企业安全形成隐患。因此，在与全球公司开展的具体合作项目上，或者说在战术上，要谨慎防范全球公司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要有防范意识。过去，一些本土企业与全球公司合作时缺乏防范意识，或者导致信息安全事故，或者导致商业腐败和环境事故。在新一轮与全球公司合作中，一定要汲取这些教训。二要根据具体项目特点制定防范措施。在与全球公司合作时，特别要加大合规条款的制定，要求全球公司和外资企业严格遵守中国有关环境、社会、商业腐败等各项法规。涉及信息等安全问题应该与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制定防范措施。三要监督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与全球公司和外资合作的全过程都应该对相关措施加以检查落实。过去一些企业在与外资合作时，并非没有防范措施，但是缺乏落实，一些政府环保、社保和安全部门也缺乏认真执法。导致一些合同规定和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全球公司违规行为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对本土企业甚至国家带来了实质性伤害。在具体合作项目上

谨慎防范全球公司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不会影响人们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价，反而有利于具体项目合作的成功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有利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

总之，对外开放战略高度要积极与全球公司合作，不应因与全球公司合作存在隐患和可能的负面影响而改变与全球公司积极合作的大战略。过去，一些人通过强调与全球公司合作中的具体问题而要求中央政府改变外资政策和对外开放，这种以战术层面的问题否定战略层面的方向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全球公司在华发展对中国经济利大于弊。如果把主要力量放在如何防范、限制全球公司方面，而不是用于如何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方面，不仅不能防范可能的消极影响，还会错失机遇，错失中国面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今后与全球公司合作中，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应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合作和竞争，积极吸纳整合全球公司带来的资源。当然，也不能因为战略上与全球公司积极合作而放弃具体项目上应有的谨慎与防范。

四、主动学习，积极合作，勇于竞争

面对大规模全方位进入中国的全球公司，中国政府部门应当积极合作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并且谨慎防范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那么，面对大规模全方位进入中国的全球公司，中国本土企业应当如何应对呢？

（一）从民族企业上升到全球公司

本土企业应主动向全球公司学习，积极与全球公司合作，勇于同全球公司竞争，在学习、合作和竞争中提升竞争力，最后成长为全球公司，引领各产业发展的全球潮流。

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第一部《公司法》于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20年过去了，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勇敢搏击，一大批现代企业在改革开放中迅速成长。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中国本土企业迅速成长壮大之时，20多年来，跨国公司进一步现代化，迅速地从传统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发展战略、管治结构和责任文化均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球公司拥有了传统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全球竞争力，打造全球价值链，从而改变了企业全球竞争的方式；强化企业合规文化，从而改变了企业全球竞争的规则。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之时，面对的是已经改变了的全球竞争新方式和全球竞争新规则，竞争对手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国际竞争，积累了数十年全球经营的经验。而中国企业刚刚走向全球市场，没有经验的积累，也缺乏全球经营中战略、结构和文化的提升，显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然而，如果能够借鉴全球公司的成功经验，中国企业则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成长为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涤荡全世界，全球公司向全球市场全面进军的时代，纯粹的“民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吸纳整合了全球资源的全球公司竞争。面对全球公司的竞争，中国企业必须像全球公司那样，学会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来参与全球竞争。如果能够理解和把握全球竞争的新方式以及新规则，中国企业则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发展中国家企业成长的新经验。阻碍中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己的管理体制、狭隘观念。中国企业应当从民族国家视野扩大到全球视野、从民族工业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思维，在全球范围吸纳整合资源。

（二）与全球公司对标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全球公司先后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全球战略调整、管治结构重组和全球责任强化，它们打造了全球价值链，拉开了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差距。首先，我们需要与全球公司对标。

第一，中国企业全球化程度偏低。与全球公司相比，源于中国的跨国企业全球化程度还相当低。如表 5 所示，2012 年，全球最大 100 家跨国/全球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已经达到 67%，而中国 1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仅有 13% 左右。中国最大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不仅低于全球最大跨国公司，而且也低于全球发展中国家最大 100 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跨国指数低意味着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能力不强，它们还主要利用中国自己的资源，主要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主要从中国本土消费者获取利益。这种经营模式显然不及全球公司的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当然，现阶段中国企业跨国指数不高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本土市场极其庞大，而且还在不断扩容。本土企业经营主要在本土市场，其跨国程度还不高。但是，随着企业竞争力提升，不能局限在本土市场，应像全球公司那样在全球市场吸纳整合资源、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

表 5 2012 年中国最大 100 家跨国公司跨国指数与全球比较

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	跨国指数 (%)
世界最大 100 家跨国/全球公司	67.1
发展中国家最大 100 家跨国公司	50.9
进入发展中国家 100 大跨国公司的 9 家中国企业	24.7
中国最大 100 家跨国公司	12.93

资料来源：全球最大跨国公司和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数据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世界投资报告》整理，中国最大 100 家跨国公司的数据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统计整理。

第二，中国企业还缺乏全球责任的理念和文化。全球责任理念或文化缺乏，是中国

本土企业与全球公司对标的另一个主要差距。2000年《全球契约》提出以来，全球公司越来越强调承担全球责任，包括社会和环境责任，也包括合规反腐责任。2006年以来，环境与社会责任的重视已经引起中国本土企业的重视，不少中国企业都发布了社会责任或环境责任报告，而且在落实这些责任时也做得越来越好。但是，全球公司特别关注的合规反腐责任，还没有引起中国本土企业足够的重视。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很多企业在海外承担包括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全面责任，并且依法合规经营。但是，也有一些企业缺乏责任意识，在投资和经营所在国没有承担必要的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还有一些企业为了获取订单而行贿。根据世界银行规定，违规经营的企业将进入黑名单，数年内不得从事与世界银行有资金合作的工程项目。2010年，其他国际银行与世界银行联网，例如亚行、非行等，对进入黑名单企业的处罚扩大到所有国际银行。到2013年夏天，进入世界银行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经增加到12家，分别被处罚2~8年不得从事世界银行贷款的工程项目。从2014年以来，又有十余家企业被世界银行列入黑名单。

总之，与全球公司相比，中国本土企业在全局战略和全球责任两个方面的差距比较突出。缺乏全球战略，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难以参与全球竞争；缺乏全球责任，企业的全球战略则难以在全球成功实施。中国本土企业成长为全球公司必须迈过这两个门槛。

（三）整合全球资源参与全球竞争

面对全球公司的竞争，不能以一个国家内的企业或一个民族的企业与全球企业竞争。中国企业应当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从全国性企业发展到国际性企业，从国际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领先的排头兵企业应进一步从跨国公司提升到全球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硬件提升和制度完善，中国企业竞争力大大提高。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更高水平上，与全球公司合作竞争是我们面临的挑战。通过多种方式和多种途径，包括合资合作、承接制造与服务外包、建立战略联盟以及海外并购等等，中国企业完全可以与全球公司建立关联从而进入全球公司产业链或者产业系统。随着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中国企业与全球公司关联的水平也将不断提升。

制定和实施全球化战略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适应全球化。这个阶段，也是被动全球化阶段。中国企业的正确战略是变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为通过“引进来”学习、合作和竞争。接受全球公司的加工订单、技术标准、技术转让、直接投资或并购，在与全球公司合作中学习、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全球公司的全球网络，从而增强实力，从当地企业成长为全国性企业，与全球公司在国内市场竞争。第二阶段：推进全球化。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阶段，主动全球化初级阶段。在第一阶段成长壮大的基

基础上，中国企业应当不失时机“走出去”，利用全球市场、资金、人才，直接主动参与全球竞争。中国企业向国际市场出口商品，海外销售公司向比较落后国家转让技术，在拥有比较优势地区直接投资，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和资源开发基地，也可以通过全球公司普遍使用的并购方式加快成长。第三阶段：实现全球化。这是主动全球化的高级阶段。在“走出去”的基础上，建立全球经营网络，包括营销、制造、融资、研究开发和管理营运等各个子系统。至此，中国企业也就成为了全球型企业（全球公司）。

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处在不同阶段。其中一批企业通过“引进来”，实现了全球化经营第一阶段的目标，成为全国性企业或国际性企业。它们面临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经营战略转变，面临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的观念转变。大量案例表明，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借鉴外国的全球公司经验，勇敢地“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同全球公司竞争。只有在全球竞争中才能形成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

（四）强化全面和全球的责任

与传统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更强调合规经营，更强调承担全球责任。否则即使有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市场能力，全球公司也不可能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不可能在短短的 20 年间占领全球市场并且创造了如此之多的财富。如果不能强化合规经营，不能承担全面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那么中国企业将难以在全球市场发展，更难以与全球公司竞争。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中国企业处在第一次提升阶段。当时，中国许多企业从国外大量引进技术，包括产品、成套设备和生产线。这一阶段主要是硬件引进阶段，一大批企业通过引进硬件而发展起来。例如，海尔通过引进冰箱生产线而起步，联想通过引进国外电脑而发展。90 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中国企业处在第二次提升阶段，这是企业制度创新、提升阶段。在此之前，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但不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民营企业多数还是个体户或者集体企业。1992 年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公司法》，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此同时，大批跨国/全球公司进入中国建立外资企业，为中国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示范。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中国企业发展进入第三次提升阶段，即企业理念文化提升阶段。许多公司在探讨今后发展的突破口。其实，阻碍中国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外部而在自身、在公司的理念文化，即确立先进的企业责任文化或合规文化。第三次提升就是要提升企业以责任为核心的责任文化或合规文化，做合规的负责任企业。只有经过第三次提升，提升了企业软竞争力，中国企业才可能做大、做强、做久。

从过去忽视公司社会责任到强化公司责任，从单纯强调公司股东责任到全面强化公司责任，从强调环境社会责任到全面合规经营，对于许多企业来说这是一个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文化的创新，是一个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折。面对重大转折，企业当然会面临困难。尽管如此，还是应当把学习全球公司强化公司责任与合规作为一个坚定的目标，创造条件加快中国企业转型的过程，加快中国企业提升软竞争力的步伐。总之，要下硬功夫提升中国企业的软竞争力。

（五）勇于同全球公司竞争

通过与跨国/全球公司对标寻找差距，通过学习与合作，中国本土企业在全全球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系统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在与全球公司的合作竞争中，逐步获得发展的主动权以及主导权。唯有如此，中国本土企业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一个地区型企业发展到全国型企业，从一个国际型企业发展到全球型企业，即全球公司。

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在全全球化过程中迅速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本土企业，包括吉利、联想和华为等著名企业，已经或正在成长为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大批源于中国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公司。面对全球公司的挑战，应当谨慎防范它们带来的可能负面影响，但是更应抓住它们带来的机遇，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面对全球公司的挑战，中国企业应当开阔视野，在学习、合作、竞争中成长为跨国公司，进而壮大为全球公司。只有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应有贡献。

责任编辑：李蕊

对“十三五”时期 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高凌云

摘要：“十三五”时期，在全球经济平缓增长的趋势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上的部分环节将出现大幅重叠，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国际产业结构将呈现以“软化”“先进化”和“绿色化”为方向的大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将大幅提升，贸易保护主义也将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中国仍会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影响国家；但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将步履维艰。

关键词：国际分工贸易 投资新规则 全球治理体系

作者简介：高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化驱动力在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成为推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革的最主要力量，全球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正在密集重构，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步伐缓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想要获得与自己经济实力相称的地位需要长期争取和努力。客观理性地评价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并对“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形势进行科学预判，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新一轮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一、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

“十三五”时期，尽管全球经济增长中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整体而言，仍将呈现出一个较为平稳且缓慢的发展期。

首先，美国复苏进程加快。得益于油价下跌、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等，美国经济正在经历温和复苏，劳动力市场、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稳步改善，通胀温和、财政政策宽松以及房地产市场趋好在内的经济刺激条件继续存在，美元走强显示美国经济仍有韧劲。未来五年，这一趋势可能得到延续。如果国际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市场，很有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的贬值趋势、打破2008年以来美元汇率的盘整局面，使美元汇率持续上行。但是，除人口老龄化外，因创新不足和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影响，美国潜在经济增速并非十分乐观，美元走强对美国本土出口的冲击将继续存在。

其次，欧元区将保持低速增长。尽管遭受了债务危机的打击，欧元区仍然是一个发达的国家集团。近期欧元区经济已明显出现好转迹象，通货膨胀趋于缓和，失业率逐渐降低，相关经济景气指数连续上升。但是，欧元区在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上更偏重公平而非效率，倾向于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容易带来僵化的弊病。因此，即便是债务危机告一段落，当前困境暂时缓解，欧元区也很难实现较为快速的增长。

再次，日本经济前景仍不乐观。在“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日本经济复苏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效果，特别是在提振股市、激发出口导向型大型企业活力、增加经济效益、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有较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存在实际收入下降、日元贬值、外需疲软以及提高消费税率等诸多短期风险，消费、出口和投资三驾马车很难持续改善，加之人口少子老龄化趋势还在加速、社保资金缺口增大、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提高、创新能力下降等诸多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其长期前景不容乐观。

最后，新兴经济体增速总体趋缓。在过去较长时间内，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有力地带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但是未来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各新兴经济体国家均将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战：外部需求萎缩或变化，内部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积聚等。整体而言，增长仍是新兴经济体的主流。

二、国际分工的趋势

以全球价值链（GVC）为代表的国际分工，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主要特

征，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将进一步改变国际产业格局和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模式。

全球价值链在倡导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获得了全面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是其获得巨大收益的重要途径。目前，发达国家掌控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位置，所得到的贸易和投资收益最大。例如，在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中，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就掌控着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而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就成为加工工厂，仅赚取微薄的利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不同的角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产的上游高技术零部件就越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生产下游劳动力密集型零部件并完成组装任务。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而这完全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贸易和投资战略。如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参与度，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沿着如下路径寻求不同阶段的发展：一是从事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活动：发展中国家依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跨国公司建立非股权关系，从事加工贸易生产，其出口中内涵着不断增加的中间品和服务。通过这种非股权生产模式下的贸易与投资活动，扩大参与全球化的广度边际。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求升级：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高增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扩大参与全球化的深度边际。三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勇于竞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高增加值环节利用国内生产能力取得竞争，并通过跨国并购使国内生产企业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四是转变全球价值链模式：发展中国家根据其出口构成提升加工贸易中的进口构成，其进口构成与自身生产能力可以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五是实现全球价值链跨越发展：一些国家出口竞争力依托国内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而得到提升，FDI 在贸易一体化和国内生产能力建设方面起着催化剂作用^①。

因此，上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结构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判断，“十三五”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上的部分环节将出现重叠，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首先，新兴经济体增速仍将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这将导致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走出去”，对海外公司实施跨国投资战略，体现在价值链上就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整体由下游向中上游攀升。其次，由于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等不同，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分工可能出现一些调整，部分新兴经济体将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再次，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可能使某些制造业回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①UNCTAD Report,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 February, 2013.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不断高企的状况，提出了“振兴制造业”的“再工业化”目标，如果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继续快速上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可能出现回流现象。

三、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十三五”时期也将是国际产业结构大的调整期。这一调整，首先体现在“软化”趋势。所谓产业结构“软化”，是由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以物质生产为关联的硬件产业结构向以技术、知识生产为关联的软件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产业结构的“软化”不仅是指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所谓“经济服务化”的趋势，也是指整个产业结构的演进更加依赖于信息、服务、新技术和知识等“软要素”。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不断上升，从而形成产业结构高度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新趋势。二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广泛应用，为传统产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同时，信息技术加快了各类技术相互融合和渗透的步伐，提高了工业产品信息化、生产工具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成为新时期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三是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其次，也体现在“先进化”趋势。这里的“先进化”，是指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和现代管理手段，科技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形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推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近年来，主要工业国纷纷制定各种发展计划，促进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变。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发展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新潮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优化了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为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结构系统优化，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再次，还体现在“绿色化”的产业转型趋势。碳排放所引发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已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全球化的“低碳革命”将逐渐深化。从经济角度看，“绿色化”要求合理地利用资源和能源，降低生产成本，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目标的同时，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维护。因此，绿化美化、重视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绿色产业，构建低碳、绿色、生态的现代产业体系，必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潮流。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缘或经济发展水平临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谋求共同利益,在平等互利以及彼此自愿地约束各自部分经济主权、甚至相互对等地分享或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条件下,通过建立共同协调机构,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制定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消除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步实现区域内共同的协调发展和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贸易发展、实现产业互补和共同经济繁荣的过程。“十三五”时期,将会出现更多的、具有更多新特征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安排。

(一) 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我们判断,“十三五”时期,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仍将持续快速增长。首先,以国际贸易组织(WTO)为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随着WTO成员的不断增多,发展中国家队伍的不断壮大,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即便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较多矛盾和分歧,协调和达成共识的难度极大,导致“多哈回合”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屡次陷入困境,无果而终。很多国家和地区逐渐对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丧失信心,把注意力转向建立区域性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其次,FTA自身的优越性和灵活性被越来越多地认可和接受。FTA参与成员少,谈判更加灵活和自愿,比较容易达成共识。FTA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象,按照不同的时间表自由签订协定,贸易利益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另外,FTA协议超越了以往只降低关税、降低数量限制的范围,向服务业、投资等领域拓展,可为缔约方创造更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再次,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有的国家虽然自身并不愿意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但它们会感受到游离于区域贸易集团之外的巨大压力。因此,它们必须考虑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从而产生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二) 经济一体化将呈现更多的新特征

目前,全球及各主要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合作模式、组织架构、地域重心以及运作领域等方面,均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并且从区域贸易规则开始,伴随着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货物、投资、服务贸易规则融合后逐渐向多边经贸规则扩展,必然会出现诸多制度层面的新特征和创新。

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模式打破了传统理论限制,组织成员在地域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同质性减弱,异质性或混合型趋势愈益明显,南北型合作成为发展的新

主流。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邻和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等，是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基本条件，即同质的国家之间易于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展经济协调合作，如东扩前的欧盟与美加自由贸易区。但是，在生产分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发展，导致近些年区域贸易协定（RTA）的发展基本上改变了这一趋势，越来越多的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起来。这表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色彩越来越淡化了。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格局日益复杂，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多层次性，成员交叉重叠，呈网络化、跨洲性的发展趋势。过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带有明显的联合一致、共同对外的特征，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对抗甚于协调。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之间在地理上基本是连成一片或邻近的，形成贸易集团的主要动力之一是为了对付其他更强大的贸易团体或集团，保证多边谈判以及进入出口市场的讨价还价能力。但近年来，这种封闭式的一体化发展道路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昭示着各国追求的并非一时一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要条件和时机成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一体化是必然选择。

第三，亚太地区是当前及下一轮区域一体化的重点。自2009年底以来，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一是美国的高调介入和推动使得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成为当今亚太区域合作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TPP或将成为亚太地区新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从而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立，加速实现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提出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目标。二是2012年11月20日，东盟十国与六个自由贸易区伙伴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式启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旨在整合和优化东盟与中、日、韩等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建成一个高质量的自贸区。这不仅对进一步密切东盟和其他六国经济关系和提升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巩固和发展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话语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注入了强劲动力。三是经过历时十年的艰苦努力，东亚自贸区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一方面可以扩大区域内市场，推动三国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对促进东北亚一体化进程乃至亚太及全球经济贸易格局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涉及的领域日趋广泛，内涵和外延不断加深，而且标准也越来越高，这将成为重塑国际经济合作基本规则的关键。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使国家间的联系程度更加紧密，利益纠葛在一起。生产的一体化要求各国市场规则的一致性，以

及各国间标准的相融性。这需要更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来处理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促使国际贸易规则从边界规则向边界内规则扩展，这些边界内规则涉及一国的国内政策，如国有企业行为、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等。全球价值链所带来的挑战还包括：全球贸易更多地由 FDI 所趋动，贸易和投资规则有整合的必要性。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关联度加强，运输服务、商业流动、信息服务等新领域涌现，需要新的贸易规则来协调这与商品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生产分割所引起的中间产品在多国间的流动，使原产地规则的确定需要更细化。

传统的 RTA 内容涵盖的范围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核心，主要通过取消或削减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后来扩展至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然而，新一代 RTA 除在规则上与 WTO 保持一致外，涉及的内容日益广泛，内涵和外延不断加深。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贸易投资便利化、贸易投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环境保护标准、劳工标准、原产地规则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此外，有的协定还包括经济技术合作以及海关合作的内容，有的已经超越了 WTO 的要求，即所谓的“超 WTO 协定”，或者说要求成员在某方面做出比 WTO 更多的承诺。新一代 RTA 这种“超 WTO 协定”在遵循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协定伙伴国家之间提供更加自由的经贸空间，从而实现了互惠互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除了在合作协定中谋求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之外，试图利用经济一体化内部合作规则制定影响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动机明显增强。如 TPP 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体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主导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发达国家在应对新经济形势挑战中，力求通过携手合作主导贸易与投资规则谈判，重塑全球贸易新规则，掌握全球贸易“话语权”，以维持其在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全球治理中主导权的战略意图。

五、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

经济危机通常是贸易保护滋生的温床。全球仍然没有完全走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因此，“十三五”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仍将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在关注贸易保护在手段、方式和内容上可能出现变化的同时，可以肯定中国仍将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

(一) 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

首先，需要警惕贸易保护中政府援助措施的运用。为尽快摆脱危机，加快国内经济复苏步伐，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包括政府采购和政府救助措施。这些

经济政策将重点从限制进口转移到扩大出口上，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扶持，增加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自2008年11月至今，政府援助措施和政府采购已经占全部贸易保护措施中的26%，成为最重要的保护手段之一。以往贸易保护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目前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1/5。因此，在新一轮贸易保护抬头的过程中，各国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代替了以往的贸易限制措施，成为当前贸易保护的新手段。

其次，需要警惕贸易保护转向新兴产业和稀缺资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被视为带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重要引擎，因此各主要经济体都将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企图依靠资金和技术优势控制新兴产业关键领域，占领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由于稀缺资源被广泛运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发达国家格外注重控制这一战略性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技术水平较低而大量地出口资源型产品。长期粗放式经营和大量出口导致许多丰裕型资源变得极为紧缺，有些甚至需要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求。于是各国政府通过出口限制等贸易保护手段来保护本国资源，稀缺资源领域的贸易摩擦逐渐加剧。

再次，需要警惕“全球治理”成为贸易措施的新“保护伞”。随着人们生活理念的变化，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越来越集中于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粮食和食品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也是涉及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全球新的治理机制建设过程中的重大议题。因此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常常以全球治理为借口，行“贸易保护”之实。如一些发达国家凭借环保技术优势，以节能减排为口号，提出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概念，随后，碳关税、碳标签、碳认证等“三碳”问题便随之应运而生，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崇。

（二）中国仍将是贸易保护的主要目标

《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7月至2013年5月中国受到的歧视性贸易措施共877项，占到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总数的41%。其中，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限制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成为对中国贸易限制的主要手段，占中国被实施措施总数的比例超过20%；对中国贸易保护的对象已从具有出口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扩展，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风电塔、钢铁、化工等产业。2011年11月，美国正式对进口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发起“双反”调查，开启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首例“双反”调查。紧接着又对原产于中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和应用级风电塔发起“双反”调查。2012年法国成立11个委员会对国内的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等一些核心产业进行监督，

以在“必要”时干预国外企业的并购。同年，欧盟又开始对中国光伏电池展开“双反”调查，并欲征收惩罚性关税。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华贸易保护措施的隐蔽性在提升。国外往往通过国家安全、拒绝并购、投资审查等各种名目行贸易保护之实。如美国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阻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其国内进行收购、设备供应等计划。其目的就是打压外国企业保护美国企业，实行贸易保护。除此之外，中兴、华为这些企业在印度、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遇到同样挑战。如印度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国内运营商从华为、中兴手中购买电信设备，直至华为等企业接受其苛刻的条件后才允许重新进入印度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对外投资遇到的阻力和干扰越来越多。中国对技术的引进，特别是高技术引进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这些将直接影响中国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趋势

“十三五”时期，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深刻结构性变化，以及越来越频繁的要素流动，都呼唤新型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出现。

（一）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方向

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二战后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是一种以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为核心，通过经济、贸易、金融协定等国际条约体系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经济治理模式，包括治理平台和机构两部分，其中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包括八国集团、20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APEC等；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则有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近些年，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虽然迈出了崭新步伐，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主导权过于集中等。

“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将体现四个方面的要求。首先，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切实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顺应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议程设置、议事决策等各方面应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平衡反映各方意见和关切，使最终结果符合各方利益，实现共赢。其次，考虑到代表性和决策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实现代表性、决策效率和实施效力的有机统一。再次，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同时包括目标共识的协商机制与约

束性规则的制定机制。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既要通过协商政策目标方向达成一些共识性、意愿性的东西，也要制定一些约束性的规则、量化的指标，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应考虑设定国际宏观经济框架内的“数量化规则”等。最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同时兼顾短期的经济危机应急机制和长效的经济治理机制。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G20 圣彼得堡峰会上指出的，“我们要放眼长远，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二）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将会逐步推进

国际金融、债务危机的爆发，揭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不足之处。但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再调整，以及大国之间、各集团之间博弈和较量等。具体而言包括：各国不论大小、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其利益均应受到尊重，但也应同时考虑和照顾他国利益，在此基础上，通过充分协商、妥协，达成实现各国共同利益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体系。每个成员根据自身能力、特点以及通行的国际法原则，允许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大小、方式和时限等方面存在差异，没有区别责任、片面强调共同责任将有违公平合理。同时，国际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承担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做出力所能及贡献的责任，没有共同责任，区别责任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为无本之木。所有这些，都将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将呈现渐次推进的特征。

七、结语

总结起来，“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基本上可以保持平缓增长的态势；同时在这一整体趋势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上的部分环节上将出现大幅重叠，从而加剧国际市场竞争；与之对应的国际产业结构，将呈现以“软化”、“先进化”和“绿色化”为方向的大调整；在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将大幅提升；另外，贸易保护主义也将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且中国仍会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影响国家；尽管这些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处于制度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仍将步履维艰。

而从国内来看，“十三五”时期，有三个方面的变动需要特别关注。首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着“三期叠加”带来的诸多挑战，GDP 年平均增速可能下降到 7% 左右。其次，与经济增速下滑相对应，中国对外贸易也将进入低速增长期。因为一方面世界经济尚处于深度调整期，国际市场总需求难以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持续高增长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到，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趋势在加强，经济贸易发展

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约束加强。再次，中国资本净输出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加强。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增速明显放缓，而我们对外投资依然有希望在未来十年出现 10% 以上的快速增长。

结合国内外的形势，我们建议，“十三五”时期应重点谋划好以下工作：第一，主动参与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制定，在亚太、北美、拉美、中东欧、欧亚经济联盟、非洲、阿拉伯国家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自贸区的全球布局进行有针对性地推进。第二，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加快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能源资源开发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第三，在积极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综合效益的同时，大力推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培育世界级跨国企业。第四，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建立安全、高效、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鄢一龙、杨竺松：《关于“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建议》，《经济研究参考》2013 年第 55 期。
2. 代谦、何祚宇：《国际分工的代价：垂直专业化的再分解与国际风险传导》，《经济研究》2015 年第 5 期。
3. 刘戒骄：《生产分割与制造业国际分工》，《中国工业经济》2011 年第 4 期。
4. 崔焕金、刘传庚：《全球价值链驱动型产业结构演进机理研究》，《经济学家》2012 年第 10 期。
5. 华晓红、周晋竹、宫毓雯：《全球价值链与东亚生产网络》，《国际贸易》2013 年第 7 期。
6. 周宇：《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世界经济研究》2011 年第 11 期。
7. 李向阳：《构建“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1 期。
8. 韩景华、任维：《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新趋势及应对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11 年第 2 期。
9. 张平、付敏杰：《全球再平衡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政策选择》，《现代经济探讨》2012 年第 1 期。
10. 张茉楠：《“一带一路”重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展研究》2015 年第 5 期。
11. 卢中原：《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分析》，《政策瞭望》2013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任朝旺

基于“一带一路”的金融创新 及发展建议

申景奇

摘要：“一带一路”作为一项浩大的战略工程，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运用目前传统金融模式推进项目，还存在较突出的问题。经过论证，本文提出基于“一带一路”的金融创新之 PPP 私募股权基金模式，该模式能更好地综合市场与计划的经济效率，兼顾发挥“一带一路”实践过程中政府指导作用、紧密更多民营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一带一路”专项资金的有效运作、民营资本的投资回报，形成政府、平台和民营“多赢”的合作局面；有利于在国内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多层次资金主体共同参与的前提下，解决项目资金的分步投入、分阶段管理、分层次回报、分主体量化等问题。最后，提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金融实践发展建议，包括合理安排“一带一路”项目节点、平衡项目区域协调发展及实现金融创新为先导等。

关键词：“一带一路” 私募股权基金 公私合营

作者简介：申景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市民建金融委员会委员、副教授。

“一带一路”^① 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另一端是极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在带动

^①最新的“一带一路”版图当中，首次加入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线——从南海到南太平洋的路线。“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发展的同时，还会辐射到非洲，“一带一路”已经从战略构想走向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从外向型走出去的商贸大国到经略周边、经略西部、经略海洋，对国土空间格局及市场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有助于促进均衡国土空间的形成；将促进内陆地区形成若干个大都市经济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同时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土空间格局；将进一步增强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形成“高效”的国土空间；将加快内陆沿边地区主要口岸和沿边城市的发展。^①“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推进各国政府、公众、企业等各方面的合作互动和共赢多赢，其机制创新点是多元的。从市场经济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视角来看，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工程承包企业应抓住机遇拓展海外市场。^②贸易先行有利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依靠劳动力规模扩张、劳动力地区结构改善，“丝绸之路经济带”可提高物流业发展水平，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驱动物流业发展。^③虽然利好颇多，但实践难题也有目共睹。“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改善当地较弱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战略起步阶段的重点工程。基础设施项目多具有资金投入量大、建设周期长、回收期长、回报率相对低等特点。^④再加之，“一带一路”涉及国内外多层面的资金主体不同资金、不同时间节点的参与及退出等问题，更加大了资金运作与管理的难度。

一、“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金融工程问题

金融工程涵盖了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解决金融问题的技术开发，包括金融产品设计、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战略实践对于金融产品设计、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同样提出许多全新挑战。

第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涉及不同主体、不同时间价值资金，单一金融产品不能解决不同主体资金安排，回收期长、收益不确定等问题加大了设计与定价难度。“一带一路”项目涉及国内外不同行业、产业、领域市场，需要多层面资金主体参与，而不同资金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参与、退出问题较为复杂。“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启动资金需要具有政策引导性质，成本低、适用时间长、规模较大，但后期退出难度较大。后期运营资金需要边使用、边投入，时间分割期和项目实施、现金流实现要相匹配，需要使

①刘慧等：《“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地理科学进展》2015 年第 5 期。

②郭怀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带动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布局海外市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 年第 2 期。

③陈恒等：《“一带一路”物流业发展驱动因素的动态轨迹演变——基于劳动力投入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④石志伟：《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政府融资模式风险分析》，《价值工程》2013 年第 1 期。

用复合资金，但资金成本相对较高、时间较短、规模较小，过程中对于现金流的要求相对较高。传统市场产品定价对于资金及运用的稳定性要求较严格，以上特殊性对于定价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另外，“一带一路”项目海外资本的介入面临更多政策管制与市场准入。^①

第二，“一带一路”涉及不同地理区域、市场环境，原有的基础条件、经济、市场发展都有很大差异，金融工具交易策略差距较大。各区域基础条件不同、市场发展有差异，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人均拥有财富的水平等重要指标存在差距。资金供求反应不尽相同，表现为市场主体适用的融资模式、交易策略具有较大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格局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区域市场主体发展水平、交易平台规范化程度相对较高，对于股权融资及交易策略适应程度较好。相对而言，广大的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主体发展水平、交易平台规范化程度相对较低。^②

第三，“一带一路”涉及不同来源的资本、不同类型的资金，投资取向及风险承受能力有很大差异，传统金融风险管理架构远不能满足需求。相较而言，政策性贷款具有指导性、非盈利性和优惠性等特点，但在贷款主体认定、审批程序及使用要求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性，同时政策风险承受能力强而市场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商业银行资金以利润为目标，而“一带一路”项目投入工期长、收效慢、前期利润低，实施项目贷款操作难度很大，但对于期间具有承担能力的主体进行资金支持是可以实现的，风险考核点要求更多样化。发行债券相比较银行具有风险偏好的特点，相比较银行贷款，对于项目主体的资信程度及债项本身的评级都有很高要求。公司 IPO（首次公开募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要求主体市场化程度较高，具备较好的风险承担能力，而项目组建的公司进行 IPO，相对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资本市场融资难度较大。

二、基于“一带一路”的金融市场新布局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国在坚持互利共赢、优势互补原则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关键环节，深入推进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施行中，先行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被具体化为公路、铁路、航运等领域的联通项目。近年来，中国进行了十余项援外重点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对于改善这些国家人民生活环境、加快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独立都起到了积极影响。^③“一带一路”也被写入中国

^①霍侃等：《“一带一路”会是海外4万亿吗？》，《财新周刊》2015年第23期。

^②马明辉：《破解“资源诅咒”的悖论：浅谈中国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商》2013年第3期。

^③李芹：《援外工程总承包项目（EPC）管理经验》，《工程建设与设计》2015年第7期。

31 个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成了 2015 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标配”，明确了本地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和定位。为了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一系列政府决议及配套政策相继出台，同时金融扶持也提到日程上来，为基础产业“走出去”提供支持。包括：筹建亚投行、内外资银行扩增基建贷款；通过定向发行专项债券方式，对重点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建立健全不同层次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打造更多的股权投资平台。

第一，筹建亚投。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①的倡议。成立亚投行，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多赢选择。对于本地区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就本地区整体而言，可加快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能够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其经济复苏；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第二，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备战。内外资银行基建贷款优势凸显的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备战，加速国际布局，今年预计拟增设数家海外机构，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境外网络布局，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而境内沿线省份的相关布局早已完成，整体金融服务方案已基本成型，与之相配套的信贷和产品政策亦制定完成。2014 年 12 月，国务院提出加大金融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提出简化境外上市、并购、设立银行分支机构等核准手续。以及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发挥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作用，吸收社会资本参与等，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最后，还提出要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稳步放开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服务企业“走出去”。

第三，组建丝路基金。丝路基金^②由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依照《公司法》，丝路基金是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重点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丝路基金秉承商业化运作、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理念，尊重国际经济金融规则，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市场化方式，实现合理的财务收益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它可以定位为一种回收期更长的私募股权投资（PE），可设立子基金。

^①2015 年 4 月 15 日，中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57 个国家名单。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南非、波兰等国先后已同意加入亚投行，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涵盖了除美国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除日本之外的主要东方国家。

^②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注册成立并开始运行。该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第四，更多资金模式探索。“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历史工程，应形成经贸流、金融流、智慧流、信息流、人文流等五个大通道^①，应以共生系统理论指导。最为核心的是资金体系构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成为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主要合作内容，而资金融通是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②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将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向全球辐射的具体表现，对于相关区域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未来，随着战略实施，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融资都将发生重大改变。^③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本质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从经济运行规律来看，启动一方经济首先需要打造贸易中心，由此必然导致大规模前期开发。^④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重点项目已取得重要进展，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应汇聚资源形成合力把“一带一路”建设好。^⑤

三、基于“一带一路”的金融创新之 PPP 私募股权基金

围绕“一带一路”各地方结合战略规划提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将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以一种主权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投资，也不排除 PPP（公私合营）的合作方式。“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循和平发展、经济搭台开路的基本路径，在全球化时代，把中国广袤腹地潜在的市场空间与外部世界更有效、便捷地贯通，寻求与其他经济体的互惠共赢（PPP 模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经“三步走”实现“中国梦”的重大配套条件。^⑥

第一，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领域及运营模式。国务院在 2014 年 11 月 26 日印发《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着重在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意在调结构、惠民生。根据文件精神，着重对生态环保、农业水利、市政设施、交通、能源设施、信息和民用空间设施、社会事业等七个重点领域提出了吸引社会投资的措施。传统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模式包括有限合伙制、公司制、信托制及在这几种基础模式下的变形模式（见表 1）。

①夏立平：《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②林景臻：《公司金融助力“一带一路”》，《中国金融》2015 年第 5 期。

③王敏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国际金融支持战略构想》，《国际贸易》2015 年第 4 期。

④王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论“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发性金融支持》，《银行家》2015 年第 3 期。

⑤缪林燕：《贯彻“一带一路”战略金融支持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工程与劳务》2015 年第 3 期。

⑥贾康：《“一带一路”建设应运用 PPP》，《经济》2014 年第 11 期。

表 1 私募股权基金主要模式

模式	基本特征
有限合伙制	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投资管理公司为基金管理人也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出资，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公司制	股份投资公司的一种形式，公司由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股东组成，并设有最高权力机关股东大会、执行机关董事会和监督机关监事会。通过对这三大机关进行相应的权力配置和制衡，使公司尽最大努力为股东的利益服务。
信托制	契约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大多是以信托的方式来实现。单一的信托模式（参与型），信托公司通过向合格投资者发行集合信托计划募集资金构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将资金投资于被投资企业。
公司+信托制	管理公司采取股份投资公司的形式，投资基金按照信托制募集集合信托资金，将资金投资于被投资企业。
公司+有限合伙制	管理公司采取股份投资公司的形式，投资基金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合伙+信托制	管理公司采取有限合伙的形式组建，投资基金按照信托制募集集合信托资金，将资金投资于被投资企业。
母基金	下设子基金是管理公司采取股份投资公司的形式，投资基金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母基金不直接投资项目，而是通过控股子公司基金的形式进行投资。

第二，PPP 运营模式。2014 年 11 月《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征求意见稿）》出台，被认为是中央为帮助地方政府推进 PPP 项目所进行的政策铺路之举，意图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特许经营行为。PPP 运营几种模式介绍见表 2。

表 2 PPP 几种经典模式

PPP 业务模式	基本特征
割型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根据政府公共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的需要组建相应项目公司，依据政府特许经营及担保，进行平台主体投融资活动。并通过基础业务外包，自己负责运营管理及服务，基于项目收益权现金流，实现资金的投入与退出。
传统混合型	传统混合型地方政府平台业务，可以根据政府公共项目基础的需要组建统一的特许经营公司，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和运营特许公司，政府以补贴及担保形式为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投融资，通过业务自营或外包实现建设目标，通过运营管理及服务收费实现，基于项目收益权稳定的现金流。
公司化结构	公司化结构的地方政府平台业务，政府将根据项目的资金需求，通过担保和谈判的形式从社会积蓄资金，注入项目公司，政府通过对项目公司颁发建设和运营执照及进行监督。

PPP 业务模式	基本特征
DBFO（设计—建设—融资—经营）模式	政府为特许经营项目公司授予特许经营和补贴，项目公司根据项目的资金需求自行进行符合市场合规运作的吸收投资及融资活动。项目公司根据各个环节的需要组建相应的项目子公司或外包，基于项目收益权现金流，实现资金退出。

第三，基于“一带一路”的 PPP 私募股权基金创新模式。“一带一路”带来五大产业机遇。^① 基于“一带一路”创新型 PPP 私募股权基金投融资模式通过计划和市场的合理调控，不仅能够保证政策性资金前期股权投入，还能够使更多的民营资本前期参与项目建设；在过程中，股权基金平台根据现金流的实现节奏逐步推进、扩大民营资本的规模，实现资金的市场化运作，创新点可针对后期项目的实际要求及资金的进入途径进行设计；PPP 架构可充分发挥民营主体的项目运营管理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民营资本的投资回报，及项目退出阶段民营与公办主体的切换。作为有益的创新实践，PPP 私募股权基金已经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开端。2015 年 3 月 8 日，全球首只致力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光伏清洁能源发展的股权投资基金在京启动。该基金由亿利资源集团、泛海集团、正泰集团、汇源集团、平安银行、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联合发起，首期募资 300 亿元，未来 6~8 年将投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生态光伏项目，预计产生 1000 亿元以上的投资价值，修复退化土地 130 万公顷。

表 3 基于“一带一路”的 PPP 私募股权基金投融资创新模式

创新模式	创新点
PPP 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	基于项目需求，调整有限合伙基金合伙人结构，合理安排政府和民营资本的比例结构，强调普通合伙人管理公共项目的的能力，依据“一带一路”产业需求扩大合格投资人及目标企业的范围，重点可考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PPP 公司制私募基金	基于项目需求，调整公司股东结构，强调公司治理对管理公共项目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对政府及民营资本之间的治理架构进行合理设计，依据“一带一路”产业需求扩大合格投资人及目标企业的范围，重点可考虑公共服务类项目。

^① 交通运输类公司：铁路、公路、港口、航运、航空将直接受益于“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业务扩展。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类公司：“一带一路”的道路连通将使得交通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能源管网、电信设施等行业以及建筑类的配套产业受益。设备及配套类制造业公司：包括高铁、港口、工程机械、特高压电网、核电等领域相关的设备制造类公司。原材料类公司：与兴建基础设施相关的原材料，包括钢铁、建材、有色等类别的公司将受益，特别是“一带一路”相关省份相对集中的东南、西北地区的原材料类公司。品牌消费及文化传媒类公司：道路连通、贸易连通中同样伴随着文化沟通，中国的品牌消费品（医药、家电、汽车等）、传媒等公司亦将迎来机遇。

创新模式	创 新 点
PPP 信托制私募基金	对于信托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依据“一带一路”产业需求适时扩大专业管理公司范围、扩大合格投资人及目标企业的范围，重点可考虑项目收益现金流稳定类项目。
PPP 公司 + 信托制私募基金	调整政府、股东与金融机构之间协作的期限、资金结构比例及收益结构，有效利用科学公司治理的优势、信托制的灵活性。
PPP 公司 + 有限合伙私募基金	调整政府、股东及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之间协作的机制和收益结构，有效利用科学公司治理的优势、有限合伙制的管理优势。
PPP 有限合伙 + 信托制私募基金	调整政府、委托人及有限合伙人之间协作的机制及收益结构，有效利用有限合伙制的管理优势、信托制的灵活性，依据“一带一路”产业需求扩大合格投资人及目标企业的范围。

第四，基于“一带一路”PPP 私募股权基金的突出特点。基于“一带一路”PPP 私募股权基金模式下，政府负责政策制定与规划，而将政策执行落实于民间社区或私营部门，后续项目、资金管理则是以共同打造的私募基金平台作为主体，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可将社会力量引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的进程当中，强化了公民意识与社会认同感，同时提高了资源使用效能和建设、运营效率。

一是基于“一带一路”的 PPP 私募股权基金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能，促进了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整个“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私营主体将承担很重要的管理、参与及推动的责任，这些工作体现在项目设计、施工、设施管理过程等各方面。二是基于“一带一路”的 PPP 私募股权基金有利于保证“一带一路”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缩短前期工作周期，也使各方参与成本降低。与一般的 PPP 私募基金相比，更适用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效率和降低工程造价，同时有政府层面的积极支持，将更有利于消除“一带一路”项目完工风险和资金风险。三是通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基于“一带一路”的 PPP 私募股权基金是以政府引导的“一带一路”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实现政府与私人共同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彼此之间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四是对于“一带一路”一些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基础设施及维护，需要根据市场的定价及管理经验进行专业化配置，有必要的需要进行集中采购。基于“一带一路”的 PPP 私募股权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公私双方各自的不足，有利于基于“一带一路”的总体规划形成互利的长期目标，还可以使项目参与方整合组成战略联盟，对协调各方不同利益目标起关键作用。五是基于“一带一路”的 PPP 私募股权基金针对“一带一路”进行专门设计，比 PPP 私募股权基金

模式应用更加有针对性，突破了引入私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组织机构的多种限制，尤其退出机制更加灵活，通过专门设计的多种退出方案更符合“一带一路”各方利益诉求。

四、“一带一路”金融创新发展建议

实现金融创新为先导的战略推进，对于项目实施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应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发挥金融创新机制，基于“一带一路”架构合理设计资金投入节点，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有效匹配，保障投资人的最大利益；平衡“一带一路”项目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国内区域战略与“一带一路”同步有序推进；实现金融创新为先导的战略推进，合理结构化利用资金；发挥政府职能，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保障。通过以上努力，才能鼓励更多民营资本参与项目建设，保证民营资本的投资回报，减轻政府初期建设投资负担和风险，形成政府、平台和私人企业“多赢”的合作局面。

第一，合理安排“一带一路”项目节点，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有效匹配。资本总是流向收益率高而风险相对较小的地方，假设大多数投资者均是风险厌恶型的，那么投资者只有预计到该项目的未来收益率较高时才会积极参与。为此，需要强调以下几方面的协调工作：一是对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设计资金进行分时、分段安排及管理，尤其对于投入量巨大、建设周期过长、回收期长、回报率相对较低的项目进行多主体参与，结构化安排不同风险承受资金介入；二是对于前期建设期较长的项目，尽量安排政策性较强的资金，对于已经具有现金流的项目，适度安排社会资本介入，对于后期现金流较为充沛的项目，较多安排社会及金融间接资金介入；三是如有些项目涉及国外资本参与，应积极结合外汇管制相关要求，关注汇率风险可能对外资产生的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及该国政治风险等。

第二，平衡“一带一路”项目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战略有序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需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不断完善区域经济结构，通过实体经济建设，使区域经济走向更加协调发展。根据最近推进的区域经济建设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间段对区域发展发表过很多论述。这些论述，逐步完善形成一个体系，核心强调了六个字，即公平、协调、共享。这些思想，也是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思想的延续与深化。二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大问题，改善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发展的基础，推进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转型及结构化均衡。三是需要在“一带一路”的总体战略下继续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强化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区域开放的讲话，指出应既包括对国内的开放，也包括对国外的开放。为此，可以预见，

不论从经济、政治还是国际关系来看，未来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意义将十分深远。

第三，实现金融创新为先导的战略推进，合理结构化利用资金。“一带一路”在客观上需要基础设施先行，这是一个和其他各经济体互动的发展过程。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硬件环境亟待改善，强调基于传统私募股权基金模式创新型的 PPP，是引导社会资本民间市场主体加入的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型投融资机制。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应积极筹建发展专属的以民营资本为主要部分的“一带一路”股权投资基金主体机构、投贷基金以及政府引导资金，连接到相对稳定的资产管理长效机制上，将是保障项目顺利进行的关键。

第四，发挥政府职能，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保障。政府是股权投资领域的重要主体，其政策制定的引导作用对推动股权投资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发挥其宏观指导与调控的职能，保障股权投资良好的外部环境，为股权投资提供政策、法律上的支持。在监管方面，做好股权投资的监管，规范投资行为。目前，法治体系里面还存在着与“一带一路”相关概念无法可依的现象，相关法律法规及暂行条例应逐步形成，之后再逐渐提高立法的层次。另外，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些重要节点上面，应有政府规划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有意识地做出适合不同地域及产业特征几个主要类型的创新方案，作为可以推广的基础。

五、总结及展望

“一带一路”战略实践，特别是要在基础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①，其中金融工作其他几方面工作的核心要素。具体实践环节会突出以下几方面：发挥好各类多边、多双边政府性基金的引导作用；发挥社会资本的主力军作用，深化金融机构合作，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保障；以资金融通为桥梁纽带，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优势产能合作等为重点，助推和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合作；继续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以及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结算成本。基于“一带一路”的金融创新，首先应拓展融资渠道，包括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引导资金及国内各地配套政策资金及社会资本；同时，还应拓展平台建设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更多的网点，为沿线各国提供金融服务，以及政策性、商业性的专门公司，为“一带一路”提供信用担保和相关保险服务等。

^①一是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是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三是拓展产业投资合作，四是深化能源资源合作，五是拓展金融合作领域，六是密切人文交流合作，七是加强生态环境合作，八是积极推进海上合作。

在传统的金融体系架构下,运用传统较单一的金融媒介形式,不能很好地满足战略推进的需求。针对“一带一路”项目特殊性,通过对目前市场大量的金融实践模式进行分析,本研究提出基于私募股权基金平台基础结合 PPP 组织架构进行“一带一路”项目金融体系搭建具有可行性。“一带一路”创新型 PPP 私募股权基金投融资模式,能更好地综合市场与计划的经济效率,兼顾发挥“一带一路”实践过程中的政府指导作用、紧密更多民营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一带一路”专项资金的有效运作、民营资本的投资回报,形成政府、平台和民营企业“多赢”的合作局面;有利于在国内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多层次资金主体共同参与的前提下,解决项目资金的分步投入、分阶段管理、分层次回报、分主体量化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美] F. M. 谢勒著,张东辉等译:《产业结构、战略与公共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2. 郑茂良:《从 20 世纪末的世界局部动荡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问题研究》2000 年第 1 期。
3. 石志伟:《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政府融资模式风险分析》,《价值工程》2013 年第 1 期。
4. 马明辉:《破解“资源诅咒”的悖论:浅谈中国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商》2013 年第 3 期。
5. 贾康:《“一带一路”建设应运用 PPP》,《经济》2014 年第 11 期。
6. 李罗莎:《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对策研究》,《全球化》2015 年第 1 期。
7. 郭怀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带动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布局海外市场》,《中国总会计师》2015 年第 2 期。
8. 陈恒等:《“一带一路”物流业发展驱动因素的动态轨迹演变——基于劳动力投入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9. 缪林燕:《贯彻“一带一路”战略金融支持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工程与劳务》2015 年第 3 期。
10. 王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论“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发性金融支持》,《银行家》2015 年第 3 期。
11. 夏立平:《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12. 霍侃等:《“一带一路”会是海外 4 万亿吗?》,《财新周刊》2015 年第 23 期。
13. 王敏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国际金融支持战略构想》,《国际贸易》2015 年第 4 期。
14. 林景臻:《公司金融助力“一带一路”》,《中国金融》2015 年第 5 期。

(下转第 119 页)

发展伊斯兰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白宇飞 杜晓雨

摘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伊斯兰国家，我国应予高度重视。充分利用伊斯兰金融的杠杆作用，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需求，也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互联互通、加快开发开放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一带一路” 伊斯兰金融 宁夏

作者简介：白宇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杜晓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贸与会展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建设“一带一路”是我国根据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2014年，“一带一路”作为三大国家战略之首被列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与《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2月，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小组成立。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和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事实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经济互补性较强，发展空间广阔。目前，中国拥有基建等领域优势产能、充足的资金和外汇储备，但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原材料需求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与之相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特别是基建需求巨大，存在巨额的资金缺口。从数据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44亿人口，GDP总量高达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我国与该地区经贸合作密切，占我外贸1/4，近十年贸易年均增长达到19%，2014年与中国货物贸易量为1.12万亿美元。“一带一路”战略一旦变成现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

在“一带一路”路线图当中，囊括了中国和其他亚洲43国、中东欧16国、独联体四国、非洲一国，共65个国家。其中，伊斯兰国家29个，占“一带一路”国家总数的45%，占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总数的51%，分别是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西亚北非的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黎巴嫩、埃及，中东欧的阿尔巴尼亚，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这些国家既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受益者，也是重要参与者，应引起高度关注。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本质是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互联互通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金融，即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力量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首先应充分利用伊斯兰金融的杠杆作用，将发展伊斯兰金融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以加强金融领域合作为契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的互联互通、加快国内区域的开发开放，对于中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赢得优势、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

一、伊斯兰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

（一）伊斯兰金融资产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伊斯兰国家泛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或官方宗教），或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是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正式成立于1970年，设有伊斯兰开发银行、伊斯兰发展基金会、伊斯兰经贸常设委员会等机构。截至2011年，该组织共有57个成员国，遍及亚洲、非洲和欧洲，人

口近 17 亿，约占全世界人口的 24%。由于伊斯兰国家地处海湾，拥有世界 70% 的油气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石油美元激增，经济持续增长，穆斯林移民潮、宗教认同感的加深，以及石油美元带来的财富效应等，带动了伊斯兰金融的蓬勃发展。从 20 世纪 60 年代全球首家伊斯兰银行成立，到 2013 年年底伊斯兰金融资产达到 1.8 万亿美元，伊斯兰金融发展十分迅速。尽管目前伊斯兰金融行业只是组成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小部分，但作为国际金融界的新兴力量，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据卡塔尔半岛网报道援引标准普尔公司分析称，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总额有望在 2020 年达到四万亿美元。

伊斯兰金融具有浓厚的宗教背景，与建立在西方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传统金融有着根本不同的思想基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创立初期。当时，穆罕默德（Mohammed）发布了禁止收取重利的命令，希望通过禁止放债获利，消除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从此，利息一直被禁止，并延续至今。伊斯兰金融以《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教义为基石，并与现代金融相调和，包括服务于伊斯兰国家的货币制度、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伊斯兰金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解就是指伊斯兰国家特有的，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并和现代金融原则相调和的金融形式；广义的理解就是指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并和现代金融原则相调和的所有金融形式和金融关系，除了伊斯兰国家内部特有的伊斯兰金融形式，还包括非伊斯兰国家（地区）的金融机构为吸引伊斯兰国家资金而设计出的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相关金融形式。伊斯兰金融产品主要有伊斯兰银行、债券、基金、保险等。在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总额中，伊斯兰银行占 80%、债券 15%、基金 4%、保险 1%。

伊斯兰金融的思想基础决定了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一，严禁支付和收取利息。被禁止收取和支付的利息是在贷款、销售或投资过程中事前确定的固定正值收益。允许买卖，但是禁止重利是伊斯兰教金融思想的最重要原则，伊斯兰教禁止收取和支付任何形式的利息，而允许获得利润，这来源于《古兰经》中关于严禁利息却允许利润发生的规定。“禁止贷方从借贷中获取任何收益，哪怕是贷方借用一下借方的农具，或到借方家中吃顿晚饭，甚至连站在借方屋檐下乘凉也被视为收益之列。”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伊斯兰金融严禁支付和收取利息的原则。总之，与本金的偿还期和数额有关的任何正的、固定的、事先确定的利息都是被禁止的。第二，主张风险共担和利润共享。贷方和借方是利润和风险共担的。伊斯兰金融中，借贷双方的角色已经完全从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变成了商业合作伙伴。银行参与到借款人的日常经营中去，参与并提出决策，研究适合借款人企业的经营模式等，并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实现双方共担经营活动带来的利润和风险。传统商业银行所确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明显有利于贷方，即不管借方借款用途

是什么，如何使用这笔借款，借款人经营状况怎样，能否如期归还借款，这些都不是贷方所考虑的。贷方关心的只是借款期限一到，借方必须还本付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贷方的传统银行不承担任何风险，一本万利。第三，反对过度积累财富。伊斯兰金融思想反对过多积累货币财富的行为，闲置财富于个人之手是不合教法的行为。因而要将闲置的货币财富储蓄，但是储蓄的发生应结合一个家庭当下和未来收支情况、财务状况做出决定，而不是为获取银行利息。为了获得银行利息而去储蓄，已经背离了伊斯兰教义中储蓄的含义。储蓄应该是穆斯林个人自发行为，是权衡了当前和未来消费后做出的决定，而不是由于个人贪欲，变成了过度积累财富的手段。伊斯兰银行所提供的活期储蓄账户，一般是无利息账户，银行用储户的钱去做无息贷款，将闲置资金融通到了需要的一方，在此过程中，储户和银行都无收益，没有利息发生。第四，用盈亏共担（PLS）模式代替传统的借贷关系。伊斯兰银行对于活期储蓄是不支付利息的，从阿拉伯国家具体实践来看，这样的银行融资模式是可以将社会闲置资金吸纳到银行内部。对于定期存款，传统银行要支付高于活期存款的利息。但在伊斯兰银行中，这种利息演化成了银行通过负债投资所获取收益中的一部分，并将这一部分返还给定期储户，作为其投资回报。对于贷款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盈亏共享或股份参与的形式。银行投资于有资金需求的客户，事先与其签订合同，盈利后按照合同约定分享利润；如果亏损，则双方共同承担损失。或者说，伊斯兰金融系统下的银行更像是一个风险资产投资公司，不但提供财力支持，在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也会与客户进行合作，如果出现亏损，则双方按照合同事先约定的出资比例分摊损失。另一种模式是伊斯兰银行通过代购转销合同、租赁合同等，以合法买卖关系、租赁关系代替传统银行的有息借贷关系。

伊斯兰金融以上特点使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在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有 71 多家银行宣告破产，而伊斯兰金融却经住了风浪的考验，足以证明其强大的生命力。自 2000 年以来，伊斯兰金融资产的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 15%~20% 之间，服务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中东、东南亚不断扩大到欧美、北非乃至全球。特别是伊斯兰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加，2003 年达到 267 家，2009 年变成 450 家。目前，全球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的银行已有 1100 家，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建立了伊斯兰银行。也正是看到伊斯兰金融的巨大市场，不仅一些穆斯林聚集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林、巴基斯坦、沙特、阿联酋等国对伊斯兰金融十分重视，一些非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了提高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把发展伊斯兰金融列为重点工作，纷纷着手修改法律和监管制度以适应伊斯兰金融的需要，希望藉此增强对石油资本的吸引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各国的伊斯兰学者越来越

重视以经训为基础的传统金融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创新，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和报告，特别是一些伊斯兰国家还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密切注意。

（二）伊斯兰金融在中国发展空间很大

长期以来，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务相当迟缓，目前只有信仰伊斯兰教人口较集中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程度较高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现有穆斯林人口 2300 多万，集中分布在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等地区。这些地区的群众与伊斯兰世界有着强烈的宗教认同感，他们中很多人愿意并希望以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方式开展金融活动。在上述地区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市场潜力巨大。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拥有穆斯林人口 240 多万人，占该区总人口的 35% 左右，是中国穆斯林聚集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发展伊斯兰金融方面有着独特的历史、人文、经济和政策优势。此外，宁夏还拥有一大批伊斯兰教法学家和金融专业人士，具有发展伊斯兰金融的人力资源优势。因为宁夏是回族自治区，其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和内容几乎都符合伊斯兰金融投资的原则，加之宁夏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这都为伊斯兰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宁夏高度重视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早在 2008 年底，宁夏便向国务院相关部委征求关于在宁夏开办伊斯兰金融业务试点的意见，通过认真论证和充分准备，最终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2009 年 12 月 24 日，经宁夏银监局批准，由宁夏和银川市两级财政控股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宁夏银行开始试点开办伊斯兰银行业务。在组织结构方面，宁夏银行专门设立了伊斯兰金融事业部，统筹伊斯兰银行业务的产品开发、风险管理和利润核算。同时，聘请拥有金融功底的伊斯兰教法学家组建伊斯兰咨询委员会，负责审核和评价伊斯兰银行业务产品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要求。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累积开立保管账户 1011 户，账户余额 5300 万元，累计办理加价贸易业务 222 笔，发放金额 13.4 亿元。宁夏试点伊斯兰银行业务，为我国探索伊斯兰金融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鉴于此，宁夏应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机遇，充分利用自身和伊斯兰国家相近的人文优势和良好的经贸合作优势，把发展伊斯兰金融作为落实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的重要内容，利用中阿经贸论坛、博览会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与伊斯兰国家在金融、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伊斯兰金融业务，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

除内地宁夏外，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充分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伊斯兰金融。

香港作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并且在联系国际市场和中国内地市场方面具有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鉴于伊斯兰银行在国际金融业中的表现和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现状，香港率先开展了伊斯兰金融业务。2007年8月，香港市场首个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得到香港金管局的批准，由马来西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推出。同年11月，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批准恒生银行推出伊斯兰中国指数。与此同时，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出一只伊斯兰基金，首月就募集到6500万美元。2008年1月，香港金融管理局组织了“伊斯兰金融研讨会”，邀请各国专家探讨如何加快成立伊斯兰金融市场。随后，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率团访问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海湾三国，并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表示，香港金融服务基础稳固，法律制度灵活完备，完全可以成为东亚地区的伊斯兰金融交易中心。2009年4月，香港汇丰抢先推出伊斯兰债券。据《伊斯兰之窗》2012年3月1日引自《文汇报》的消息称，香港希望成为中国的伊斯兰金融中心，即将推出有关法律的修订拟稿，确保该行业受到平等的税收待遇。2013年7月，香港就伊斯兰金融产品开发做出立法修订。2014年9月，香港成功发售首批期限五年总额十亿美元伊斯兰债券。据香港金融管理局透露，本次发售的美元伊斯兰债券受到全球投资者的热烈追捧，录得4.7倍超额认购。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这是全球伊斯兰金融市场上首批由获AAA评级政府推出的美元伊斯兰债券，也是香港伊斯兰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经过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经在伊斯兰金融发展，尤其是伊斯兰债券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日益成为伊斯兰资金进出远东的枢纽、国际伊斯兰金融服务平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良好的平台，应在国家支持下，致力于发展成为境外人民币离岸中心，并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点，探索债券市场的新品种，如伊斯兰债券、丝绸之路大型合作项目特种债券等，引导伊斯兰世界的资金投向“一带一路”建设。

（三）伊斯兰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前景可期

虽然伊斯兰金融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发展环境的改善，与中国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的伊斯兰国家将会越来越多。下一步，中国金融机构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必将由重点突破实现全面开花，为“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开辟广阔空间。其中，伊斯兰国家积极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亚投行是由中国提出创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

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法定资本 1000 亿美元，总部设在北京。截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 57 个。其中，伊斯兰国家高度重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阿曼、土耳其、埃及、科威特、卡塔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等积极加入。因此，亚投行在全面投入运营后，应运用一系列方式，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吸引伊斯兰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在亚投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撑的同时，中国所倡导设立的丝路基金亦能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领域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2014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期间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4 年 12 月 29 日，该基金在北京注册成立，并正式运行，首期资本金为 100 亿美元，其中国家外汇管理局出资 65 亿美元，中投、进出口银行、国开行也分别出资 15 亿美元、15 亿美元和 5 亿美元。2015 年 4 月 20 日，丝路基金、三峡集团与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伊斯兰堡共同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这是丝路基金首个对外投资项目，标志着丝路基金开展实质性投资运作迈出重要一步。据悉，目前丝路基金已确定一批重点跟踪项目和若干潜在可“落地”的投资项目。在下一阶段，丝路基金应继续寻找投资机会，通过建立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模式，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吸引社会资本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此外，2014 年 12 月，巴林交通部长兼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代理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Kamal bin Ahmed）表示，巴林坚定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愿景，对亚投行持开放态度，期待与中国开展伊斯兰金融合作。2015 年 3 月 18 日，也门伊斯兰银行执行董事纳吉在中国驻也门经商参处表示，也门伊斯兰银行期望同中国金融机构开展相应合作，共同推动中也友好，促进两国经贸持续发展。对这些强烈的合作意愿，中国应积极行动，顺势而为，力争将其变成实实在在的建设资金和项目。

二、伊斯兰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应注意的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规模宏大、涉及面广、牵涉复杂的战略利益，推进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应予以高度重视。就影响伊斯兰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约中国发展伊斯兰金融的问题；二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加强金融合作特别是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中国发展伊斯兰金融面临法律法规、规则体系、人才储备等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问题。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意逐步开放金融领域。目前，外资进入中国不存在障碍，但伊斯兰金融禁止利息导致伊斯兰金融产品有限。就目前流行的伊斯兰金融产品而言，伊斯兰投资在中国难以开展商业银行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和伊斯兰群众的参与。二是伊斯兰金融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协调问题。伊斯兰金融与中国现有金融体系的规则不同，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如何协调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比如，2012年，宁夏伊斯兰金融中心和金融开放的政策未能获得国务院批准，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伊斯兰金融并不适用于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和法律财务税收体系。三是缺乏伊斯兰金融人才。作为伊斯兰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不仅要具有渊博的金融知识，还必须熟知伊斯兰教义，才能根据伊斯兰金融原则开发出伊斯兰金融产品、对投资项目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对金融投资组合进行分析和管理的、对产品和业务风险进行评估和有效规避、并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借鉴传统金融模式来创新伊斯兰金融。因此，伊斯兰金融对经营管理者在知识结构和层次上的要求远高于普通的金融专业人才。目前，中国从事伊斯兰金融研究的专家学者中，一部分是金融专家，从金融专业方面出发，介绍伊斯兰金融的特点、发展概况，比较分析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竞争优势；另一部分是伊斯兰教学者，从伊斯兰教教义出发，对伊斯兰金融的内涵、经营原则进行阐释。但是，同时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经营管理才能、伊斯兰教义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短缺。国内的金融专家和伊斯兰教学者又难以形成合力，而这种具备金融、宗教、法律等多方面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加之中国尚未加入任何国际性的伊斯兰金融组织，与国际伊斯兰金融机构的交流较少，目前国内还没有培养伊斯兰金融专业人才的机构，这都将制约着中国伊斯兰金融的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金融合作面临的实际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于现代化建设阶段，面临着政治转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成熟度较差，特别是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家的局部地区关系相对紧张，极易引发国家风险，应予高度警惕。就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金融合作的具体问题而言，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的财力有限，难以提供主权担保，影响项目还款来源的稳定性，也增加了银行和企业的融资担保成本。许多国家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效率低、信用体系不完善、汇率波动较大等问题，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较多冲突。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局动荡，国家缺少长远发展的稳定性，影响金融机构开展国际业务和金融合作。

三、伊斯兰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伊斯兰金融是对中国现行金融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也是落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当前，应全面推进金融理念和合作方式创新，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清除不利于伊斯兰金融成长的体制性障碍，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鼓励引导伊斯兰国家及各类伊斯兰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一带一路”建设。

第一，完善中国现行金融政策和制度规定，借鉴国外伊斯兰金融发展成功经验。各国在发展伊斯兰金融时采取不同的模式，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伊朗、苏丹采取的经济模式强制伊斯兰化；二是马来西亚采取的伊斯兰银行与传统银行并存的双轨模式；三是开设零星的伊斯兰银行或伊斯兰窗口。中国穆斯林人口比重相对于其他穆斯林国家来说并不是很大，经济模式强制伊斯兰化或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金融系统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要从开设零星的伊斯兰金融机构做起。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引进来”和“走出去”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但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伊斯兰国家的差异，在发展伊斯兰金融时会面临一些法律和监管方面的冲突（如银行可否投资、收取利息等问题）。为此，应在国家层面制定支持伊斯兰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将对伊斯兰金融的合规监管纳入到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监管框架中，减少两种金融体系的冲突和摩擦。认真研读国际伊斯兰金融组织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IFSB）、伊斯兰金融机构会计与审计组织（AAOIFI）发布的相关监管准则，使中国伊斯兰金融机构从设立、运营甚至退出都完全符合国际伊斯兰金融机构制定的标准。进一步放宽相关管制政策，简化中国商业银行在伊斯兰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及并购的审批核准手续，鼓励支持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业务布局，同时吸引伊斯兰金融机构来中国开展业务。加快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对接和业务处理规则惯例的制定，着力消除“一带一路”沿线小币种国家在货币兑换及汇率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性障碍。同时，构建跨境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中国在跨境电子商务的监管、结汇、税收等方面的管理体制，为“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投入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鼓励人民币“走出去”，扩大货币互换协议的范围。可通过建立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规划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等举措与伊斯兰国家开展金融合作，将人民币纳入伊斯兰国家储备货币，推动伊斯兰银行、债券、基金等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业务等。同时，推进人民币与伊斯兰国家货币的直接挂牌、兑换和交易，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币清算中心，创新人民币风险规避与资金增值产品。发行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通用的银行卡，扩大银联卡在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的国家和地区

使用范围。此外，通过丝路基金等专项基金的设立、香港离岸中心的建设等方式，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步伐。

第三，加强与国际伊斯兰金融机构的沟通和交流。建立伊斯兰金融主管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定期交流沟通区域内金融形势，协调各自立场。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包括定期对货币结算代理行的资信程度给予公布。建立区域征信体系、区域金融信息披露管理系统。建立区域反洗钱合作系统，维护金融安全。加强沿线国家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合作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合作，完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建设，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进行跨境金融服务创新。

第四，加强伊斯兰金融人才的培养。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不同，其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参与伊斯兰金融首先要了解伊斯兰教义，知道投资范围及收取回报的规限，需要制定法律的人才、会计师及律师等等，必须在培养伊斯兰金融人才上下功夫。一方面，应与伊斯兰国家合作办学，可在中国宁夏、香港等地高校设立阿语能力水平标准测试，由国家统一进行相关标准测试的内容和规则设置，储备阿语人才。另一方面，开设伊斯兰金融知识培训班，聘请伊斯兰金融管理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对金融主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员工进行业务培训，设立伊斯兰金融教育研究中心和伊斯兰金融资格认证体系。此外，应积极参加国际伊斯兰金融论坛，加强同国际伊斯兰金融顶端人才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2. 邹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3. 蒋志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支持主导作用》，《国际经济合作》2014 年第 9 期。
4. 姜英梅：《伊斯兰金融全球化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西亚非洲》2014 年第 2 期。
5. 朱苏荣：《丝路核心区的金融支持》，《中国金融》2015 年第 5 期。
6. 蒙志标：《伊斯兰金融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财经界》2012 年第 6 期。
7. 刘天明、张哲：《建设宁夏“中阿金融合作中心”的思考》，《宁夏日报》2013 年 8 月 28 日。
8. 臧倩：《香港发展伊斯兰金融迈出坚实步伐》，《沪港经济》2014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李 蕊、杜振华

· 产业发展 ·

创新供销合作社打造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中坚力量*

胡正堦 孙炳耀 窦勇 艾永梅

摘要：从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视角研究如何构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综合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供销社综合改革两大主题的新理念和新政策，基于河北省的实地调研，分析当前供销合作社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发挥作用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供销社综合改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供销合作社 合作经济 农业经营体系 农村经济

作者简介：胡正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处长、博士；

孙炳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窦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博士；

艾永梅，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高级经济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一再强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供销社改革，2015年4月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综合改革的决定》。供销社改革与构建新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2014年重点课题《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发挥供销社作用的研究》缩写。课题指导聂振邦，项目组组长王军；参加研究报告写作的还有徐雪峰、毛飞。河北省供销社为课题调研提供支持，特此致谢。

型农业经营体系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供销社改革将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强劲动力，并可望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中坚力量。

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战略意义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我国新时期农业领域改革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①。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经营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②。2013年、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于发展我国农业、改善农村面貌以及农民生活发挥了巨大作用。

改革使我国形成高度同质性的小农户。耕地承包经营大体上按生产队或大队当时的人口平均，于是形成大量小农户。其中绝大多数农户的承包地面积小于十亩。2012年数据显示，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7.5亩。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与农户小生产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是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矛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我国农业生产的又一重大制度改革。

（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我国当前已进入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农业生产逐渐从依靠大量消耗资源，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上来。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农业和农民对现代科技的依赖性和关联度明显提高。

但与我国“四化”协调发展中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还比较缓慢，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利于把以往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转变为规模化的现代化大生产，有利于全面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利于完善社会化服务推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技术设备的普及，全面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

（三）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支撑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可以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发挥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大幅增加农民的收入。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农民可以将农村耕地流转给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可以将房屋和宅基地进行自由流转，通过市场化和资本化的途径获得财产性收入。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既可以去城市打工，又可以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打工获得工资收入。同时，农业规模化和社会化生产可以围绕着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存贮、销售等环节形成更多的农业企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解决“谁来种地”难题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放弃低效益、小规模的生产，流动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留在农村种地的主力基本变成了老人和妇女，土地资源浪费、农民的老龄化、农村的空心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谁来种地成为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原有的农业经营方式下，这些难题无法得到解决。

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发展以适度规模为特征的家庭农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把想种地、能种地、会种地的农业人才留在土地上，解决“谁来种地”难题，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在稳定农业生产的同时，能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近年来实现了“十连增”，但仍隐藏着诸多隐患。一个突出问题是，粮食的自给率呈下降趋势，2012 年底已不足 90%，粮食进口量连年快速增长。2013 年，我国谷物进口接近 1500 万吨，其中小麦 554 万吨、玉米 327 万吨、稻米 227 万吨，大豆进口突破 6000 万吨。我国目前粮食人均占有量仅 430 公斤，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可以预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对粮食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仍是我国农业首先要考量的问题。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助于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稳定农业生产。

（六）围绕供销合作社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

合作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原本核心理念之一。早在战争年代，党就在根据地、解放区支持农民发展合作社。上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合作化运动推动农村迅速、普遍地建立了生产合作、信用合作和供销合作组织。经过公社化及计划经济的曲折，供销社逐渐失去合作性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个人及市场的作用明显加强，集体经济减弱。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让供销合作社恢复合作性质，承担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重任，体现了共产党原本的理念。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多次要求供销社恢复合作性质。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恢复和加强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并提出试验“基层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县级供销社改为基层社的联合社”。1993年中央十一号文件重申“供销社要按照合作社原则，尽快办成农民的合作商业组织。”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明确“供销合作社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重申供销社“坚持合作制基本原则”。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综合改革的决定》，第三次重申“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性”。

供销合作社恢复合作性质，紧密联系农民，把合作因素注入农业经营体系，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不仅表现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现代化理念，还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理念。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社会主义农业经营体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农业经营体系。

二、供销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于1954年，发展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供销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有过辉煌，在涉农流通中发挥主导作用，占有很大份额。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供销社面临新的困难，一直在坚守阵地，并顺应新形势而寻求新的发展。

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门户网站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系统实际从业人员214.3万人，当年销售总额37646亿元，汇总盈利354.4亿元。其中农业生产资料类销售额6941.1亿元，日用消费品类销售额11392.8亿元，农副产品类销售额6591.9亿元，再生资源类销售额2299.1亿元。粗略估算，在农资经营、农村消费品市场以及农产品流通三个方面，供销社均大约占全国1/4的份额。^①

^①杨团、孙炳耀等：《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一）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供销合作社顺应农业农村发展新形势和为农服务新要求，围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较明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是大力推进农业服务规模化。供销合作社利用自身组织完整、网络健全等优势，整合农资、农机、技术等生产要素，由基层社与村两委共同组织，为农民提供耕、种、管、收、加工、销售全程托管或几个环节的半托管服务。

二是围绕农民需求提供综合服务。在供销合作社网络建设的终端村级综合服务中心，除了开展日用消费品销售、农资供应、农产品购销、废旧商品回收外，还围绕农民需求提供农业科技、信息交流、文体娱乐、健身医疗、宣传教育等多种服务。

三是依托农资经营网络提供农业科技服务。将公益性与经营性、科技服务与物资供应结合起来，在销售农资的同时，通过庄稼医院等广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咨询和培训等科技服务。

（二）供销合作社构建多元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联系

各级供销合作社整合利用社有企业、农民合作社等优势资源，打造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引领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大力发展社有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有企业是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重要载体。2013 年，全系统拥有各类法人企业 18699 个，实现营业收入 16126.5 亿元，资产总额达 11021 亿元。拥有各级政府和省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289 个，带动农户 1788.4 万户。

二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截至 2013 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共组织农民兴办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 93491 个，入社农户 1114.3 万户，此外还大力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和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改造、新建新型基层社，使之成为为农服务的新型经营主体。

三是强化“一网多用、双向流通”服务功能。实施“新网工程”与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基地的对接，通过建立“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将企业与市场、产加销连接起来，积极推动农产品进超市、进社区菜市场 and 批发交易市场，建立农产品直供连锁店和社区店、蔬菜直销车、平价商店等，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三）供销合作社搭建农村生产生活综合服务平台

总社于 2006 年开始在全系统实施“一社两店入村服务工程”，规范发展村级综合服务社，并提出了大部分行政村村村有综合服务社，社社有日用消费品连锁便民店和农资供

应连锁店的发展目标。同时提出要实行“一个平台、多家利用”，积极吸纳并方便各个部门通过综合服务社开展为农服务，逐步把综合服务社办成多功能的农村综合服务社，并于2011年颁布和实施了我国农村综合服务社管理的首个标准——《GH/T1069-2011农村综合服务社规范》。

截至2013年6月，供销合作社拥有超市便民店32万个，覆盖了70%以上乡镇和将近50%行政村，建设了一系列社区平价超市、汽车蔬菜超市、农产品大篷车等便民网店。在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社建设方面，截至2013年8月，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发展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社数量达28.8万个，覆盖了全国40%以上的行政村，服务内容涉及农资服务、庄稼医院、农化指导、农产品购销、日用品销售、文娱、托儿所、医疗卫生、废旧物品回收、金融等多个方面的社区便利服务。

（四）供销合作社加强现代化农业流通网络

农资销售、农副产品、日用品及再生资源回收是供销合作社的四大业务板块，以此为基础构成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

供销合作社具有覆盖全国、深入农村基层的农产品流通网络和日趋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品牌优势。近年来通过推进希望工程，供销系统流通设施建设和经营服务网络快速发展，布局日趋合理完善。目前供销系统各类经营服务网点91万个，连锁经营和配送企业5000多家，拥有农产品批发市场2500多个，年交易额在亿元以上的市场占全社会的30%。建立县级配送中心1800多个，农副产品设立网点1.59万个，仓储面积达到700多万平方米，冷库1400多个，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产品流通设施体系。目前全国多地供销合作社都在实施六个“统一”，以使供销合作社在农产品销售服务领域日趋专业化和标准化。“新网工程”重点建设农业生产资料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农副产品市场购销网络、日用消费品现代经营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为主体。

截至2013年1月，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新网工程”已发展91.28万个各类连锁经营服务网点，覆盖全国80%的乡镇和40%的建制村，初步形成了县有配送中心、乡有综合超市、村有便利店的连锁经营网络，进一步提升全系统流通组织化程度和流通现代化水平，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助农增收，拉动农村消费。截止到2013年6月，供销系统共发展农业合作社近七万家，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二万多个，连接农户1000万户，所发展的合作社和生产基地多数通过了有机、绿色或无公害的认证。

（五）供销合作社探索开拓农村普惠金融

近些年来各地供销合作社参与金融服务取得了一些成绩，并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化、

组织形式多样化、金融产品灵活化的特点。参与形式主要包括三类：与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合作、参股金融机构和内部设立金融机构等方式，并积极探索合作金融。一些地区的供销合作社根据“三农”对金融的新要求，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建立担保公司、参与农村商业银行或村镇银行、设立资金互助组织或在农民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探索了供销合作社金融服务“三农”的新形式，取得了较好成效。截至 2014 年底，全系统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29 家，贷款余额近 20 亿元；担保公司 65 家，担保金额 29 亿元；参股农村商业银行或村镇银行 24 家；领办各类资金互助组织 23 家，贷款余额 1.67 亿元；开展资金合作互助的农民合作社 469 家。

三、供销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要把供销社打造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中坚力量，必须充分认识和解决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包括：

（一）服务不充分，有待加强基层社“三位一体”建设

供销社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坚守涉农流通服务，并探索开拓农业生产服务和金融服务，但仍然很不充分。这与供销社综合改革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基层社必须迈向“三位一体”。

2006 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刚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就在当年初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构想。后来在 12 月 19 日的全省现场会上进一步表述为：“三位一体”是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供销合作社进行了探索，在领办各类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协会社团，吸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开展农民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三位一体尝试。各地供销合作社已在构建“三位一体”方面取得一定经验。山东省供销合作社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础上，发起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在上规模、管理规范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基层供销合作社内部实现服务功能综合化。还有一些地方供销合作社以县级供销合作社为主导，发动基层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信用合作社和公司组建协会（联合会），以其为平台开展为农服务，例如温州市依托农民合作社联合会施行的资金互助会。

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建立供销社综合服务平台，统一服务后台，使之成为农民合作金融、联合购销、农技推广等经济活动的载体，承担农民福利、社区文化等公共服务。该综合服务平台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农资、日用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病虫害统防

统治、植保方案、测土配方、作物托管等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并提供场地和标准化管理，引进各类主体入驻该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养老托儿、金融保险等业务，同时开展电子商务线上到线下（O2O）、企业对消费者（B2C）、企业对企业（B2B），实现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二）组织不成体系，有待贯通基层、县、市、省及全国各级的供销组织联结

供销合作社历史上就存在块块管理、互不统属的问题。改革以来，各级供销社的发展缺乏统筹规划，社有企业各闯市场，基层社逐渐弱化，得不到县级以上供销社及社属企业的支持。而各级社有企业由于缺乏基层社这条腿，在农村市场中很难立足，十分被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创新“省、市、县、基层社+中央”的支撑体系，强化两头：一是强化总社的指导管理、政策研究、战略规划、产业布局、区域协调功能；二是强化基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职能和自主性。

在基层，依托供销合作社的经营网点、庄稼医院或综合服务平台，庄稼医院或综合服务平台，由基层供销合作社领办、吸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基层农资公司等经营主体，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或发起设立担保公司，为社员提供融资担保。基层综合服务平台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农资、日用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病虫害统防统治、植保方案、测土配方、作物托管等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并提供场地和标准化管理，引进各类主体入驻该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养老托儿、金融保险等业务，同时开展电子商务 O2O，B2C，从而实现生产、生活、电商、供销、金融、社区综合服务融合的平台。

在联合社层面，由县级社自下而上入股上级联合社，成立合作社联合社，相应的经营网点配套有配送中心、仓库后台管理，在合作社之间开展统一结算、贸易信贷、信用合作，并设立联合社资金调剂平台；这一层面的电子商务主要以后台供应链管理为主、以少量 B2B 为辅。

在总社层面，建设全国性供销合作社网上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全系统资源，实现协同运行，该平台整合并对接各地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供求资源，以及生活类包括文娱、家政、日用消费等信息对接，整合全系统农资、农产品、农村日用品的网络和渠道，实现“三网合一”、协同调动。并配合自下而上的资本运作，推进全系统形成自下而上、上下贯通的实体性合作经济组织。根据 2015 年中发 11 号文件，符合条件的供销合作社社属企业可以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以金融为杆杠，进一步强化为农服务功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总行由总社（大股东）、省社、市社、县社入股，财团入股，成立中国供销合作银

行，架构为总行—省级分行—县级支行（村，网点），强化系统内上下之间的经济纽带和利益联结机制，强化为农服务的金融功能。

（三）政策功能太弱，有待建成政府与农民联系的桥梁

我国涉农政策资金上万亿元，涉及多个部门，其中也包括供销合作社。但总体上看，供销社主要是在市场中坚持和发展，在政府惠农政策中发挥的作用较小，使得政府过多地直接通过行政机关联系农民，采取行政手段，工作方法单一，效果不够好。供销合作社应当成为“小政府、大市场”背景下党和政府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主体及其经营服务活动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主要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管理。适应这个客观要求，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各级供销合作社已经退出政府行政机构序列，成为介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承担着政府调控农村流通市场、扶持农民进入市场的特殊职能。供销合作社是政府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根据实际需要，供销合作社可以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行使政府授权的某些职能，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起到政府不可取代的作用。供销合作社替政府行使以下职能：

第一，供销合作社成为政府支农资金的拨付渠道。目前，供销合作社系统每年承担地方省市县级供销合作社“新网工程”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财政资金评审、拨付工作。2007年至2014年，累计发放支农资金91.16亿元，累计支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1230个。

第二，可替政府行使市场监督、管理、行业自律、组织、培训职能。例如济宁供销合作社在省社、市社督导下，开展资金互助业务，并监管资金互助业务。

第三，供销合作社牵头，替政府承担部分公益性较强的社会化服务，成立公益性经济实体，例如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便民超市、庄稼医院、农村综合服务社（中心）。

第四，供销合作社可以成为独立的中介组织，例如合作社信用评级机构、惠农资金的额度评审机构，土地流转交易登记机构，为政府、农民及相关机构提供信息服务。

第五，供销合作社可对特殊产品、服务进行专卖、专营以及国家赋予它的一些特殊权利。例如河北省供销合作社的“五大网络”中，其中有两项是承担盐业、烟花爆竹的专卖和市场管理职能。四川部分市县供销合作社还承担烟草专卖职能。

第六，在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下，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由供销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例如山东省供销合作社的大田托管业务由政府购买、委托，由供销合作社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一条龙式订单服务。

（四）组织“四不像”，有待明确供销合作社组织定性和定位

供销合作社特有的组织模式表现为“政府+事业+协会+企业”。运行几十年来，供销合作社组织体系几经改变，这四类主体并存的特点并没有改革，被称为“四不像”。经过长期磨合、实践，供销合作社的“四不像”机制确实在带动农村商品流通、服务“三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依法治国的大势下，供销社组织“四不像”的状况，在多方面与现行法规有矛盾。

解决组织“四不像”的问题，应当综合吸取四类组织的有效因素，把供销社合作社转换、完善、调整为实实在在的组织。

第一，为保证供销合作社继续成为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的有力抓手，支持供销合作社继续强化为农服务公益职能，各级联合社机关继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允许各级联合社探索建立与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动态调整薪酬水平，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薪酬的制定与调整需报本级社有资产监管委员会和上级联合社审定。形成自下而上、上下贯通的实体性合作经济组织。

第二，实现各级供销合作社和社团协会融合发展，借助社团协会这样的第三类法人组织类型强化供销合作社行业自律管理职能和带动、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职能。例如，在合作金融方面，在各级供销合作社成立合作金融行业自律监督管理办公室，履行对下级供销合作社从事合作金融业务的行业指导、监督、自律、规范，并定期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备案。例如在为了将供销合作社开展以专业合作社为平台的内部资金互助服务合法化，加强监督和管理，临沂市政府赋予了该市供销社对专业社开展资金互助的监管权，临沂市编办已正式批准下文，在临沂市社成立农村资金互助监督管理办公室，并给予编制，对全市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进行监督管理。另外，完善供销合作社接受政府委托的公共服务，或政府特许的为农服务职能，例如大型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村级公益性集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职能，特许供销合作社开展盐业、烟花爆竹等特殊商品销售和渠道管理。

第三，完善社有资产和社有企业管理职能，实行各级供销合作社和社有企业双线运行机制。将社有企业定位为社会企业，明确规定提取一定比例的社有企业收益用来发展为农服务公益事业。应明确各级供销合作社是本级社属资产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资产的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带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入供销合作社，密切同农民的利益联结，通过产权纽带和自下而上的利益联结机制，恢复和强化供销合作社的合作经济属性。抓紧建立由同级财政、审计等部门参加的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完善社有资产收益分配管理制度，合理确定资产收益用于扶持“三农”事业发展的比例。

四、推动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政策建议

党和国家对供销社已经明确供销社综合改革的目标。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坚持为农服务方向，着力推进基层社改造，创新联合社治理机制，拓展为农服务领域，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全国性为‘三农’提供综合服务的骨干力量”。2015 年中发 11 号文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农业、服务农民，迫切需要打造中国特色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长期以来，供销合作社扎根农村、贴近农民，组织体系比较完整，经营网络比较健全，服务功能比较完备，完全有条件成为党和政府抓得住、用得上的为农服务骨干力量，要充分用好这支力量”。要实现中央确定的供销社综合改革目标，需要采取一些关键的政策措施，为此建议：

（一）加强对供销合作社拓展服务的法律支持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抓紧制定出台《供销合作社条例》，规范供销合作社管理运行。制定合作金融法、供销合作社法，明确供销合作社的职能和定位，赋予其开展合作金融、履行行业自律监督管理的职能。

在法人类型上，供销合作社系统包含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团协会四类法人主体。2015 年中发 11 号文件也明确指出，“确立供销合作社的特定法律地位。在长期的为农服务实践中，供销合作社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组织和服务体系，组织成分多元，资产构成多样，地位性质特殊，既体现党和政府政策导向，又承担政府委托的公益性服务，既有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的特点，又履行管理社有企业的职责，既要办成以农民为基础的合作经济组织，又要开展市场化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党和政府以合作经济组织形式推动‘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是新形势下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更好发挥供销合作社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必须确立其特定法律地位，抓紧制定供销合作社条例，适时启动供销合作社法立法工作”。

单独立法的供销合作社在性质上应属于公法人社团。学者基于韩国的考察，认为其农协为公法社团，^①我国台湾的农会也是公法人，^②这可启发我们思考供销社的法律地位。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设立的专业合作社属于私法领域，调整农民个人及其组织的经济

^①杨团、孙炳耀：《公法社团：中国三农改革的“顶层设计”路径——基于韩国农协的考察》，《探索与争鸣》2012 年第 9 期。

^②郭殊：《论农会公法人及其制度的建构——行政法制化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3～85 页。

行为。供销合作社有所不同，它的目标不是营利，而是为农民提供综合服务，其中包含承担政府委托的事项，具有公共性质。立法应当明确供销合作社的公共责任，同时赋予其经营权力，界定它与政府公共权力及资源的关系。

供销合作社立法必须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衔接。2007年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它的组织范围和业务范围，没有授权开展合作金融服务，也未涉及联合社。但近年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开始突破法律限制。中央文件多次提出在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探索举办联合社。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很可能在功能和组织上会有大的突破，这就使它与供销合作社立法的关系更为复杂。有三种选择：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与供销社立法平行。二是供销合作社成为上位法，授予更多的权利；作为下位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不作过多的授权。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去掉“专业”二字，扩大授权，供销合作社按照下位法定位。

（二）改变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方式

协调政府惠农政策资金，加强供销合作社运作政策资金的作用。协调供销合作社与其它涉农部门的关系，利用基层社联系农民的优势，协助各部门资金更有效地落地。供销社与各涉农部门在划清界限、明确责任基础上，形成合力。

各级政府的有关专项资金，可直接用于奖补供销系统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设立农业发展专用基金，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政策性金融机构及政府产业发展基金，专项用于农业产业化、物流、配送建设。其次，供销合作社系统面向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农产品价格平抑基金，以平抑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资金来源部分自筹，部分来自财政。最后，将部分财政支农资金也可借助供销合作社系统在全国农村流通领域的支付结算网络给农民发放补贴，具体方式是，基层供销合作社引导其社员选举产生“补贴评审委员会”，“补贴评审委员会”利用供销合作社的数据库网络，对社员农户进行实地调查，再将应补贴额度上报相关部门，这样可以提高农业补贴的精准性。

（三）创新农业专业化服务，拓展农业专营服务领域

一是赋予供销合作社制造、生产、运营、管理各类农业机械的主体权利。随着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种植的趋势日益明显，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也日益加大，但目前农业机械从生产到供应的链条被不同的部门人为割裂，使得农机在中国整体的使用率不高、农机配置地区间极不平衡，重复购置、闲置浪费和一机难求的现象并存，而在农机流通和服务领域更是落后，农机租赁、金融租赁方式鲜有使用。作为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国家队、主力军，应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分工，整合资源，赋予供销合作

社农业机械的制造管理运营及监督管理的全链条权利。

二是赋予供销合作社系统开展合作金融的主体权利和行业自律规范指导职能。虽然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供销合作社开展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探索，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出台，各地对供销合作社开展合作金融态度不一，有的地方甚至禁止，极大影响了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开展。目前由农业部门、供销合作社推动及农民自发设立的资金互助社在全国已超过三万家，但由于数量多、规模大、范围广，加之管理归口不一，缺乏行业规范，导致该类组织无序发展，各地资金互助社风波事件频发，成为农村地区较为复杂且潜藏风险较大的领域。所以，有必要由供销合作社制定相应的国家标准，对农村资金互助社进行规范管理，强化其行业自律能力，从而降低主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及农村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导该类组织正规有序发展。

（四）强化供销合作社牵头的“惠农之家”服务平台建设

在工作机制上，供销合作社将积极协调与民政、教育、医疗、环保等部门的关系，在划清界限、明确责任的基础上，强化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向各级政府争取有关农村综合服务社建设的专项资金，直接用于奖补门店改造、科技支持、信息服务、技术培训、家政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并加大对农村医疗、养老等公共领域的扶持力度。同时，希望各级政府通过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引导鼓励各类社会主体依托农村综合服务社这一为农“综合服务平台”参与农村社区服务。

（五）支持供销合作社系统开展农村综合保险

协调相关部门，与保险公司开展合作，通过供销合作社领办、自办、协办的农民合作社内部，进行合作保险试点，并进行经验总结和推广。

将更多政府救助资金转换为保费补贴，特别是要降低区县政府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财政压力，逐步减少或免除粮食和重要畜牧产品生产大县的县级财政补贴要求，同时保费补贴不再“一刀切”，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创新供销合作社开展的农业保险产品。稳步开展主要粮食作物、生猪和蔬菜价格保险试点，加强价格指数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创新。扩展保险责任，逐步从成本保险向产量产值保险、收入保险延伸。提高保险服务信息化程度。

强化对农业保险的监管与扶持。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建立并完善农业保险监管体系，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来约束管理部门的职责；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信息数据库，加强对保险公司信息化的监管，确保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相关信息的公布。同时，加强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管理，保证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

（六）构建中国供销合作基金、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平台

各地供销合作社应结合自身情况分阶段参与发展金融服务。自身优势不明显的基层社可与金融机构合作，比如可通过采用转贷、委托贷款、批发贷款、融资租赁、票据融资、债券、信托等多种方式，打通普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的资金通道；一些财力较雄厚的供销合作社可参股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符合条件的供销合作社企业可以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具备一定操作经验和资本实力的供销合作社可开展农民资金互助、合作保险，可建立小额贷款公司、消费性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等。

在基层社积极推进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和各种形式的资金互助联合社基础上，通过局部试点、典型示范，进行“三位一体”模式试点和推广，逐步扩大供销合作社的合作金融服务网络。一些地方的资金互助社及联社在条件成熟时可发起设立中小银行。在条件成熟时，整合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资源，打通资金链，建立资金上的联系，同时借鉴供应链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模式，设立中国供销合作银行，强化供销合作社上下级组织体系的协同性。

参考文献：

1. 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版。
2. 杨德寿主编：《中国合作社经济思想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版。
3. 曹亮：《基于物联网的农业转型升级研究》，《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
4. 孔祥智：《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要性、模式选择和对策建议》，《教学与研究》2012 年第 1 期。
5. 郭殊：《论农会公法人及其制度的建构——行政法制化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6. 杨团、孙炳耀等：《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7. 杨团、孙炳耀：《公法社团：中国三农改革的“顶层设计”路径——基于韩国农协的考察》，《探索与争鸣》2012 年第 9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杜振华

· 智库信息 ·

全球化背景下新兴业务领域的法律环境建设

——“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论坛综述

韩良

摘要：跨境业务合作，财富管理与家族信托、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环境与资源保护，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重点发展的新兴业务领域。与以往的传统产业发展不同，在跨境业务合作领域，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到国外办厂绕开贸易壁垒，通过集体到投资目标国游说以获取对投资方有利的政策，通过投资目标国亟需的产业及模范遵守当地法律获得其高度认可。在新兴金融业务领域，应该借鉴发达国家以及离岸地区的一些立法经验，同时严守法律的底线进行适度监管。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尽管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与资源司法审判以及矿业资本市场建设面临很多问题，但前景光明。以上几方面的新兴业务，也为中国律师拓宽了新的业务领域并提出了更高的执业要求。

关键词：跨境 金融 环境资源 法律 风险

作者简介：韩良，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 年 7 月 12 日，京都律师事务所主办了“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大型主题公益论坛暨成立 20 周年庆典，600 余位法律界、学术界的专业人士参加了本届论坛。江平教授、陈光中教授、高铭暄教授等法学泰斗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主题发言。三个分论坛分别针对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三个新兴业务领域——跨境合作中的法律风险防控、金融法律

环境建设（包括财富管理与家族信托、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三个主题）、环境与资源的法律保护。参会嘉宾围绕以上中国目前经济与法律领域的热门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对完善相应法律环境、发挥律师作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和设想。

一、跨境合作中的法律风险防控

中国国际商会合作发展部部长韩梅青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现状及趋势》主题演讲中，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关于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进行投资的问题。由于原料价格、电力价格、生产技术、市场因素以及中外工人工资差距越来越少、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等原因，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工厂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进行投资建厂，如中国纺织企业到美国南部的棉产地建立纺纱厂。以往美国社会舆论最担心他们的工作机会、生产机会被中国人抢走，但我们去美国投资建厂，给当地带来了就业、税收，他们是非常满意的。对于去发达国家投资建厂，中国人不能像以往那样单枪匹马去干，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所有投资企业应联合起来，通过商会、律师去游说投资目标国的政府，制定出对投资企业有利的政策。第二，关于中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问题。有两点我们特别要注意：一是要真正了解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需求。发展中国家其实最关心工业化问题，中国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极具借鉴意义。因此，这些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需要中国什么样的投资，应该特别予以关注。二是克服语言障碍。在与拉美、非洲国家的投资合作过程中，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语言障碍，因为中国所有的外贸客户中 75% 不说英语，现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还有俄语人才紧缺。第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意义。在拉美还有非洲国家，很多生产机会、服务机会都是成百上千个中小企业跟着大型企业一起创造出来的，大型项目可以连带很多小型项目去做，中国中小企业可以跟随大型企业搭顺风车，共同发展。

中国世贸组织非洲委员会主席、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秘书长程志刚在《国际贸易与非洲机遇》主题演讲中，主要讲了以下观点。第一，非洲是充满活力、物产丰富、非常具有潜力的一片土地，去年中非贸易额已达 2218 亿美元。中非贸易额每年都以 10% 左右的速度递增，非洲工业化一直是我们工作推动的重点。第二，目前中国与非洲 30 多个国家签署了零关税框架协议，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此外，非洲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在法律框架之内，很多问题都可以进行双边谈判、研究。第三，如果想和非洲国家做好生意，首先要尊重非洲人、了解非洲人，与他们交朋友，深入进行交流，这样才能很好地走进非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教授在《“走出去”与加快法律咨询队伍

建设》主题演讲中认为：第一，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让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久、走得更好，是中国律师的责任、使命与担当。第二，中国即将进入“十三五”时期，在全球的分工地位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过去主要是加工贸易，将来则要进行整个产业链的全球布局，更多地输出中国服务，尤其是金融、技术、信息服务等要实现全球流动，中国将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建设法制规范、公开透明、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接轨，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十三五”开放型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三，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将会遇到大量的法律问题。一是与高标准自贸区对接过程中的法律问题；二是海外投资法律问题，比如“一带一路”战略中跟沿线国家合作问题；三是国际并购中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都为中国律师提供了更多的服务空间。

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燕博士在《中韩自贸协定与对韩投资》主题演讲中认为：第一，通过跟韩国签订自贸协定，中国可以实现亚太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会突破没有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不利地位，实现国际化战略。如，中国企业可以到韩国生产，将产品做成韩国原产地，避开对中国产品的一些贸易壁垒。应让“一带一路”、自贸协定成为中国“走出去”和发展互利的连接点。第二，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以后，当年双方就可以分别有 691 种和 1983 种产品实现零关税，中韩两国居民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对方的商品，在旅游、金融、运输、电子商务等领域，对中国企业意义非常重大。第三，中国企业投资韩国，一定要注意法律风险的防范，要做好事先法律制度及人文调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劳动法规，并充分利用投资保障机制，为投资成功打好基础。

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庆律师就《涉外法律风险防控及纠纷解决》作了主题演讲，并介绍了京都律师事务所成立 20 年来开展国际业务的业绩。京都律师事务所与多个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安哥拉、赞比亚等十余个非洲国家，韩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老挝等亚洲国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成立了非洲法律事务中心，并将要成立拉美法律事务中心。

二、金融法律环境建设

金融分论坛主持人，京都律师事务所金融业务总监、南开大学教授韩良在开幕词中强调，目前中国金融市场需要建立一整套公平的规则去规范投融资业务。中国的股票市

场，银行、保险，基金市场都在呼唤着法制。

（一）家族信托与财富管理

香港 Zitland Fiducary Group 的总经理吴咏宜女士在《离岸家族信托的架构》主题演讲中，重点介绍了《维尔京群岛特别信托法案》（VISTA）。该法案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免除受托人管理公司的责任，包括通过授权免除受托人监控公司业务的责任等，此外，委托人还有权力委任董事、参与管理，从而很好地保护委托人财产。她强调设立信托框架需要考虑委托人注册地、受益人的注册地、财产所在地、各地税法规定四大要素。

京都律师事务所家族信托法律事务中心高级顾问高慧云教授从以下三方面对家族信托的税收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不动产信托设立的税收。根据中国目前的税法，针对商住房的信托会被税务机关认为是财产转让，会涉及营业税 5%、个人所得税 20%、土地增值税 5%、契税 3%、印花税 0.05%，经过测算，将达到 13.1% 的税负。但如果是自住住宅装入信托，会免征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税负将会下降到 7.1%。第二，股权信托设立的税收。根据目前中国的税法，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不征营业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的股票也不征营业税，但会涉及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第三，离岸家族信托进行税收筹划要考虑三个要素：信托财产所在国、委托人国籍地，受益人国籍地，相关国家的税法规定和国家间的税收协定。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刚、CIL 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有辉、苏州信托北方区总经理吴启成、英国耿西岛瑞盟集团中国区负责人张静围绕“中国法环境下设立家族信托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宋刚教授主要介绍了中国法环境下信托登记的有效性法律规定，认为目前在中国，信托登记还不能有效实现，应该将不动产信托登记统一到不动产登记中，非上市公司股权，建议在工商部门登记；对于上市公司股权，建议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登记。关于登记对抗还是生效的问题，如果将设立信托视为所有权的转移，则不登记就不生效；如果将信托登记视为所有权变更的过程，则登记行为只能产生所有权变更的对抗效果，这种登记主要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不登记信托也是生效的。刘有辉先生主要从受托人和离岸信托设立的角度谈了信托设立的有效性问题。对于通过离岸信托架构控制中国境内资产，主要步骤是通过信托在离岸地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公司，然后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一个外商投资企业，以控制在中国的股权、动产和商业不动产，但在控制商业地产过程中会遇到外商投资的领域障碍。为了保证信托有效，可以通过受托人保险制度来保障受益人利益。吴启成先生主要从客户和信托公司的视角来谈信托问题。他认为，现在信托公司也开始转型开展家族信托业务，但由于

税收障碍和信托公司管理能力的限制，家族信托业务还处于摸索阶段。苏州信托管理的财富客户大概有两万名，主要探索了以下家族信托产品：一是股权信托，可以信托公司的名义投资而形成信托股权；二是资金 + 股权，资金家族信托的门槛是 3000 万。张静女士主要从离岸的角度，对设立信托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和中国的信托需要登记不同，在耿西岛设立信托不需要登记，体现了信托的私密性功能。耿西岛的信托理念与维尔京群岛也有一些区别，维尔京群岛给委托人非常多的掌控权，但从耿西岛来看，如果给予委托人非常多的控制权，可能导致信托无效问题。

（二）私募基金的法律环境与法律风险防范

京都律师事务所金融部与南开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历时一年多，合作编制了《私募基金法律支持环境白皮书》，并在本届论坛进行了发布。作为主要执笔人，南开大学民商法博士生、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丛彦国主要从私募基金的设立和筹集、投资与管理、退出、并购基金以及私募基金的税收等五个方面，对私募基金法律支持环境进行了具体介绍。该白皮书具有如下特色：一是紧密结合私募基金划归证监会监管后这一监管机制的变化情况，对证监会及基金业协会发布的一系列监管文件和行业自律文件进行了深刻解读与分析；二是紧密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发展状况，对私募基金通过三板市场以及地方性股权转让市场退出、通过并购方式退出的法律环境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三是对并购基金业务中涉及到的国有企业并购、并购项目中的劳动问题及知识产权问题等法律支持环境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四是采用图表、案例等方式，分别介绍了公司制、合伙制、契约制私募基金的税收法律环境。

刑法学博士后、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邹佳铭在《私募基金募集中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范》主题发言中，主要从四个方面界定了私募基金的刑事法律风险问题。第一，募集的主体。募集的主体在设立过程中是否满足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件，是判断募集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很重要的要件。第二，募集的对象。私募基金的募集对象必须满足一定条件，并且在募集对象的判断以及资本的判断上需采取穿透审查原则。募集对象是否特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三，募集的方式。募集方式重点在于对公开募集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结合受众的特点、募集对象是否特定来判断。此外，募集方式禁止承诺收益，这种收益不仅是货币的收益，还包括实物和股权等方式。第四，募集项目。一是项目是否真实存在，二是要求基金专款专用。

（三）互联网金融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在《互联网金融呼唤法律变革》主题演讲中，主要讨论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互联网金融最基础的一个交易结构是 P2P（Peer to Peer，又称点对点技术），因为技术的发展，使用户越来越普及，形成了技术的普惠化，在改变了底层交易结构之后，参与者越来越多，就实现了金融的普惠，由此产生了移动金融、普惠金融，使金融的发展更加高效，更加智慧，也会更加法制，因此互联网金融不是法外之地。第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三种核心技术，即互联网技术、风控技术、法律技术。要做互联网金融，首先要坚守以往的法律，坚守法律底线和政策底线。第三，互联网的法律关系有三种，即消费关系、合作关系和竞争关系。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与冲突性，使得现有法律对互联网金融的调整具有局限性。如何突破这种局限性？一是各种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要把握权利和义务的界限，这是核心问题，但是现在对这方面的梳理还不够清晰；二是划定风险管理的红线；三是经营者不触非法集资的底线。第四，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法制化而言，一是要将现有法律资源用好、用足、用活，现在不是没有法律，不是法律底线被突破了；二是通过具体的案例发现规则；三是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应用于司法审判之中。应软法先行、硬法托底、刚柔相济、混合为治。第五，互联网金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典型范例，同时要从技术创新逐渐变成产品创新、组织创新，进而最后实现制度创新，这就是法律人的使命和应做的贡献。

聚秀资本合伙人陈宇在《对目前 P2P 和众筹的一些看法》主题演讲中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中国相对比较保守的监管和相对比较过时的金融条款制约，为 P2P 发展提供了机会。中国银行贷款成本维持 6%~7%，不超过 8%；民间高利贷的成本在 36%，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在民间借贷和银行借贷之间存在将近 20 个百分点的利差，这就给了 P2P 以及其他互联网金融机会。第二，金融监管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需要过去那种相对比较狭隘的牌照监管，需要创新的监管，让投资借贷处于同一水平。

北京京北投资管理公司总裁罗明雄，在《股权众筹四大难点及京北众筹应对之道》主题演讲中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股权众筹有四大难点，即优质项目少、估值定价难、建立信用的时间长、投入周期长。解决了这四大难点，就有机会；如果解决不了，股权众筹就非常难做。第二，对于股权众筹，应尽快启动适度监管。不一定要有新的法律法规，完全可以按照现有法律法规，或者行业自律，或者第三方引导。现在的确存在害群之马，自称为 P2P，对行业发展不利，应尽快启动适度监管。第三，如果不是特别大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影响到政策。需要关心的是，在不触犯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去奔跑，一旦国家对 P2P 等新兴互联网金融开放资本市场，做好准备门一开就进去了。

三、环境与资源的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武建华博士在《环境资源审判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主题演讲中，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第一，最高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厅成立以后的主要工作。一是大力加强调研，深化业务指导。环境审判厅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二是加强专门化建设，积极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机制。三是大力推进审理程序专门化建设。四是加快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统一法律。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相关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环境资源审判面临的诸多挑战。一是它的起点高、标准高，要求也高；二是科学合理的工作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三是环境资源审判中需要破解的难点很多；四是环境资源审判中需要把握的关系非常复杂。第三，环境资源审判大有可为。一是要树立新的环境司法理念，勇于创新；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争取形成合力；三是要善于总结、借鉴先进经验。2015 年 5 月 19 日，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对创新环境司法理论，密切法院和环保部门、法学理论界、科技实务界的合作，提升环境司法软实力有重要意义。

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副主任马勇作了题为《谈谈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的主题演讲。第一，中国目前缺失损害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法律定义。第二，到 2015 年 6 月底，全国仅有九家环保组织提出了 18 起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数量少的最核心原因，在于环保组织开展公益诉讼的支持和保障机制不足。第三，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问题很多。环保部 2014 年底推出 12 家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由于他们以前没有做过相关评估工作，实际推行起来非常困难，尤其在量化环境损害这方面有不同的声音。第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款的归属、使用和监管不明。第五，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非常难。如果说行政公益诉讼缺失，仅靠民事公益诉讼去亡羊补牢，难度非常大。

天津矿业权交易所总裁助理张建在《中国矿业金融市场路径初探》主题演讲中认为：第一，由于缺乏矿业金融的支持，中国矿业还没有从低谷中走出来，但同时也面临一个契机，低谷过程中进行大量金融创新才会为行业注入活力。第二，中国矿业金融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流动性比较差，流动性差在政策、法制方面都阻碍了创新的步伐。第三，矿业金融市场包括建立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与矿业银行。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包括矿业风险勘察资本市场与矿业资本市场。风险勘察资本市场主要为取得探矿权的矿企提供融资服务，类似资本市场的风险板块；矿业资本市场与矿业银行主要为具有采矿权、能够产生现金流的矿企提供融资服务。第四，建立一个多层次矿业金融市场，包括三个阶段，

即最初的信息发布平台、大量场外市场包括新三板市场、资本市场，不同阶段的企业由不同的市场进行服务。

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树伟在《矿业权转让过程中纠纷的种类及防范》主题演讲中认为：关于矿业权转让的纠纷，一般分为两种情形。第一，合同效力引起的纠纷。通过受让矿业公司股权的方式来持有矿业公司的矿业权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进行矿业股权转让的时候，对应的财产包括矿业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二是有些省市自治区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为矿业公司的股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更构成矿业权的变更，要求做矿业权的行政核准。第二，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引起的纠纷。防范的主要措施是注意矿业权转让合同的行政审批和加强收购矿业权的尽职调查。

在论坛期间，京都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最新编著的 20 本法律著作。作为一家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京都始终奉行推进法制，回报社会的宗旨，多次以律师及学者身份参与刑法、刑诉法、律师法、民商法等多项立法的研讨活动，积极开展多种普法活动，履行社会责任。“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论坛的举办，在业界反应强烈、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李蕊

(上接第 87 页)

15. 刘慧等：《“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地理科学进展》2015 年第 5 期。
16. 李芹：《援外工程总承包项目（EPC）管理经验》，《工程建设与设计》2015 年第 7 期。
17. 商务部：《企业可从八大领域寻求商机》，中国经济网，2014 年 12 月 13 日。
18. 杨晓静、陆立军：《“一带一路”建设将进入全面落实阶段》，中央政府门户网，2015 年 3 月 6 日。
19. 私募通：《2014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2015 年 1 月。
20. 楚天都市报：《一带一路最终圈定 18 个省份重点建设 15 个港口》，地产中国网，2015 年 3 月 30 日。
21. 中国证监会：《关于实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制度的公告》，基金业协会官网，2015 年 3 月 19 日。

责任编辑：李蕊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5 年 9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可能衰退

花旗集团 2015 年 9 月 8 日发布报告称，未来两年全球经济有 55% 可能会陷入某种形式的衰退，最有可能进入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较适中的衰退周期。曾担任英国央行理事的首席经济学家比特指出，跟以往 20 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全球经济衰退的诱因不是美国经济下滑，而是新兴市场需求下降导致全球经济滑坡。

花旗预计，中国对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进口需求减少，加之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其他已面临经济困境的新兴市场也会增长乏力。为应对衰退威胁，全球主要央行还会推出若干轮量化宽松（QE）政策，将英国、欧元区和日本的 QE 算在内，QE 的整体规模会更大。欧洲央行可能不得不将 QE 延长到明年 9 月以后。明后两年 QE 还不足以帮助发达经济体抵御经济下滑，可能比目前的预测情形更糟。

（二）全球经济普遍疲弱

世界银行 2015 年 9 月 15 日发布报告称，2015 年可能是新兴市场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表现最疲弱的一年，发展中国家应做好准备应对美联储加息可能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新一轮震荡。尽管美联储已将即将加息的信息传递给金融市场和公众，并制订了紧缩步骤，但加息仍可能引发市场波动，使新兴市场面临大量资本流出风险。目前，全球经济普遍疲弱、跨国贸易增长放缓、大宗商品价格维持低位，一些新兴和前沿经济体比 2013 年美联储开始退出 QE 时更加脆弱。如果投资者期望美联储采取更加激进的加

息政策，将推高发达国家的长期债券收益率。若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上升1%，将可能使新兴和前沿经济体的资本流入一年内减少45%，相当于这些经济体总产出的2.2%。发展中国家应增强经济的韧性，采取措施促进增长。高通胀国家应实施有信誉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监管机构应对有大规模外债的银行加强监管。此外，汇率机制应保持弹性，但应和货币政策或者有目标的干预措施配合使用来帮助市场有序运行。

（三）全球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加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2015年9月22日表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剧，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滑、货币政策调整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疲弱的前景将令达成全球发展目标较以往更加困难。中国增长放慢是可预见的，也在意料之中，但仍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对本地区的溢出效应可能大于原先预期。IMF官员在一份讨论报告中表示，为支撑可持续发展，各国应采取建立稳健的公共财政、投资教育、削减能源补贴并深化金融市场改革等举措。结构性改革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包括出台政策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并增加教育投入，特别是女童教育。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增加税收和削减不必要支出来创造条件，增加在发展与社会目标方面的支出。削减能源补贴和恰当地制定能源价格，将对环境保护有益，同时创造更宽松的财政条件。提高能源价格可以让各国的财政收入平均增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

（四）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只能小幅加速

IMF总裁拉加德2015年9月30日表示，美国加息和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双重变数将为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和更大的市场波动，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只能小幅加速，全球经济增长令人失望且不均衡。一年前她所警告过的“新平庸”，即长期低增长的风险正在变得越来越大。9月24日，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只要经济保持在正轨上，2008年底开始一直接近于零的美国利率就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开始提升。此前，拉加德一直呼吁美联储推迟加息至明年。尽管现在新兴市场对美国加息的准备比以前充分得多，但是借贷成本的提升和强势美元可能让货币错配彻底暴露，导致企业违约，在企业、银行和主权债务之间造成恶性循环。整体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应继续保持宽松政策，在做出自己的决策时考虑到可能波及世界层面的风险。新兴经济体需要强化自己在大企业的外汇敞口，而那些尚有公共支出提升空间的国家应该增加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来推动增长。

拉加德还指出，全球经济的成长潜力受到低生产率、人口老龄化以及金融危机余波三大因素遏制。尽管印度依然会是亮点，但是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经济则面临着严峻挑战，拉丁美洲的增长将继续大幅度减速。此外，中国的改革将带来更缓慢、更安全，也更持

久的增长。中国的决策者正面对一种微妙平衡的挑战：一方面需要贯彻那些最难的改革，一方面又必须确保需求和金融稳定。

（五）全球扩张仍难实现，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IMF2015 年 10 月 6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走出战后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衰退六年后，回归强劲、同步的全球扩张仍难实现，甚至面临较几个月前更为明显的下行风险。报告称，当前所有国家都面临挑战。尽管各国前景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新的预测几乎将所有国家短期内的增长率都做了下调。去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长率为 3.4%，而经修正后的今年全球增长率仅有 3.1%。不过，IMF 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可望回升到 3.6%。总体上看，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增长看起来要好于前一段时间，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则会减弱。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因而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仍然最大。

在发达经济体中，由于近期危机的遗留影响已经减退，加上持续的货币政策支持和财政中性的恢复，产出增长普遍加速，失业普遍下降。美国和英国的复苏进展最快，货币政策看起来会很快收紧，而欧元区和日本的复苏却很不确定。发达国家经济体之外的其他国家则有不同因素导致增长放缓，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过去信贷快速增长的影响以及政治动荡等。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2015 年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五年下滑。报告总结出若干可能导致全球复苏停滞的重要因素，包括过低的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意料外的中国增长骤降、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元持续升值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恶化等。IMF 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菲尔德认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总体而言，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善商业环境，精心构建的财政架构对于新兴经济体很有帮助。此外，灵活的汇率也非常重要。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需要解决仍然存在的危机遗留问题，再辅以相应的财政政策，存在负产出缺口的国家应该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有必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

（六）全球金融稳定面临新风险

IMF2015 年 10 月 7 日警告称，如果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对市场稳定风险应对不当，世界可能陷入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衰退。IMF 负责金融稳定的主管乔斯·维纳尔斯表示，风险溢价再度上升、新兴市场的公司违约现象增多，同时全球对风险较高资产的投资意愿下降，可能使世界经济增速减弱到可被称为全球衰退的地步。

报告警告称，冲击或许会源自发达或新兴市场，再加上未被应对的系统脆弱性，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资产市场紊乱，以及多个资产类别的市场流动性突然干涸。在这些情况

下，新兴与发达经济体的支出增速将大幅放慢，导致 2017 年的世界产出较 IMF 的基准预测低 2.4%。由于预测水平本已很低，这意味着，全球年度增速很可能将低于 2%（这是全球衰退的标准定义），但不至于引发跟 2008 年规模相仿的又一场危机。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未来五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 6%~7%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未来劳动力、土地带来的要素红利都会下降，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为 6%~7%，看起来比较悲观，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从不足美国的 10% 上升到 60%，可能就不显得那么悲观。一个十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年增长 7% 就是 7000 亿美元。从增量而言，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量仍然是上升的，经济增速的下滑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量的下滑。另外，中国经济这一次减缓有很强的人为因素，是主动调整的结果，而不是被动的。放眼未来几年，这种结构性调整还会持续，去产能过剩和去杠杆也会继续。因此，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会很大，而且会持续较长时间。

除外部环境、要素市场及政府意志的改变，经济增长的压力还相当程度上来源于金融风险的上升。2009 年的四万亿刺激之后，中国金融行业的信贷发展太快，社会融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两倍，不管是按 IMF 还是国际清算银行的标准，都已经进入金融风险的警戒范围。从实际数据分析，中国这几年计划中的去杠杆并没有实现，只是加杠杆放缓而已。从债务指标来看也不乐观，2014 年底，中国整体债务占 GDP 比重已经达到 2.2 倍，虽不像美国、日本已达三倍以上，但新兴经济体普遍都在 1.5 倍以下，中国的债务风险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已经不匹配。好在中国近年已对影子银行的风险进行了控制，同时也开始积极处理地方债，只剩下企业债的风险较高。

在低经济增长、高金融风险的新阶段，政府和企业该如何应对？朱海斌认为，财政改革除了减税，还应进行中央与地方支出比重的调整；货币政策在低息的同时，可尝试中性信贷政策，货币政策目标也别再紧盯通胀数字，而是设定通胀目标区间；政府不再对落后企业隐性担保，应建立健全破产程序；进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推进国企改革，开放更多市场竞争；大力发展多形式多渠道融资；加强监管，防止监管真空和监管缺失。

（二）亚行下调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 6.8%

亚洲开发银行 2015 年 9 月 22 日对 2015 年 3 月发布的《2015 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进行了修订，称因 1 月—8 月经济活动不及预期，投资和出口疲软，故将今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从 7.2% 下调至 6.8%，低于中国官方年初设定的 7% 年度增长目标。今年二季度

和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均成功守住 7% 关口。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5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尽管当前部分经济数据有波动，但中国经济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能力实现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

（三）IMF 维持中国今年经济增长 6.8% 不变

IMF 2015 年 10 月 6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与 7 月的预测相比，维持中国 2015 年和 2016 年经济增长 6.8% 和 6.3% 的预测不变。报告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因素的影响力。中国目前是世界最重要的金属进口国，在直到 2011 年本世纪初的这段时间维持了极快增长。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出口国大量投资提高产能，刺激国内增长。然而，中国力求转变过去的出口和投资带动型经济模式，努力提高消费（包括服务业）的作用。因此，中国领导层最近已降低增长率目标。很多大宗商品（包括金属）的实际价格已从 2011 年的峰值下跌，在今年 8 月中旬开始的金融波动那几个星期，下跌幅度尤其大。预计中国工业生产放缓将进一步使得金属价格承压，未来商品市场将进一步下行。

（四）世界银行预计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 7% 左右

世界银行 2015 年 10 月 5 日发布《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预计，2015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7% 左右，之后逐渐放缓，继续向以国内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型，这意味着增长率逐渐降低。近两个月来，中国投资、工业企业利润等多项重要经济指标不理想，一度引发外界对中国经济今年能否完成 7% 目标的担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在 2016 年—2017 年可能逐步放缓，因为中国拥有足够的政策缓冲和工具来应对更显著的减速风险，包括相对较低的公共债务水平以及金融体系中的政府主导地位。

（五）警惕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

IMF 2015 年 10 月 7 日警告称，在上次金融危机过去七年后，全球金融稳定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新兴市场下行风险占上风。乔斯·维纳尔斯表示，8 月人民币的下跌并非中国有意为之，只是当时的市场环境过于复杂，让国际社会出现了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误解”。IMF 肯定了中国在人民币汇改中做出的努力，人民币设立中间价新机制是正确的举措，允许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但同时应该有更好的沟通机制。在谈及中国的金融隐患时，乔斯·维纳尔斯表示，企业债高企以及影子银行持续增长，都威胁金融稳定，但目前并没有看到中国出现整体信贷危机的确切迹象，做好应对准备很重要。

责任编辑：李蕊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预测值	2016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10月)				
世界	3.4	3.4	3.1	3.5
发达国家	1.4	1.8	2.0	2.2
美国	2.2	2.4	2.6	2.8
欧元区	-0.5	0.9	1.5	1.6
日本	1.6	-0.1	0.6	1.0
发展中国家	5.0	4.6	4.0	4.5
印度	6.9	7.3	7.3	7.5
俄罗斯	1.3	0.6	-3.8	-0.6
巴西	2.7	0.1	-3.0	-1.0

世界银行(2015年6月)

世界	2.5	2.6	2.8	3.3
发达国家	1.4	1.8	2.0	2.4
发展中国家	5.1	4.6	4.4	5.2

英国共识公司(2015年10月)

世界	2.4	2.8	2.5	2.9
美国	2.2	2.4	2.5	2.6
欧元区	-0.5	0.9	1.5	1.7
日本	1.6	-0.1	0.6	1.3
印度	6.9	7.3	7.5	7.8

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3年、2014年度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2015年及2016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3. 各经济体2013年、2014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预测值	2016年 预测值
世界	3.5	3.3	3.2	4.1
进口				
发达国家	2.1	3.4	4.0	4.2
发展中国家	5.2	3.6	1.3	4.4
出口				
发达国家	3.1	3.4	3.1	3.4
发展中国家	4.6	2.9	3.9	4.8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10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预测值	2016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10月)				
发达国家	1.4	1.4	0.3	1.2
发展中国家	5.9	5.1	5.6	5.1
英国共识公司(2015年10月)				
世界	2.8	3.1	3.2	3.6
美国	1.5	1.6	0.2	1.8
欧元区	1.4	0.4	0.1	1.1
日本	0.4	2.7	0.8	0.8
印度	9.5	6.0	5.0	5.4

注:1. 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 各经济体2013年、2014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4 年		3.6	1.7	7.8
	9 月	3.7	3.0	5.2
	10 月	3.7	3.1	5.0
	11 月	3.5	2.9	4.8
	12 月	3.5	2.8	5.0
2015 年				
	1 月	3.1	2.4	4.7
	2 月	3.3	2.4	5.1
	3 月	3.3	2.4	5.2
	4 月	3.1	2.0	5.4
	5 月	3.1	2.0	5.4
	6 月	3.1	1.9	5.5
	7 月	2.9	1.8	5.2
	8 月	2.8	1.6	5.2
	9 月	2.6	1.3	5.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4 年		3.2	2.7	5.2			
	9 月	3.2	1.5	6.0	52.2	53.2	52.9
	10 月	3.2	1.6	5.0	52.2	53.0	52.8
	11 月	3.2	1.4	5.1	51.8	52.3	52.3
	12 月	3.2	1.8	5.3	51.5	52.0	52.0
2015 年							
	1 月	2.5	1.7	4.1	51.7	52.9	52.2
	2 月	2.5	1.4	4.1	51.9	53.2	52.2
	3 月	2.5	1.4	3.9	51.7	53.3	52.1
	4 月	2.5	1.1	3.9	51.0	51.7	51.0
	5 月	2.5	0.8	3.8	51.3	51.9	51.4
	6 月	3.2	1.3	4.5	51.0	51.4	51.3
	7 月	2.5	1.1	4.0	51.1	51.7	51.3
	8 月	1.9	1.3	3.9	50.7	51.0	51.4
	9 月				50.6	50.9	51.3

注: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3 年		1.5	1.7	-2.9
	1 季度	1.9	2.5	-4.5
	2 季度	1.1	1.4	-2.0
	3 季度	3.0	1.7	-2.2
	4 季度	3.8	3.5	-2.7
2014 年		2.4	2.7	-0.6
	1 季度	-0.9	1.3	0.0
	2 季度	4.6	3.8	1.2
	3 季度	4.3	3.5	1.8
	4 季度	2.1	4.3	-1.4
2015 年				
	1 季度	0.6	1.8	-0.1
	2 季度	3.9	3.6	2.6
	3 季度	1.5	3.2	1.7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3 年		4.2	2.8	1.1
	1 季度	4.9	1.0	0.8
	2 季度	2.6	4.9	5.5
	3 季度	3.8	4.2	2.4
	4 季度	5.1	10.9	1.0
2014 年		5.3	3.4	3.8
	1 季度	6.0	-6.7	2.8
	2 季度	5.6	9.8	9.6
	3 季度	7.9	1.8	-0.8
	4 季度	2.5	5.4	10.3
2015 年				
	1 季度	3.3	-6.0	7.1
	2 季度	5.2	5.1	3.0
	3 季度	2.9	1.9	1.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3 年		1.5	1.7	-2.9
	1 季度	1.1	1.3	-2.9
	2 季度	0.9	1.5	-2.9
	3 季度	1.5	1.7	-3.2
	4 季度	2.5	2.3	-2.9
2014 年		2.4	2.7	-0.6
	1 季度	1.7	2.0	-1.8
	2 季度	2.6	2.6	-1.0
	3 季度	2.9	3.0	0.0
	4 季度	2.5	3.2	0.4
2015 年				
	1 季度	2.9	3.3	0.4
	2 季度	2.7	3.3	0.7
	3 季度	2.0	3.2	0.7

表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3年		4.2	2.8	1.1
	1季度	4.7	1.8	-0.1
	2季度	3.6	1.8	0.7
	3季度	4.5	2.4	1.2
	4季度	4.1	5.2	2.4
2014年		5.3	3.4	3.8
	1季度	4.4	3.1	2.9
	2季度	5.1	4.3	3.9
	3季度	6.1	3.7	3.1
	4季度	5.5	2.4	5.4
2015年				
	1季度	4.8	2.6	6.5
	2季度	4.4	1.5	4.8
	3季度	3.4	1.5	5.5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8、表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8、表9)。

表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4年			0.7	6.2	264.9
	8月			6.1	21.3
	9月	3.1	1.4	5.9	25.0
	10月			5.7	22.1
	11月			5.8	42.3
	12月	-2.2	0.0	5.6	32.9
2015年					
	1月			5.7	20.1
	2月			5.5	26.6
	3月	-1.1	0.6	5.5	11.9
	4月			5.4	18.7
	5月			5.5	26.0
	6月	3.3	0.7	5.3	24.5
	7月			5.3	22.3
	8月			5.1	13.6
	9月			5.1	14.2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4年	23432.1		2.8	28515.3		3.4
	8月	1973.0	0.2	3.8	2385.8	0.1	3.7	-412.8
	9月	1950.5	-1.1	2.6	2382.4	-0.1	2.5	-431.9
	10月	1977.6	1.4	2.2	2405.1	1.0	3.0	-427.5
	11月	1962.0	-0.8	0.6	2362.2	-1.8	2.3	-400.2
	12月	1949.8	-0.6	1.0	2405.2	1.8	4.4	-455.5
2015年								
	1月	1890.3	-3.1	-2.0	2326.1	-3.3	0.1	-435.9
	2月	1858.9	-1.7	-1.9	2244.3	-3.5	-3.4	-385.4
	3月	1867.7	0.5	-4.1	2389.3	6.5	0.4	-521.6
	4月	1891.4	1.3	-3.0	2314.0	-3.2	-3.3	-422.6
	5月	1878.6	-0.7	-4.8	2304.0	-0.4	-3.7	-425.4
	6月	1876.9	-0.1	-4.0	2329.0	1.1	-2.1	-452.1
	7月	1888.1	0.6	-4.1	2306.2	-1.0	-3.2	-418.1
	8月	1850.9	-2.0	-6.2	2334.2	1.2	-2.2	-483.3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3年		2115.0	3079.3	-964.3
	2季度	612.1	1028.7	-416.6
	3季度	531.4	893.5	-362.1
	4季度	592.1	355.9	236.2
2014年		1066.1	3165.5	-2099.4
	1季度	-1034.7	577.7	-1612.3
	2季度	653.2	771.3	-118.2
	3季度	955.9	969.7	-13.7
	4季度	491.7	846.8	-355.1
2015年				
	1季度	1983.2	774.9	1208.3
	2季度	655.3	893.1	-237.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3 年		-0.5	-0.7	0.2
	3 季度	0.1	0.2	0.3
	4 季度	0.3	0.1	-0.3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0.3	0.2	0.2
	2 季度	0.1	0.2	0.2
	3 季度	0.3	0.5	0.2
	4 季度	0.4	0.6	0.2
2015 年		0.5	0.5	0.6
	2 季度	0.4	0.4	0.3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3 年		-3.0	1.3	0.1
	3 季度	0.5	0.1	1.1
	4 季度	1.0	1.4	0.7
2014 年		0.9	3.7	3.8
	1 季度	0.4	0.4	0.6
	2 季度	-0.5	1.3	1.3
	3 季度	0.3	1.5	1.7
	4 季度	0.6	0.9	0.9
2015 年		1.4	1.0	1.5
	2 季度	-0.5	1.6	1.0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4 年		0.02			11.6
	8 月				11.5
	9 月	0.0	0.02	33.0	11.5
	10 月				11.5
	11 月				11.5
	12 月	0.28	0.12	16.9	11.4
2015 年					11.2
	1 月				11.3
	2 月				11.2
	3 月	0.33	0.53	28.8	11.1
	4 月				11.1
	5 月				11.1
	6 月	0.0	0.72	49.3	11.1
	7 月				11.0
	8 月				11.0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3 年		-0.5	-0.7	0.2
	3 季度	-0.3	-0.4	0.6
	4 季度	0.5	0.2	0.2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1.1	0.6	0.6
	2 季度	0.8	0.8	0.6
	3 季度	0.8	1.0	0.8
	4 季度	0.9	1.4	1.0
2015 年		1.2	1.7	1.2
	2 季度	1.5	1.9	1.3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3 年		-3.0	1.3	0.1
	3 季度	-2.4	1.0	0.9
	4 季度	0.0	3.0	2.6
2014 年		0.9	3.7	3.8
	1 季度	2.3	3.6	3.7
	2 季度	0.9	3.1	3.7
	3 季度	0.7	4.3	4.0
	4 季度	0.8	4.3	4.8
2015 年		1.8	4.8	5.5
	2 季度	1.9	5.2	5.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
								减进口额
2014 年		19391		2.3	17415		0.1	1976
	8 月	1593	-1.1	-3.2	1449	-1.9	-3.5	144
	9 月	1658	3.8	8.6	1478	1.9	4.2	180
	10 月	1660	0.1	4.3	1466	-0.7	0.3	194
	11 月	1668	0.6	1.3	1461	-0.3	-1.6	207
	12 月	1656	-0.9	8.5	1434	-2.0	1.8	223
2015 年		1638	-1.1	-0.6	1432	-0.1	-5.5	206
	1 月	1686	2.9	4.3	1476	3.1	1.2	210
	2 月	1716	1.8	11.1	1542	4.4	9.5	174
	3 月	1735	1.1	8.8	1518	-1.5	4.9	216
	4 月	1707	-1.6	2.7	1497	-1.4	0.0	210
	5 月	1731	1.4	12.5	1514	1.2	6.6	216
	6 月	1717	-0.8	6.6	1493	-1.4	0.6	224
	7 月	1695	-1.3	5.5	1497	0.2	3.0	198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60	642.7	-581.4
	8 月	150	60.0	90.0
	9 月	111	410.0	-299.0
	10 月	116	107.0	10.0
	11 月	-115	170.0	-285.0
	12 月	-205	-372.0	167.0
2015 年				
	1 月	77	136.0	-59.0
	2 月	331	348.0	-17.0
	3 月	234	-214.0	448.0
	4 月	287	163.0	124.0
	5 月	132	311.0	-179.0
	6 月	161	172.0	-11.0
	7 月	-72	230.0	-302.0
	8 月	-32	-3.0	-29.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4 年		-0.1	-1.3	0.2
	1 季度	1.1	2.1	-0.2
	2 季度	-2.0	-5.0	0.1
	3 季度	-0.3	0.3	0.3
	4 季度	0.3	0.3	0.3
2015 年				
	1 季度	1.1	0.4	0.3
	2 季度	-0.3	-0.7	0.5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2.6	8.4	7.4
	1 季度	3.2	5.7	5.9
	2 季度	-4.2	0.6	-3.9
	3 季度	-0.7	1.8	0.9
	4 季度	0.1	2.8	0.8
2015 年				
	1 季度	1.6	1.6	1.8
	2 季度	0.2	-4.4	-2.6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4 年		-0.1	-1.3	0.2
	1 季度	2.4	3.4	0.2
	2 季度	-0.4	-2.9	0.0
	3 季度	-1.4	-3.0	0.2
	4 季度	-1.0	-2.4	0.5
2015 年				
	1 季度	-0.8	-4.0	1.0
	2 季度	0.8	0.3	1.4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2.6	8.4	7.4
	1 季度	9.9	9.1	14.8
	2 季度	2.1	5.7	6.0
	3 季度	-0.6	7.7	5.2
	4 季度	-1.7	11.3	3.8
2015 年				
	1 季度	-3.0	7.2	-0.2
	2 季度	0.8	1.5	0.7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4 年		1.8	1.66	3.6
	8 月	-1.3	1.65	3.5
	9 月	1.4	1.68	3.6
	10 月	-1.6	1.69	3.5
	11 月	-1.6	1.69	3.5
	12 月	1.2	1.77	3.4
2015 年				
	1 月	-2.7	1.77	3.6
	2 月	-2.2	1.63	3.5
	3 月	-3.2	1.72	3.4
	4 月	-2.5	1.77	3.3
	5 月	-2.1	1.78	3.3
	6 月	1.6	1.78	3.4
	7 月	-1.1	1.83	3.3
	8 月		1.85	3.4
	9 月		1.86	3.4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4 年	731052		4.8	858865		5.7	-127813
9 月	62713	3.4	6.9	73391	5.6	6.2	-10678
10 月	63952	2.0	9.6	71980	-1.9	3.1	-8028
11 月	64547	0.9	4.9	72369	0.5	-1.7	-7821
12 月	65538	1.5	12.9	71608	-1.1	1.9	-6070
2015 年							
1 月	67200	2.5	17.0	70352	-1.8	-9.0	-3152
2 月	62347	-7.2	2.4	68257	-3.0	-3.6	-5910
3 月	64624	3.7	8.5	64715	-5.2	-14.5	-91
4 月	63366	-1.9	8.0	65713	1.5	-4.2	-2347
5 月	61358	-3.2	2.4	63297	-3.7	-8.7	-1939
6 月	63830	4.0	9.5	66747	5.5	-2.9	-2917
7 月	63574	-0.4	7.6	67361	0.9	-3.2	-3787
8 月	63227	-0.5	3.1	66962	-0.6	-3.1	-3735
9 月	62123	-1.7	0.6	65679	-1.9	-11.1	-3557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9548	127682	-118134
	8 月	122	6334	-6212
	9 月	2939	6944	-4005
	10 月	-1351	16368	-17719
	11 月	397	15074	-14677
	12 月	2932	13443	-10511
2015 年				
	1 月	-650	12385	-13035
	2 月	1163	13941	-12778
	3 月	2968	10774	-7806
	4 月	-748	9968	-10716
	5 月	1067	23576	-22509
	6 月	-684	6344	-7028
	7 月	-4291	11399	-15690
	8 月	-883	13457	-14340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3 年		2.0	1.7	2.2	2.7	6.9	1.3
	1 季度	3.2	0.8	1.8	2.8	4.6	0.8
	2 季度	2.0	1.7	2.2	3.9	7.0	1.2
	3 季度	2.7	1.6	1.8	2.4	7.5	1.3
	4 季度	2.9	2.4	2.9	2.1	6.4	2.1
2014 年		2.4	3.0	1.5	0.1	7.3	0.6
	1 季度	1.0	2.7	1.9	2.7	6.7	0.6
	2 季度	3.4	3.0	1.3	-1.2	6.7	0.7
	3 季度	3.2	3.0	1.6	-0.6	8.4	0.9
	4 季度	2.2	3.4	1.3	-0.3	6.6	0.4
2015 年							
	1 季度	-0.8	2.9	2.1	-1.6	7.5	-2.2
	2 季度	-0.5	2.6	1.2	-2.6	7.0	-4.6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3 年		2.9	1.4	3.1	2.2	4.7	5.6
	2 季度	2.7	1.8	3.1	2.6	4.5	5.6
	3 季度	3.2	1.6	3.1	1.5	5.0	5.5
	4 季度	3.4	1.1	2.8	3.4	5.1	5.6
2014 年		3.3	2.1	2.5	3.8	6.0	5.0
	1 季度	3.9	2.0	2.7	3.4	6.2	5.1
	2 季度	3.4	1.7	2.0	3.9	6.5	5.0
	3 季度	3.3	2.2	2.9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4	3.5	5.7	5.0
2015 年							
	1 季度	2.4	2.6	2.4	3.8	5.6	4.7
	2 季度	2.2	2.2	2.8	0.5	4.9	4.7
	3 季度	2.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4 年		6.9	6.2	4.8	5.2	25.1
	9 月	6.9	6.0	4.9	4.9	25.4
	10 月	6.6	6.0	4.7	5.1	
	11 月	6.7	5.8	4.8	5.2	
	12 月	6.7	5.7	4.3	5.3	24.3
2015 年						
	1 月	6.6	5.7	5.3	5.5	
	2 月	6.8	5.6	5.9	5.8	
	3 月	6.8	5.5	6.2	5.9	26.4
	4 月	6.8	5.5	6.4	5.8	
	5 月	6.8	5.6	6.7	5.6	
	6 月	6.8	5.6	6.9	5.3	25.0
	7 月	6.8	5.5	7.5	5.3	
	8 月	7.0	5.4	7.6	5.3	
	9 月	7.1		7.6	5.2	25.5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4 年		3.5	4.5	3.3	4.0	2.9
	9 月	3.5	5.1	3.3	3.9	2.7
	10 月	3.5	4.8	3.3	3.9	2.7
	11 月	3.4	4.5	3.3	3.9	2.7
	12 月	3.5	3.8	3.3	3.8	3.0
2015 年						
	1 月	3.4	4.5	3.3	3.8	3.0
	2 月	3.9	4.3	3.3	3.7	3.2
	3 月	3.7	3.9	3.3	3.8	3.0
	4 月	3.7	4.3	3.2	3.8	3.0
	5 月	3.9	4.4	3.2	3.8	3.1
	6 月	3.9	4.4	3.2	3.8	3.1
	7 月	3.7	4.7	3.3	3.7	3.2
	8 月	3.6	4.7	3.3	3.7	3.2
	9 月	3.5	5.1	3.3	3.9	2.7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3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年	4746.3	4625.4	120.9	5045.6	6903.2	-1857.6
9月	417.2	398.6	18.6	426.0	596.5	-170.4
10月	417.6	416.1	1.4	436.2	602.2	-166.0
11月	374.1	371.3	2.8	446.8	543.0	-96.3
12月	394.9	365.9	28.9	390.5	546.4	-155.9
2015年						
1月	347.8	332.1	15.7	346.1	509.6	-163.5
2月	318.2	322.9	-4.7	345.9	524.7	-178.8
3月	359.1	377.0	-17.9	418.4	543.9	-125.5
4月	339.3	367.5	-28.2	385.6	497.1	-111.6
5月	338.4	366.0	-27.6	397.3	505.3	-107.9
6月	369.8	374.4	-4.6	400.8	546.7	-145.9
7月	338.1	349.9	-11.8	378.4	546.3	-167.9
8月	336.1	347.8	-11.7	362.9	471.2	-108.3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非			巴西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年	910.5	998.9	-88.4	2251.0	2391.5	-140.5
9月	82.1	85.3	-3.3	196.2	213.8	-17.6
10月	79.9	99.7	-19.8	183.3	203.5	-20.2
11月	75.7	80.5	-4.8	156.5	188.7	-32.2
12月	76.2	70.3	5.9	174.9	179.3	-4.4
2015年						
1月	57.6	78.9	-21.3	137.0	176.3	-39.2
2月	65.9	73.7	-7.8	120.9	156.1	-35.2
3月	75.6	75.3	0.3	169.8	172.7	-2.9
4月	69.9	71.8	-1.9	151.6	153.2	-1.6
5月	74.1	70.1	4.0	167.7	146.3	21.4
6月	73.1	68.7	4.5	196.3	157.5	38.8
7月	74.7	75.6	-0.9	185.3	168.4	17.0
8月	67.8	75.5	-7.7	154.9	133.4	21.4
9月				161.5	137.7	23.8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度			俄罗斯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年	3216.4	4625.3	-1408.9	4977.6	3080.3	1897.4
9月	282.1	430.1	-148.0	380.8	260.0	120.9
10月	259.6	394.8	-135.2	415.4	268.3	147.1
11月	263.6	427.0	-163.4	367.6	230.9	136.6
12月	261.3	352.6	-91.3	383.8	244.9	139.0
2015年						
1月	243.7	321.1	-77.4	278.3	125.0	153.3
2月	218.7	282.8	-64.1	293.0	156.3	136.7
3月	238.9	357.0	-118.2	326.3	172.6	153.8
4月	220.9	329.7	-108.8	305.5	163.4	142.1
5月	222.6	326.9	-104.3	305.8	154.5	151.3
6月	222.9	331.2	-108.3	300.1	163.7	136.5
7月	231.4	359.5	-128.1	276.6	169.8	106.8
8月	212.7	337.4	-124.8	253.1	166.0	87.1
9月	218.4	323.2	-104.8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年	5726.6	5255.1	471.5	3971.3	4115.8	-144.5
9月	474.5	441.9	32.6	342.6	346.7	-4.1
10月	516.3	441.0	75.3	368.8	379.9	-11.2
11月	466.1	413.4	52.6	323.6	343.5	-19.9
12月	494.6	439.1	55.5	341.4	348.4	-6.9
2015年						
1月	451.1	394.2	56.9	265.5	306.1	-40.5
2月	414.8	339.3	75.5	297.2	298.7	-1.6
3月	468.5	384.8	83.7	341.3	336.6	4.7
4月	462.4	378.1	84.3	329.5	330.4	-0.9
5月	423.3	361.3	62.0	313.4	323.6	-10.2
6月	465.7	366.6	99.1	338.4	345.9	-7.5
7月	457.1	388.2	68.9	328.0	350.7	-22.7
8月	391.3	349.5	41.8	310.5	338.3	-27.8
9月	434.8	345.6	89.2	322.4	336.6	-14.2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年	5241.3	6007.7	-766.3	3138.4	2742.3	396.1
9月	471.3	527.2	-56.0	264.3	229.3	35.0
10月	477.4	534.0	-56.6	269.0	222.8	46.2
11月	484.8	545.2	-60.3	266.8	224.6	42.2
12月	455.0	537.0	-82.0	256.5	212.0	44.5
2015年						
1月	438.0	484.2	-46.2	251.2	203.2	48.0
2月	327.8	380.1	-52.2	198.6	153.0	45.6
3月	416.2	470.8	-54.6	252.7	212.1	40.7
4月	401.4	457.1	-55.8	234.9	187.4	47.5
5月	408.5	444.4	-35.9	256.3	202.1	54.2
6月	407.4	465.6	-58.2	230.7	208.8	21.9
7月	453.2	475.9	-22.8	235.5	199.3	36.2
8月	426.6	456.0	-29.4	239.3	199.7	39.6
9月	453.5	492.6	-39.1	225.4	173.0	52.5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年	2341.4	2088.7	252.7	1762.9	1781.8	-18.9
9月	200.5	171.5	29.0	152.8	155.5	-2.7
10月	199.0	195.5	3.5	153.5	153.3	0.2
11月	190.6	157.3	33.3	136.2	140.4	-4.3
12月	194.5	168.0	26.5	146.2	144.4	1.9
2015年						
1月	177.5	152.5	25.0	133.6	126.1	7.4
2月	148.0	135.3	12.7	121.7	115.1	6.6
3月	180.6	159.3	21.3	136.3	126.1	10.3
4月	166.1	147.2	18.9	130.8	126.3	4.6
5月	167.8	152.5	15.3	126.9	116.1	10.8
6月	171.9	150.5	21.3	135.1	129.8	5.3
7月	166.3	160.1	6.2	114.9	100.8	14.1
8月	163.9	138.8	25.1	127.3	124.0	3.3
9月				125.3	115.1	10.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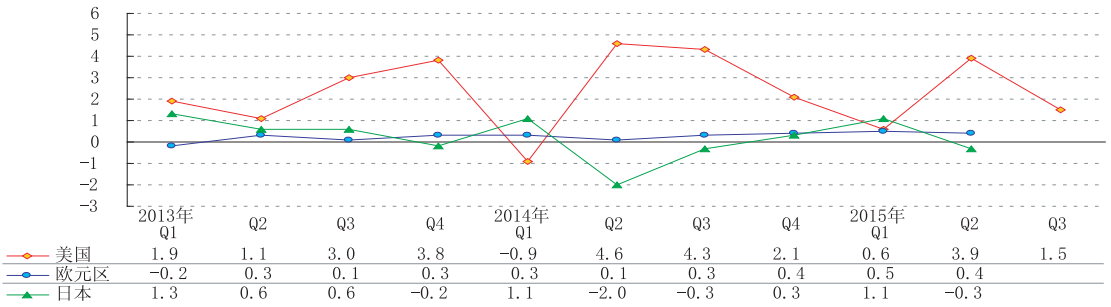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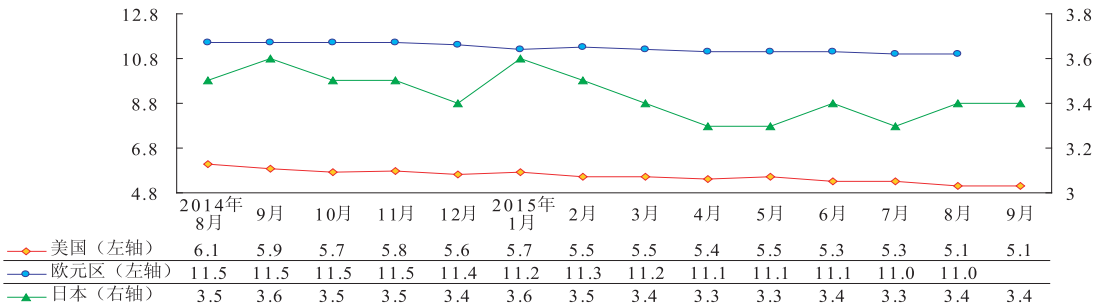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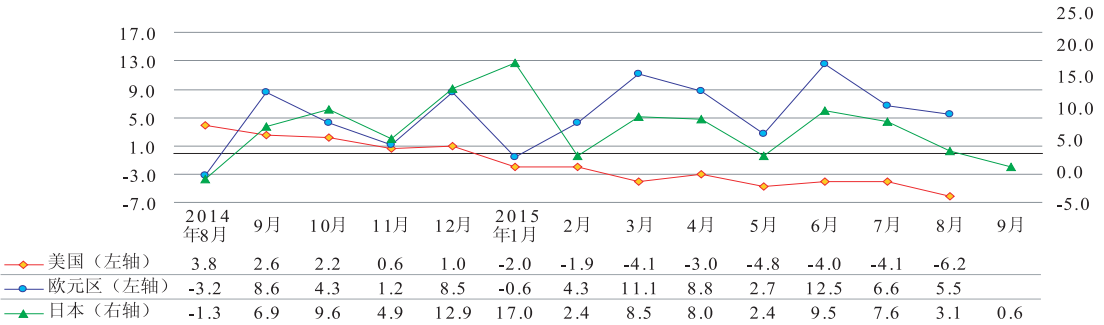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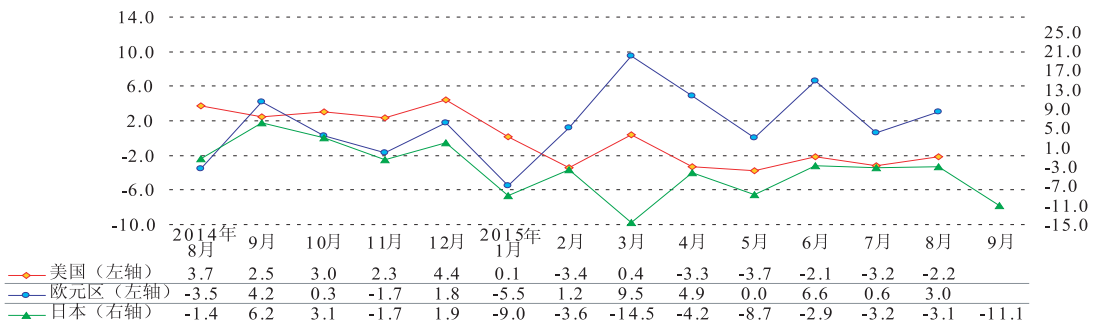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1~图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 Reflections on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Situation

Fan Hengshan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the New Normal, and the reform has entered a crucial phase, then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come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maintaining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implementing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Objective analysis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current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steady and scientif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ccelerating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rocess.

(2) Being Alert of by the Falling into the Liquidity Trap "Passiv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Huang Zhiling

QE is a solution aimed at "liquidity trap" in the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countries tried to take loose monetary polic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recession, but the effect is not ideal. The paper notes that the recent easing monetary policy also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ssivation", and the root cause is the environment change of budget constrain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deposit reserve ratio should be lowered so as to guide the economy running smoothly.

(3) Study on China's Capital 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Areas in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Cheng Fengchao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y is being in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that three stages superimposed together and now entered the New Normal, which means slowdown of economic rate, optimization of economy and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ment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it is important to find the way of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find out the sectors and industries to invest which can both fit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s economy and meet public needs. First of all, the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in China; and then, it analyzes if the similar New Normal exists in the past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which can provide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ssues we will meet in the New Normal; finall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we need to adjust the capital structure under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and proposes investment areas that need to focus: reducing state capital, enlarging the proportion of private capital, developing the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vigorously; focusing investment on infrastructur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moder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which can lea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pecifically to micro - enterprise investment projects, we should not only be

concerned about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focus on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ESG indicator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4) Global Companies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Multinationals

Wang Zhile

The last 20 years, a quiet revolution is undergoing in the global business community – the transition from multinationals to global companies. The global company is a new stage of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The global companies have global strategy, establish the glob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assume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 Globalization level of global companies has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dex is more than 50%. The operation core of global companies lie overseas, with the thinking and business model of global operation. Global companies have entered China comprehensively. Global companies' investment in China not only promotes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engine, but also acts as the catalyst for the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China's modern enterprises, for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modern industries, 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s well, and has been more and more common interests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us becoming the allies for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the rise. At the same time, global companies have posed serious challenges to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e whole econom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we must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new trends of multinational development, learn from global companies, cooperate and compete with the global companies. Through learning,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 number of global companies from China will grow and expand.

(5) The Main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Gao Lingyun

Under the trend of steady and slo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parts of global value chain belonging to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overlap with developing ones substantially, and intensify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be adjusted toward more soft, advanced and green direction. Whether in quantity or 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ill b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urthermore, trade protectionism will also maintain a rapid upward trend, and China will still be the largest target. However, the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will be faltering.

(6) Financial Innovation Based on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the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s

Shen Jingqi

As a huge strategic proj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s inseparable from strong financial suppor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minent issues while promoting the projects with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model. After argu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PP private equity fund model, one of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s based o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is mode can be better integrated economic efficiency of market and pla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guiding role of government during the course of implemen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ttracting more private capital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jects; help protect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pecial funds and investment returning of private capital to some extent, and achieve the “win – win” cooperation situation of the government, platforms and private capital; help on the premise tha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ultidimensional fund subjects participat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participate jointly, solve problems such as investment step

by step, grading management, returning by different levels, quantification according different subject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financial practice, including 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project nodes,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rojects, and realization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as pilot.

(7) Developing Islamic Finance and Support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Bai Yufei, Du Xiaoyu

Xi Jinping as the new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according to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world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s a whole,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hina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slamic countries alo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area, make full use of Islamic financial leverage, meet the financial needs, which is also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sake of realizing the mutual connectivity of economy and trade, and rapid and open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rea.

(8) Innovating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to Build the Backbone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Hu Zhengyuan, Sun Bingyao, Dou Yong, Ai Yongmei

The paper studies on how to build China's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Closely focused on the new idea and policy concerning the two themes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in Hebei, the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role played by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in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on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9) Leg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New Business on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Han Liang

Cross – border business cooperation, wealth management and family trusts, private equity funds, Internet banking,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are the newly developing business area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cross – border business coopera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set up factories abroad to circumvent trade barriers, and obtain favorable policy for investors through collective lobbying in investment target country, and get their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through investing industries highly needed by investment target country and abiding by local laws. In the emerging fields of financial services,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ome offshore areas, meanwhile, we should supervise appropriately over the emerging fields according to the bottom line of the law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despit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fac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mining capital market building, the prospect is bright. The above – mentioned emerging businesses broadened the business areas for Chinese lawyers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m.

Editor: Guo Zhouming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